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失靈的華人身分：

泰國政治與外交中「非認同」研究

Chinese Identities De-sensitized:

A Study of “Non-identity” in Thai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莊雨千

Yu-Chien Chuang

指導教授：石之瑜 博士

Advisor: Chih-Yu Shih, Ph.D.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August, 2018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失靈的華人身分：
泰國政治與外交中「非認同」研究
**Chinese Identities De-sensitized: A Study of “Non-identity”
in Thai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本論文係 莊雨千 君（學號：R01322042）在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7 年 7 月 23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石之瑜

（簽名）

（指導教授）

陳佩修

林若琴

石之瑜

謝辭



一路走來，六年。

在家人及師長的支持、指導與包容下，終得完成論文。謝謝你們在這六年間給我力量與鼓勵，讓我沒有放棄學位，咬著牙邊工作邊撰寫論文。謝謝臺大政治系提供豐富資源，讓我從大學到研究所總共十年時間，飽讀詩書充實自我，入寶山而滿載而歸。

最後一哩路，我走完了！

國立臺灣大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學位論文提要

論文題目：失靈的華人身分：泰國政治與外交中「非認同」研究

論文頁數：134

所組別：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學號：R01322042）

研究生：莊雨千 指導教授：石之瑜

關鍵字：泰國華人性、中國崛起、再華化、對華政策、華人身分、認同政治、同化

論文提要內容：

近年中國崛起促使東亞及整體亞洲進行安全及經濟等區域合作，中國與鄰國關係日漸緊密，相關議題更已成為熱門研究課題。面對崛起之大國實力，不僅世界各國媒體聚焦中國，各地華人亦從各在地情境中探索新局。隨著中國與各國互動逐漸頻密，此開展出世界華人族群與中國之間，從社會、經濟、政治及文化等多層面交流，進而形成華人與中國聯繫再組合與再認識。其中，東南亞華人所展現之華人性（Chineseness）以及華人身分（Chinese identity）轉變，向為學術界所關注。本研究關切主題在於，向已本土化之泰國華人華裔族群，除跟隨各國加入世界華語熱潮外，迄今仍未體現任何對華人身分認同再反思或再認識，而泰國政府對華認識及對華政策則未受其國內華人族群影響。

泰國華人，如同其他東南亞華人，在居住地擁有政經權力，然華人族群身分認同及華人性體現卻有別於其他東南亞國家及華人族群。本研究藉中國崛起議題作為楔子，探究華人意識在泰國外交、政治及對中國關係中未起重要作用此一情形。另透過分析同化是否造就泰國華人性消逝及同化結果是否具體反應在泰國政治中，並研析若華人性並無其顯著性，則中國崛起是否使華人性復甦等問題，嘗試將個別議題串連一起，整理成一脈絡化研究報告。

ABSTRACT

CHINESE IDENTITIES DE-SENSITIZED: A STUDY OF “NON-IDENTITY” IN
THAI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by

YU-CHIEN CHUANG

August, 2018

ADVISOR: CHIH-YU SHIH, Ph.D.

DEPARTMENT: POLITICAL SCIENCE

MAJ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GREE: MASTER OF ARTS

KEY WORDS: Thai Chineseness, Rise of China, Resinicization, Policy toward China,
Chinese Identity, Identity Politics, Assimilation

As China rises in the beginning of 21st century, regionalism emerges in Asia and thus promotes 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economic, social, military and related fields. China's interactions and relationships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have then been developing ever since. The rise of its national power not only draws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but pushes overseas Chinese, increasingly connected with the nascent power through cooperation at all levels, to examine their self-identity.

The Thai Chinese are well known for their influence in economy and politics in Thailand, for many of them have been business tycoons and high level officials and politicians of the country. Ironically, their Chinese identity has barely made any noticeable difference in their acquiring such prominent social status. Much of the studies on the Chineseness and Chinese identity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fail to address the phenomenon and the cause of the better assimilation of the Thai Chinese as reflected in their important roles in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or the policy they have adopted toward China. Under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 of China rising, the lack of resinicization, as contrast to such developments elsewhere, is the topic of this research. Specifically, how has the Chinese identity in Thailand lost political relevance?



目錄



口試委員審定書.....	I
謝辭.....	I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問題源起.....	6
第三節 理論視角.....	7
第四節 文獻探討.....	8
第五節 研究目的.....	15
第六節 研究架構與方法.....	15
第二章 泰國華人族群與國內政治.....	17
第一節 華人身分內涵.....	17
第二節 泰國華人與同化.....	26
第三節 同化與融合條件下泰國華人政治參與.....	37
第三章 國際情勢主導之泰國對華政策.....	54
第一節 泰國外交政策分析.....	54
第二節 1938 年至 1974 年泰中關係及泰國對華政策.....	64
第三節 1975 年迄今泰國對華政策沿革.....	77
第四章 中國崛起對泰國華人身分認同影響.....	86
第一節 中國崛起意涵及其影響.....	86
第二節 中國崛起下泰國華人與再華化.....	92
第五章 結論.....	101
參考文獻.....	106
附錄.....	122

圖表目次



圖 2-1	19
圖 2-2	23
圖 2-3	47
表 2-1	32
表 2-2	40
表 2-3	45
表 2-4	46
表 3-1	8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在國際社會角色日趨重要，而東南亞作為與中國鄰近且在政治、經濟及文化等各方面緊密合作夥伴，則出現強烈反應（喻常森，2013: 111）。對於中國經濟快速起飛及整體實力急速擴張，東南亞國家間存在正反二種觀點。部分國家視中國為區域穩定要素及經濟提升關鍵，部分國家則視為現有國際體系挑戰（胡大龍，2015: 97）。另因華人族群在眾多東南亞國家扮演重要角色，中國崛起成為影響各國對華政策因素。此外，由於東南亞與中國互動密切，故各國對華政策將牽動其崛起未來發展（喻常森，2013: 112）。自中國決定改革開放起，海外華人與中國關係逐漸出現變化，部分華人更積極參與改革過程。而隨著國際情勢、中國實力及海外僑情不斷演變，華人與中國互動明顯日趨緊密（張秀明，2015: 2）。

本文關切在東南亞面對中國崛起時，華人如何安排自身角色。由於過往眾多東南亞華人受居住國政策限制，而遭迫捨棄或隱藏華人身分、特質及意識—即其華人性（Chineseness），並試圖融入當地社會。惟如今中國勢力茁壯，東南亞國家漸改過往對華政策，華人沈寂已久之華人性似緩緩甦醒，學術界將此現象稱為「再華化」（resinicization）。¹ 根據研究顯示，二十一世紀東南亞華人社會中，印尼華人族群再華化情形為顯現例子。印尼華人再華化涉及中國和平崛起、印尼政府對華政策轉變及華人本身觀念思想改變（張小倩，2016: 82）。馬來西亞則出現華人政黨在競選看板上突顯與中國情誼，企圖以「中國牌」博取選票。² 越南近年因中國在南海頻頻挑起主權爭議，致使民眾對中國甚為反感，更出現排華反中暴動（宋鎮照，2014: 34）。反觀泰國在評估其對華政策時，則以國際情勢及國家利益為考量，而其國內華人族群亦未展現再華化現象。本文將探究泰國

¹ 本文後續將闡述華人性及再華化(亦可稱為 resinification)定義，故暫不贅述。

² 詳細資料參考天下雜誌，「中國因素引爆！馬哈迪【國族牌】vs. 納吉【經濟牌】對決倒數」。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9773>。上網檢視日期 2018 年 5 月 10 日。

華人身分與意識在泰國政治及外交扮演之角色，並追問為何華人意識或華人性在泰國並無產生顯著作用。而此關切時代背景，則為中國崛起。




壹、研究背景

面對中國崛起，東南亞乃影響最立即且明顯之鄰近區域。中國佔據東亞大陸心臟地區廣大領土，而與其接壤國家共 15 國，其中包括東南亞國家越南、寮國及緬甸，隔海則有馬來西亞、印尼及汶萊。倘以歷史上關係密切作為連結，亦有長期被視為鄰邦之泰國、柬埔寨與新加坡（許志嘉，2007）。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帶動中國國際地位之提升，亞洲巨龍成為全球關注焦點。國際社會已瞭解並接受「中國崛起」（China's Rise, Rise of China）事實，亦認知中國為世界舞台重要角色。然中國為紓緩國際社會因其崛起印象產生之壓力，乃以「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策略試圖營造和平崛起氛圍，包括中國提出支持由東南亞國家協會（東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所主導區域安全架構。

1967 年 8 月 5 日，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及新加坡五位外交部長在泰國曼谷達至共識並簽署及發表「曼谷宣言」（Bangkok Declaration），宣示東協正式成立，而其成立目的係為維繫東南亞地區穩定與和平、促進經濟成長及社會進步。³ 成立逾 40 年、共 10 個會員國之東協，除象徵東南亞國家團結，同時亦帶動亞洲區域發展（鄭安利，2007:2）。地理上鄰近且經濟上有著緊密關係之東南亞國家雖成立區域協會，惟針對中國此一「和平崛起」大國或將帶來之威脅仍感到不安。

為鞏固區域團結，東協對外向採取所謂一致立場，並同時成立對話夥伴國，以藉由多邊會談（如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形成開放且透明論壇，積極拓展與周邊國家合作關係；此顯示東協影響力擴張並欲主導區域合作之事實（高長、吳瑟致，2009: 11）。鑒於其鄰邦市場逐漸茁壯，東協為爭取更多出口機會，亦試圖在政策上與中國交往互動。1996 年「東協區域論壇」

³ 東協創立詳細資料參考東協官網：<http://asean.org/asean/about-asean/history/>。上網檢視日期 2018 年 1 月 28 日。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部長會議便首次邀請中國加入晤談。2002 年則舉行第一屆「東協十加一高峰會」(ASEAN plus One, 加一意指中國)，在在顯示東協與中國頻繁互動，亦隱約透露著雙方關係趨於緊密。在此合作與交往潮流下，更誕生以推動亞洲經濟合作為宗旨之「博鰲亞洲論壇」(Boao Forum for Asia, BFA) (林家如, 2006: 1)。

另中國第四代領導集體「新睦鄰外交」政策亦試圖建構和平穩定環境，此外交政策可視為和平崛起輔助工具。中國積極參與東南亞之事務為全方位政策，因歷史與地緣關係，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間除政治、經濟合作外，亦著重於外交事務以及國家安全。2003 年底，在印尼所簽署之「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TAC) 及「中國－東協戰略夥伴關係聯合宣言」(China-ASEAN Strategic Partnership)，皆屬中國為推動全面性合作關係之具體行動(陳清照, 2005: 5)。

中國的經濟擴張對於東南亞國家或為發展機會，或為巨大威脅。東南亞各國自 1970 年代中期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至 1990 年代則完成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然東南亞並非所有國家皆敞開懷抱歡迎中國這位新朋友。在國際關係中，一國面對崛起之新興強權，可選擇制衡 (Balancing)、扈從 (Bandwagoning)、交往 (Engagement)、卸責 (Buck-Passing)、綏靖 (Appeasement) 或甚避險 (Hedging) 等多種策略；不同時期可搭配不同策略，每個策略亦各有利弊。東南亞諸國目前所採取之策略偏向交往與卸責混合政策，主要寄望透過多邊機制培養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相互信任(陳欣之、陳裕翰, 2006:7)。1978 年當時越共出兵侵略鄰國柬埔寨，新加坡與泰國樂見中國介入處理，而印尼與馬來西亞有鑒於過去中國曾經支持兩國內部共黨作亂，其間尤其是懷疑中國會以華人為潛在吸收對象，以致兩國對於中國介入東南亞自家事務抱持保留態度(林家如, 2006:9)。

中國與東南亞關係會如何演進，涉及東南亞華人在當地政治情況。回溯東南亞與華人歷史，早自十二、十三世紀起，中國人民逐漸移民至「南洋」抑或東南亞國家，其背後主因為中國商人們於前往印度與中東經商前，多會在東南亞短暫歇息，以避免長途跋涉致使過度疲勞。這些過客在鄰近經商路線途中有了暫時



住處，因本著商人本能與特性，開始與當地人民貿易。

中國之崛起喚醒沉寂世界各地之華人性（Chineseness），而華人在東南亞所佔有地位不容小覷。自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東南亞諸國政府之對華政策各有所異。根據王賡武的分析，前往東南亞之中國人可略分為以下四種類型（Wang, 2003: 5-9）：

- 貿易商/華商型（Traders）— 貿易商為最早開始在東南亞經商之族群，隨著商人逐漸在當地紮根，其眾多親戚亦從中國前往東南亞協助發展家族事業。
- 勞工/華工型（Labors）— 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期間，許多勞工因盼尋求較佳就業機會而決心前往海外工作。通常這些勞工於工作合約終止後，便帶著所賺取之薪資返抵中國；然部分勞工則盼留在當地廣續積累財富。
- 旅居者/華僑型（Sojourners）— 這些高教育與高階級旅居者多將自己視為中國文化與生活形式代表，他們於 1949 年中國共產黨取得中國統治權時，決定永久離開祖國。在異鄉生活之旅居者，遊說當地政府以取得創立華語學校之權力，逐漸開始中國語言與文化傳承。
- 後裔/華裔型（Descendants）— 目前居多東南亞華人皆為中國華人後代，他們既不熟悉中文亦未曾在中國本土居住過。這些後裔僅有著若干程度中國人血統，實質上卻甚少與中國交集。

在以上東南亞華人四種分類中，於十三世紀期間抵達泰國者多屬貿易商與勞工，主要在泰國經商並建立事業抑或在各企業中工作。部分早期抵泰商人與勞工選擇在當地娶妻結婚，並且在獲得足夠財富後便舉家返回中國，而部分則只將孩子送回中國給親戚照料並讓他們接受中國教育（Chansiri, 2008:24）。另曹雲華則將東南亞華人與當地民族關係之發展史劃分為三個時期（曹雲華，2010）：

- 十二世紀至十九世紀中期，華人大批移居東南亞各國之前—此期間二民族主流關係發展良好，儘管在西方殖民統治時期曾發生嚴重排華事件，然此非當地族所策劃。
- 十九世紀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此階段之華人與當地民族擁護之民族主義各自逐漸形成甚至日益高漲，由於二者皆為被殖民統治者，因此尚未爆發

大規模衝突。惟於此期間已發生糾紛與磨擦，醞釀著下一時期之劇變。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今－東南亞華人與當地民族步入相互磨合階段，二者政治、經濟與文化地位皆發生劇烈變化，進而促使雙方調整相互之間關係。

隨著中國崛起，尤其是東南亞現今與中國緊密之關係，因經濟上高度互賴情形，造就二者密不可分且全面性連結。與此同時，華人及其所展現之華人性又再度成為討論之話題。此崛起與經貿往來是否將帶來華人性復甦乃本論文研究背景關切議題。

貳、研究動機

中國崛起促使東亞區域合作、整合、安全等議題皆成為熱門研究課題，不僅各國媒體聚焦中國，甚至各地華人亦從各在地情境中探索新局，表現出一馬當先、積極參與中國崛起大有人在，進而開展出世界華人族群與中國之間，從文化、社會、經濟與政治等等不一而足多層面交流，形成對中國與華人之間聯繫再組合與再認識。其中，東南亞華人所展現之華人性（Chineseness）以及華人身分（Chinese identity）之轉變，向為學術界所關注，亦導致主流本土族群或周邊鄰國敏感，並影響對中國看法與政策。這在不論馬來西亞、印尼、越南或新加坡皆如此。然而，其中一個似乏人問津之悖反現象是，向已本土化之泰國華人華裔族群，除加入世界中文熱潮外，迄今仍未體現任何對華人身分再反思或再認識，主流社會則未因中國崛起而須反思中國，政府對華認識及對華政策因而與眾不同地免於捲入認同政治。

本論文欲藉中國崛起之議題作為楔子，探究東南亞各國對中國之關係中，華人性所起作用，特別是探究泰國華人意識未起重要作用的現象此部分，以與東南亞其他擁有一定規模華人族群之鄰國及其間華人身分政治高敏感度進行比較。論文研究主軸為在東南亞扮演重要角色之華人，是否因已同化而致使華人性逐漸消逝？依此脈絡追蹤泰國對華政策思路，是否確實無涉於其內部華人族群與華人性。由於泰國華裔同化程度之高早已為眾多文獻所記載，因此本論文將一反當下研究主流所關注華人族群與中國再聯繫以及因此引發之在地認同政治，轉而將焦點放在類此再聯繫與認同政治脫勾之可能性，故將回溯泰國對華政策是如何



在高度同化，即華人性較不顯著影響下形成。質言之，泰國主流社會對於華人性接受度較高，政治控制敏感度較低，此情況如何展現於其對華政策中。此外，相較於鄰國印尼、越南、馬來西亞之排華政治，以及新加坡華人統治現象，泰國除早期曾有所謂限制華人入境政策外，近年來華人與當地民族衝突則少聞之，華人領導政府組閣則時而有之，且執政期間並無顯著華人政策。泰國華人性似乎僅侷限於與中國商業往來關係，意即泰國華人學習中文、華語僅因家庭事業所需，與中國有所來往皆為生意所致，而與血統、中國人身分認同充其量為間接關係。⁴

本研究期望在完成之際，盼可回答下列問題：

首先，同化是否造就泰國華人性消逝；其次，以泰國為例，此同化結果是否具體反應在其對華政策中；再者，若華人性在政治中已失去其顯著性，則中國崛起是否使華人性復甦？此一華人意識是否將從華商往來關係中逐步恢復？

第二節 研究問題源起

中國崛起為二十一世紀重要當代史進程，以致於華人政治與大中國經濟圈之研究應運而生。影響所及，在刻板印象下之華人經濟便與華人身分政治成為一體之二面，不僅在華人族群中引起回響，也在各本土社會引發關注。其結果，該聯繫似乎成為媒體乃至於學術文獻中常識，或前提。本文重要性便在於對此類嘗試提出反證，因泰國華裔長期同化於居住國社會後，曾產生多位具華人血統之政治領導人，情況與東南亞各國不同。華人認同政治並不明顯，此其一；華人意識並未隨中國崛起而復甦，此其二；華人加入中國經濟圈尚未與認同政治相互融合為一體之兩面，此其三。總的來說，泰國本土社會並未對華人身分產生排斥感。

本論文研究主題源自於自身成長背景，筆者從小在泰國長大，對該環境已有深厚情感，故期望本文在學術上對於泰國能有更深層瞭解，並對東南亞研究有所貢獻。就目前筆者所蒐集國內東南亞相關議題之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等文獻，尚未有從華人性分析泰國政治及對華政策並將中國崛起因素放入研究範疇。

⁴ Chan Kwow Bun 與 Tong Chee Kiong 於其著作中提及，泰國華人認為華語是作為商用語言，是為了生存而用，並非因為愛國情懷抑或民族主義，做生意使用華語為一大優勢。詳細資料請參考 Chan & Kiong, 1993: 152, 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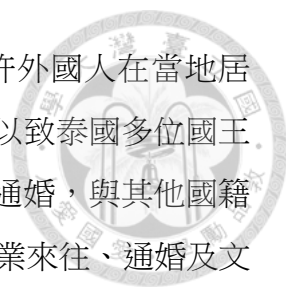
本論文所提及之議題，例如華人性介紹、東南亞華人移民與同化、東南亞對華政策、中國崛起對東協影響等，皆有文獻討論之，惟缺少將這些獨立個別議題串連在一起，整理成一脈絡化之研究報告。筆者期望此論文能夠達到這個目標，使得我國對東南亞，尤其是針對泰國研究，能夠拓展該領域。此外，並提供未來欲研究東南亞國家、泰國、華人政治經濟、同化等議題之學者另一參考資料。

第三節 理論視角

泰國華裔之同化程度屬東南亞地區國家中最高者，以致於現今往往難從外表區分泰國人與華人差異。由於泰國華裔家族皆已傳承到第二、第三，甚至第四代，家族成員多擁有泰國國籍，因此泰國人口普查中也難以顯示華人比例。有學者認為泰國華裔文化變遷速度快，而其變遷之方向既非完全本土化，亦非完全西方化，而屬現代化。泰國華裔基本上已全然接受並適應泰國當地生活方式，如日常生活方面之衣食住行已無泰華區別，然其卻保留如注重旁支關係、闔家歡度春節等華人價值。此變遷可謂既非華人泰化，亦非泰人華化，實為雙方現代化（曹雲華，2010）。此深度同化如何致使華人性消逝，以及其如何傳遞影響至泰國對華政策為本論文所欲探討之。

美國 J. S. Berry 與韓裔美籍 U. Kim 認為個人於新國家、環境進行文化適應有以下四種模式（居維寧，1997）：

- 種族平等 — 個人從認識到適應所在國文化，包括認同東道國重要性，會選擇在保留其原有價值觀與認同時，要求獲得種族平等待遇，即種族平等模式。（馬來西亞華人）
- 同化 — 個人極端地適應東道國文化而拋棄原有文化，即同化模式。（菲律賓賓、泰國華裔）
- 游離 — 個人對於原有文化認同保持達到需排斥東道國文化與拒絕認同於所在國程度，即游離模式。（老一輩華僑、華人與新移民，或在東道國接受華文學校教育者）
- 邊緣化 — 個人既排斥自己原有文化亦排斥東道國文化，游離於二群體邊緣之間，即邊緣化模式。（接受西方教育之知識分子）



當時選擇遷徙到泰國之中國人絕多係因泰國開放且允許外國人在當地居住，而泰國如此開放之主因在於泰國皇室曾與中國皇室聯姻，以致泰國多位國王本身便為中國人後裔。除皇室聯姻外，泰國人民僅能與中國人通婚，與其他國籍之外國人建立婚姻則不被允許（Chansiri, 2008: 24）。經多年商業來往、通婚及文化交流，泰國人與中國人特殊關係逐漸發展成形，雙方特色在泰國社會中巧妙融合。移民至泰國之中國人多為潮州、客家、海南島、廣東及福建人。1959 年泰國人口統計資料顯示，當時中國人已佔泰國總人口 11%，而在這之中，則以潮州族群佔最多人口數，潮州人同時亦為泰國社會中發展得最好之族群，甚至超過居多本地居民（Skinner, 1959）。根據歷史資料記載，泰國潮州人口始增長於十八世紀下半葉，當時泰國國王 Taksin（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เจ้าตากสินมหาราช，中文姓名為鄭昭、鄭信）為泰國與潮州混血兒，其父親為潮州人，母親則為泰國人，泰中族群與文化融合篇章便展開序曲。

然這些長期居住泰國並展開嶄新生活之中國人，究竟應稱為「華僑」、「華人」、還是「華裔」呢？學者們對海外中國人理解各有不同，倘為暫時離開中國之僑居者則可被稱為「華僑」，因他們最終仍將返回祖國（Suryadinata, 1985: 1）。由於中國人民共和國在 1955 年後，拒絕承認雙重國籍，因此許多於國外出生並居住之中國人便開始入籍居住地，這些人被廣泛地稱為「華人」（Chansiri, 2008: 3）。若其家族已在泰國定居好幾個世代，則稱作「華裔」，意指華人後裔；他們有著華人血統但並不具有中國國籍。在泰國，這些傳承多代之移民有時稱為「華裔」，有時稱「華僑」；倘若依照學者分類，嚴格說起來目前在泰國華人家族應屬「泰國華裔」，畢竟他們不會回到中國居住。本文將第一代華人、華人後代華裔等通稱為「華人」，唯當必須加以區分華人與華裔時，則會分別使用華人抑或華裔。本文將探討泰國對華人開放政策使華人在泰國得以深度融合同化，間接造成整體華人性消逝與華人身分認同改變。

第四節 文獻探討


前揭華人意涵已詳細定義並區分華人種類，本文所探究之海外華人以早期外移華人及華裔大眾為主要研究對象。在當地居住數十年之華人家庭及後代，他

們華人身分是否失靈？本文研究對象未包括泰北特定華人族群抑或較近代且尚未取得當地國籍之新移民。由於本文重點在於華人身分、華人同化、參政以及對華政策，以下先探究各著名東南亞研究學者對此三大議題見解。

著名東南亞華人研究王賡武 Wang Gungwu (1994:237) 在其《中國與海外華人》一書中，將華人對於身分認同之概念稱為華人屬性或華人性 (Chineseness)，並以 1950 年作為分水嶺。⁵ 1950 年前，華人身分認同概念以歷史認同及中國民族主義認同為主。⁶ 王賡武以「處於歷史、文化及政治夾縫之少數民族」定義海外華人，而華人自身認同則因歷史、文化及政治而有所更迭。華人對他們自身的認同意識可因事態之變化而改變。然於 1950 年後，華人身分認同概念則有別於 1950 年前思潮，認同概念從歷史、民族主義擴大成國家、村社、文化、種族以及階級。此一變化過程，為當地華人社會自願放棄中國民族主義之認同，而以新僑居國家認同取代之。意即，各地華人領悟其若欲在當地持續生活，則最終須於同化 (Assimilation) 與融合 (Integration) 間作出選擇；此乃世界各地華人所面對之議題 (1994: 248)。王賡武亦提出一重要現況分析：東南亞華人皆具有多重身分認同 (multiple identities)。華人認同乃多重認同之複合體，當一新認同因素出現而舊有因素仍無法消失時，便形成多重認同情形。作者於其書中提及，泰國因其強而有力之同化政策，使其免於二十世紀中國民族主義激進行為干擾，故對於多數泰國華人來說，其多重認同乃源自強有力規範國家認同之指導 (1994: 255)。泰國政府以較自然且持續之文化同化方式 (continuum method of cultural assimilation) 進行同化。此政策相當成功，許多於十九世紀同化之中國—泰人 (Sino-Thai) 便成為其他華人進入泰國社會渠道。然眾多泰國華裔於環境有所變化之際且於己有利之時，即便其不真正認同自己為中國人，亦可能恢復其與中國人之聯繫 (1994: 358)。泰國與中國貿易關係近年大幅提昇，是否將致使泰國華人性之復甦？此亦為本文所欲探討之。

⁵ 本文均使用王賡武中文名稱，惟部分引用文獻為英文，故英文文獻係以王賡武英文名 Wang Gungwu 列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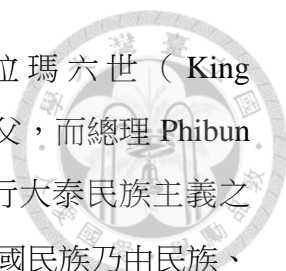
⁶ 所謂「歷史認同」是源於自古至今所流傳的價值觀念，所有自認為是華人的皆為華人；此種認同藉由傳統家庭價值、宗族起源、種族分支的忠誠以及中國輝煌過去的象徵等等保持了華人屬性。「中國民族主義認同」則是建立於國父孫中山的民族觀念上，是自種族的觀念引導出民族主義認同。詳細內容參照王賡武，1994，《中國與海外華人》，頁 233-238。



Yen Ching-Hwang (2008) 在其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一書中，同樣提及中國民族主義認同，Yen 指出在共享相似語言、風俗文化、儒家價值以及種族下，海外華人便形成中國民族主義，此呼應王賡武研究 (2008: 344)。對於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之定義可自 H. Kohn 著作得知，民族主義是一思想狀態在於個體對其民族國家有著極致忠誠；該定義著重於「極致忠誠」與「民族國家」二關鍵字 (Kohn, 1965: 9)。然而隨著當地政府對華政策、同化政策，海外華人認同歷經許多變化。尤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內部情勢變更，海外華人與居住國調整、整合、同化、融合之進程有所加速 (2008: 359)。海外華人除受中國影響外，當地政府對於華人態度及政策亦為一關鍵因素。東南亞各國對華政策以不同方式迫使、鼓勵及促進華人社會改變、調整並適應新政治、經濟及文化環境 (2008: 264)。「本土化」(localization) 乃源自華人參與當地政治以及本土認同之發展，華人社會文化與教育因而本土化，眾多華人選擇捨棄華語學習並以當地語言為母語。海外華人除認同受身處居住國有所影響外，其文化與教育亦因此改變 (2008: 281)。Yen 亦針對海外華人商業角色有一基本研究，伊認為海外華人族群提供孕育現代企業家優良環境。海外華人皆有之共通特色為強烈資本家態度、達至成功慾望以及能埋頭苦幹能力。相較於受到政府協助移民之歐洲旅居者，海外華人因缺乏保護而建立起獨立性格，促使華人下定決心，必得成功 (Wang & Wang, 2003:139)。本文欲探討同樣具備強烈資本家態度之泰國華裔，在面對中國崛起與日漸頻繁經貿關係下，是否會使沉寂以久華人性復甦。

回顧張文蔚 (1972) 在其著作《華人社會與東南亞諸國之政治發展》一書中曾提及，研究東南亞華僑社會或僑胞問題相較於其他地方華僑來得更重要，主因在於東南亞各國，除泰國外，皆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之新國家，故其所遭遇之建國困難相似，為其一；東南亞華人經濟勢力與當地人民相當，形成就業競爭，為其二；再者，東南亞各國，泰國除外，飽受外來帝國主義之殘忍統治，故於獨立之初具有情感及心理上排外時期 (1972: 121)。此一研究同為本文欲探討之泰國與東南亞各國之差異，相較於東南亞各國，泰國政府對於華人較無明顯排華政策及情勢，此差異對泰國華人性影響為本文所欲分析之。

泰國政府雖未曾執行排華政策，然卻曾屢次推行「大泰民族主義」。E.



Bruce Reynolds (2004: 99) 指出，歷史學家多將泰國拉瑪六世 (King Vajiravudh, 1910 年至 25 年間在位) 稱為當代大泰民族主義之父，而總理 Phibun Songkhram (พิบูลสงคราม, 1938 年至 44 年間執政) 則為大力推行大泰民族主義之手。Stithorn Thananithichot (2011: 258) 提及，拉瑪六世認為泰國民族乃由民族、宗教及君王建構而成，缺一不可。拉瑪六世在位期間甚為強調大泰民族概念，頒布國籍法、姓氏法等突顯民族理念 (陳佩修, 1998: 250)。此外，拉瑪六世更設計泰國目前採用之三色國旗，分別代表前述三要件。相較於鄰近國家採取排華政策，泰國政府及皇室藉由提倡大泰民族主義，催化華人認同改變，進而達到同化效果。


另 L. A. Peter Gosling (1983) 對於認同概念則著重於文化適應 (acculturation)，其認為華人之認同或華人性變更乃因適應而生，此過程通常催生出已經過文化適應之新華人族群 (1983: 1)。經文化適應及洗禮之華人，在眾多文化層面上展現出與當地文化融合現象，如穿著入境隨俗、飲食改變抑或異族通婚，呈現嶄新文化認同，進而衍生出不同或已式微之華人性。作者認為此類文化認同有異於完全併入當地文化之當地認同，故作者對於東南亞華人性較偏向於「融合」而非「同化」(1983: 5)。在文化認同此一層面上，作者強調語言重要性。東南亞各國入籍政策最主要規定之一即為語言；泰國政府透過開放華人學習泰語並同時限制華文教育政策，加速華人文化適應，藉以強化國家內部整合 (1983: 7)。此政策再次突顯泰國政府對於華人乃以持續文化同化方式，呼應王賡武研究重點。

由王靈智 Wang Ling-chi 與王賡武所彙編 *The Chinese Diaspora: Selected Essays* 一書細膩分析華人性與華人同化，並指出研究東南亞華人必須區隔文化認同與民族認同。研究顯示，許多東南亞華人雖不再使用華語，卻仍保留其華人性。針對泰國語言文化同化，該書提及若同化一詞可被文化同化替而代之，則方能謂泰國華裔已同化；否則嚴謹來說，泰國華裔僅是經文化適應，而不一定為完全同化。另區隔美國種族大融合 (Melting Pot) 理論與東南亞華人社會情況，說明研究東南亞華人認同或華人性不得僅以偏一觀察論之。如分析馬來西亞華人時，並非受華語教育或支持此教育之華人即為非馬來西亞人。他們雖保有華人文化，但對馬來西亞之忠誠度亦不得受質疑，此特殊認同即為東南亞華人所共同擁

有 (Wang & Wang, 2003: 47)。又海外華人認同及其華人性近年有所轉變，相較於中國大陸人民稱自己為「中國人」，海外華人則多稱自己為「華人」，此二字英文雖皆為 Chinese，然「中國人」與「華人」卻有顯著差異；此轉變在於前揭文化認同不同所致 (Wang & Wang, 2003: 53)。泰國華人是否僅是經文化適應而產生新文化認同，而非實質同化，此乃本文可深究議題。


倘欲提及泰國華裔則須關注曼谷華人社會，因其為泰國整體華人族群之核心。G. W. Skinner (1958: 17) 在其著作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 指出，泰國多數華人居住於曼谷市內或其週邊城市鄉鎮，顯示曼谷作為華人族群中心。在該書出版年代，Skinner 此一研究結果說明曼谷華人在政府重要機關並無直接涉入，作者表示當時華人尚未正式整合於泰國國家政府機關內 (1958: 21)。然綜觀泰國近幾十年來政治發展歷程及歷任總理，不乏擁有華人背景總理，這可謂顛覆 Skinner 早前研究。在同化層面上，不論文化同化或實質同化，作者發現許多泰國華裔所展現之泰國性 (Thainess) 遠遠超越其華人性。文化適應乃從多方面變更泰國華人性，從教育、父母親之一為本地泰國人、自幼於泰國生長...等多種因素，皆削弱泰國華裔族群華人性 (1958: 228)。Skinner 亦提出，由於幾乎每一代華人皆與當地泰國人通婚，進而致使第四代華人後裔幾乎不復存。此外，泰國華裔捨棄原家族姓氏，改以泰文姓氏之情形亦屬司空見慣。部分華人以原姓氏結合新泰文姓氏，部分則完全捨棄原姓氏。作者於其著作中指出泰國政府在各種同化華人政策皆相當成功，此亦為本文所欲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相較之處，同時探究為何泰國華人性在泰國政治中較不鮮明。

R. J. Coughlin (1960) 提及初到泰國華人，較為關注其生存及累積財富之道，尚無多餘心力關注政治，故泰國華裔起初對政治皆屬被動態度。欲參與一國之政治最為主要關鍵在於是否取得其國籍與公民身分，而泰國國籍政策經多次變更後，有一顯著改變在於 1956 年國籍法給予凡是在泰國出生之人泰國國籍。原先 1953 年國籍法限制，僅有父母親其中一方為泰國人方能取得泰國國籍 (1960:169-171)。非泰國出生之人如欲取得泰國國籍，則須依據官方各項要求 (如泰文流利、定額存款)，完全符合者便能取得國籍。Coughlin 認為，泰國對於欲歸化泰籍之人要求尚屬合理，另提及美國歸化政策要求則更為繁雜且嚴格。由此可見泰國對於其境內外國人，如海外華人，並無較激進排斥政策。



關於泰國政府早期移民管制政策，則詳載於 Kenneth Perry Landon (1941) 所著之 *The Chinese in Thailand* 一書中。作者於其著作中提及泰國政府於 1939 年左右大幅提昇移民費用，試圖遏止中國人民大量入境泰國。此金額提昇致使中國人民入境人數頓時驟減，少於出境人數 (1941:212)。在 1939 年，由於對外國人歧視逐漸擴散，尤在貿易與經商方面，遭受歧視之外國人有 95% 為中國人。泰國政府在此階段所提倡概念為泰國屬於泰國人，而非反其他人 (*Thailand is pro-Thai; it is not anti-anything*)。然這般歧視情況現已不復存，現今泰國華裔在貿易及經商方面不再受歧視或阻撓，且華人亦可參與政治。誠如 Landon (1941:292) 所指出，在泰國出生之華人，因較能認同自己為泰國人，故易於泰國政治中擁有較活躍角色。作者同樣呼應王賡武見解，認為泰國所提倡且持續之政策為文化同化，如以泰語教育作為同化手段，進而將華人順利併入泰國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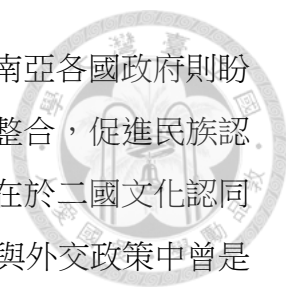
至泰國華人是被同化抑或融合乃爭辯中議題，曹雲華指出，其所接觸過之泰國華人並不同意同化一說。華人認為自身並無失去原本文化特性，惟因長期與當地泰國人和睦相處、截長補短並且相互學習，結果呈現為二種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融合現象。作者於其書中提及移民個體在新文化環境中之適應性可劃分為二階段，即初級與高級適應階段。初階適應階段乃為華人初到新環境時，對當地文化價值體系上無法即時承認與接受，然經一段時間後，華人將逐漸部分或全部放棄原有價值體系，接納當地國文化價值。作者認為此適應階段即為適者生存之生存法則所使然。高級適應階段則涉及政治認同、族際通婚以及宗教信仰此三方面。曹雲華 (2010: 218-219) 自其研究中發現，若東南亞國家奉行正確對華政策，絕大多數華人願意認同該國，並效忠地為該國服務、付出與犧牲。此研究呼應前揭所提及之馬來西亞華人對馬來西亞極度忠誠。此外，作者將東南亞華人文化特點統整為多元語言、多元宗教、複合生活方式、高度開放性以及次 (亞) 文化 (2010: 297-299)。次文化乃是以特有型態補充主導性文化，此類次文化通常孕育出特殊生活方式、價值體系以及語言。對於外來東南亞華人文化發展，曹雲華 (2010: 321) 認為有四種前途，完全同化於當地文化、完全西化、回歸中華文化以及建立具自己特色之現代東南亞華人文化。作者認為第四種前途應為東南亞華人所爭取，唯有此條路能使東南亞華人獨特文化發揚光大，至泰國華人文化將邁向哪條道路為本文所欲探討之。



有關華泰二種族間不明顯之衝突是否代表華人性已消逝，而泰國華裔不再為外國人之議題，在 Tong Chee Kiong 與 Chan Kwok Bun (2001) 所彙編的 *Alternate Identities: The Chinese of Contemporary Thailand* 一書中，針對華人性有嶄新研究。該書挑戰 Skinner 提出之模型，說明雖 Skinner 認為未來泰國華人將完全被同化，惟假若華人仍相信自身華人性，儘管其文化已不再同於中國祖先，他們依然自認為華人 (2001: 70)。另泰國政府政策對於研究、分析泰國華人乃一關鍵，泰國政府曾於早期採取遏止華人移民政策，然亦曾在需要華人經商能力時改變其對華政策。儘管諸多學者認為華泰二族群為兄弟而非陌生人，此一現象並非亙古不變，泰國政府對華政策將隨國際情勢而有所改變 (2001: 79)。泰國對華政策如何影響泰國華人性以及現今中國崛起是否改變政府對華政策，又或泰國華人性如何不受政策影響為本文所關注，此議題呼應該書主題。

本論文除探討上述幾位學者對於東南亞，尤其是泰國華人、華人性分析外，與眾多研究東南亞華人著作不同之處在於加入「中國崛起」因素。本文將剖析泰國原已消逝華人性是否因中國崛起而復甦。王崑義 (2007:36) 指出，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關係日趨緊密，而中國便以「三鄰」(睦鄰、安鄰、富鄰) 為主要政策推動區域合作。東南亞地區也逐漸地改變對於茁壯中國之看法，似漸不再視中國為威脅，而視為機遇。至中國崛起對於泰國華人意義為何？若以早期華人移民意識形態分析，則可能因其政治與文化忠誠心向中國而有重大意義。然縱觀現今泰國華人，多自認為「百分之百泰國人」或是以「華裔泰國人」取代泰國華人。這些泰國華裔與中國關係，似僅剩研習中文以利經商 (Malvezin, 2004)。

移居海外中國人長期居留僑居地，隨著時間便形成團體、族群、社區或商會，而不同國家華人在傳承中國文化方式上各不同 (李政賢, 2009:16)。歷史發展對於海外華人中國認知亦為決定性因素。中國總理周恩來於 1955 年出席印尼萬隆會議時便提到，海外華人應自行決定落地生根或返回中國；倘若選擇入籍，則應效忠當地政府，若欲回國，中國將不拒其於門外 (李政賢, 2009: 20)。對於中國崛起是否能夠喚醒東南亞沉睡華人意識，廖建裕認為中國崛起在某程度上或許有助於「再中國化」、「再華化」(resinicization)。然只要華人仍居住在民族主義濃厚之當地，則再中國化將不會成功 (廖建裕, 1998: 20-39)。研究東南亞之權威 G. W. Skinner (1959) 另於其文章指出，約有千萬海外華人旅居東南亞，



並因長期在當地發展而擁有相當程度經濟實力與政治權力。東南亞各國政府則盼能減少華人影響國內經濟之能力，並同時對華人後代進行政治整合，促進民族認同。泰國與菲律賓即屬民族認同政策推行較為成功案例，原因在於二國文化認同比種族認同更為強烈（Suryadinata, 2007）。華人性在泰國政治與外交政策中曾是失靈、不顯著，然現今是否會因為泰國華裔對於中國崛起感受不同而使華人性復甦，為本文與眾多相關文獻差異之處。

第五節 研究目的

泰國與中國長年以來關係友好，所謂「中泰一家親」更凸顯二國獨特關係，非其他國家可比擬。此關係奠基在二國相似文化與價值觀，又泰國政府及社會善待華人，以包容取代排斥（莊國土，2013: 5）。泰國華人在此環境下，受泰國社會文化潛移默化，最終與當地高度同化。

隨著華人融入泰國社會，其身分及國家認同出現轉變，其華人特質又稱華人性，則日趨消逝。因此，即便泰國華人踴躍參政，卻鮮少出現華人與泰國人鬥爭現象。泰國政府對華政策以國際情勢為訂定準則，亦未受其國內華人族群影響。

回顧現有文獻資料，鮮少針對泰國華人身分如何影響，抑或無法影響，泰國政治與外交。本論文研究主要以華人性消逝為楔子，探討泰國國內政治與對華政策得以免於捲入華人認同政治現象。本文以早年中國移居東南亞華人移民潮為探討基礎，另根據文獻統整東南亞華人定義，介紹各國華人同化程度，進而追蹤泰國華人性在同化機制下如何逐漸消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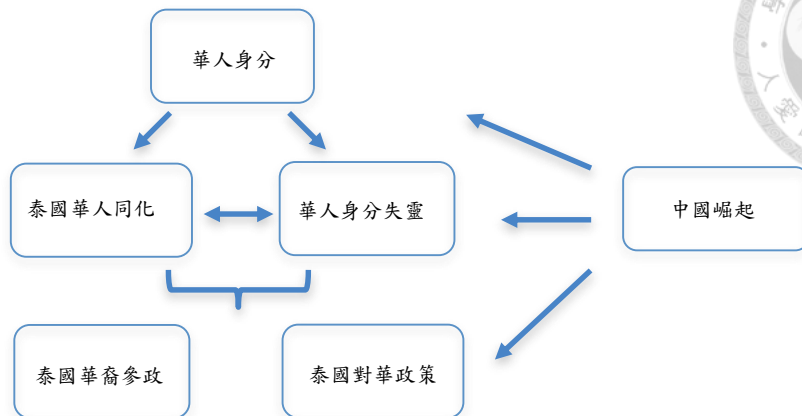
又近年中國崛起對其東南亞鄰國華人性展現各有影響，而泰國似乎有所例外，此情形在內政與外交二方面是否有證據顯示確實如此，為何是如此，或為何不是如此，厥為本論文研究問題。

第六節 研究架構與方法

壹、研究架構

以「華人身分」、「華人同化」、「華人華裔參政」以及「對華政策」作

為文章主軸，進而以中國崛起作為楔子分析其對此四大主軸之影響。



貳、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此乃最常見且最易執行之研究方法之一。由於研究為不斷積累、豐富之過程，前人研究往往為後輩研究參考精華資料。藉由傳統文獻回顧、分析與整理，研究者得以從而獲得新發想、新研究方向，以彌補前文尚未探討之領域。

本論文針對東南亞華人移民、同化、對華政策以及與中國關係，廣泛蒐集相關文獻，進行文獻之整理與研究，為求對研究主題更深之瞭解。

二、專家深度訪談法

除上述文獻分析法，本論文研究欲透過與專家學者深度訪談方式，取得一手資料，以增本論文資料多樣性。

三、比較研究法

以泰國為非典型例外，研究近年中國崛起文獻中華人認同政治異例，從泰國歷史與政治環境，說明泰國華裔認同政治與東南亞鄰國不同之歷史進程，藉以說明泰國華裔與眾不同認同政治。

四、綜合歸納法

綜合歸納文獻分析及專家深度訪談之結果，提出能解釋本論文研究問題之解答。

第二章 泰國華人族群與國內政治



本章由介紹海外華人定義作為研究起點，探討泰國華人身分如何在國內政治中未產生特殊意義。全章分為三小節，第一節討論華人身分內涵，第二節分析泰國華人與同化相互影響，第三節則剖析同化條件下泰國華裔參政情形。

第一節 華人身分內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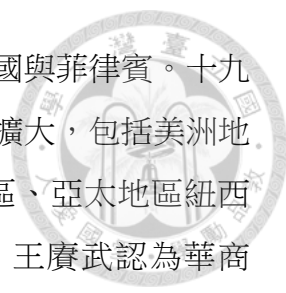
隨著數世紀以前中國人外移現象，中華文化便在世界各地駐足。如今在國際各大主要城市中，皆可看見唐人街、中國城（Chinatown）等保存及宣揚中華文化場所。中國人為尋求嶄新生活，遠離中國而漂流在外，多數人最終選擇在海外落地生根，連同將傳統及文化發揚至世界各個角落。⁷

壹、海外華人分佈

中國自古以來境內人口數便位居世界高峰，境外亦有眾多中國人分佈在世界各地。探討海外華人文獻多不勝數，如同前一章節所列舉，許多學者更特別專精研究各國家華人族群。⁸ 隨著中國人外移現象日趨頻繁，研究顯示此現象通常以連鎖形式進行，意即親戚好友傾向跟隨彼此腳步定居在特定地方（Chung, 2005:605）。自幾世紀以來，中國東南方省份常有大量中國人外移現象，此為近代歷史中重要人口移動。歷史學家尋著歷史痕跡，追蹤中國人口外移現象並發現此現象始於西元七世紀。中國在歷史上原為世界中心、強權大國，中國人對自己祖國感到驕傲，政府亦不鼓勵人民移居海外。然中國人逐漸外移主要受中國與南海貿易往來活動影響，十六世紀時更擴張至與東非交易。近代史上較顯著且大量

⁷ Simon Ostheimer, CNN Travel. 2017. "World's best Chinatowns." <http://travel.cnn.com/explorations/escape/worlds-best-chinatowns-324704> . Accessed on February 19, 2018.

⁸ 海外華人（Overseas Chinese）進一步詳細分類為：華僑（Huaqiao），暫時旅居海外的中國人。華人（Huaren），已歸化旅居地國籍的中國人。華裔（Huayi），華人的後代，不擁有中國國籍。詳細資料參考 Poston, Jr. et al., 1994: 633。



人口外移現象始於十六世紀初，當時成千上萬中國人移居至泰國與菲律賓。十九世紀下半葉，此外移現象不減反增。中國人外移國家範疇急速擴大，包括美洲地區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古巴、西印度群島、中南美洲地區、亞太地區紐西蘭、澳洲、東南亞以及非洲地區（Voss & Allen, 2008: 6）。王賡武認為華商（Huashang, Chinese traders）為最基本且歷史最悠久外移類型。⁹ 關於華裔是否包含已歸化華人，王賡武（2003: 5-9）認為確實包含，而 Dudley L. Poston, Jr.（1994:633）與同文章作者則提到華裔主要為華人後代，完全不具中國籍。多數學者表示欲準確統計世界各國華人人口數為窒礙難行，原因在於各國進行人口統計時間相異，且針對華人定義各不相同。部分國家將華人定義為只要有民族、血緣背景皆為華人，另一部分國家則認為僅具中國籍方謂華人（Chang, 1968: 97）。在 1990 年代左右，旅居 138 國之海外華僑、華人總數約莫三千七百萬，華人遷徙至東南亞居住乃數世紀前便為文獻所記載，此亦使得現今眾多華人族群在各東南亞國家生根（Poston, Jr. et al., 1994: 631）。

華人外移到世界各國類型亦有區域上之差異，如前往東南亞華人多為華商類型，然前往如美國或澳洲則為華工類型。華人雖旅居各地，然早在 1960 年代起至 80、90 年代，已約有 9 成華人居住於亞洲，而海外華人分布區域多為熱帶、沿岸及都市地區。所提之熱帶區域為位於北迴與南迴歸線（Tropic of Cancer, of Capricorn）中間國家。舉例來說，東南亞正好位於二歸線中間區域。而為何熱帶地區會成為移居熱門選項呢？其一，坐落於此區域國家剛好富有經濟潛能，如東南亞、加勒比海，主要因為十九世紀歐洲在這些國家投資與剝削所造成。其二，此區域國家天氣型態與中國相近，即便移居海外亦可良好適應。多數海外華人偏好落居沿岸區域之情形則體現於東南亞華人多居住在馬來亞半島西邊、泰國暹羅灣北邊以及爪哇北海岸。此乃受早期商人主要在鄰近港口進行交易所影響，因此眾多中國商人移居海外時皆優先選擇沿岸地區。另海外華人多來自中國南部鄉村地帶，促使他們於抵達新環境後，欲定居在較繁華區域。此原因其一為無法繼續

⁹ 這裡所提及的四種類型為以下所列：貿易商/華商型（Traders），這些貿易商為最早開始在東南亞經商的人。勞工/華工型（Labors），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期間，許多勞工因為想尋求更好的就業機會而決心前往海外工作。旅居者/華僑型（Sojourners），這些高教育與高階級旅居者多將自己視為中國文化與生活形式的代表，在海外開始了中國語言與文化的傳承。後裔/華裔型（Descendants），目前居多的東南亞華人皆為中國華人的後代，他們既不熟悉中文亦未曾在中國本土居住過；這些後裔實質上卻與中國沒有交集。詳細資料參考 Wang, 2003: 5-9。



忍受窮困生活環境，其二則為都市可提供更多工作機會（Chang, 1968: 100-102）。1990 年代海外華人分布調查亦顯示，位於東南亞之印尼與泰國的境內華人人人口佔海外華人人人口總比例較高（分別為 730 萬與 600 萬），如圖 2-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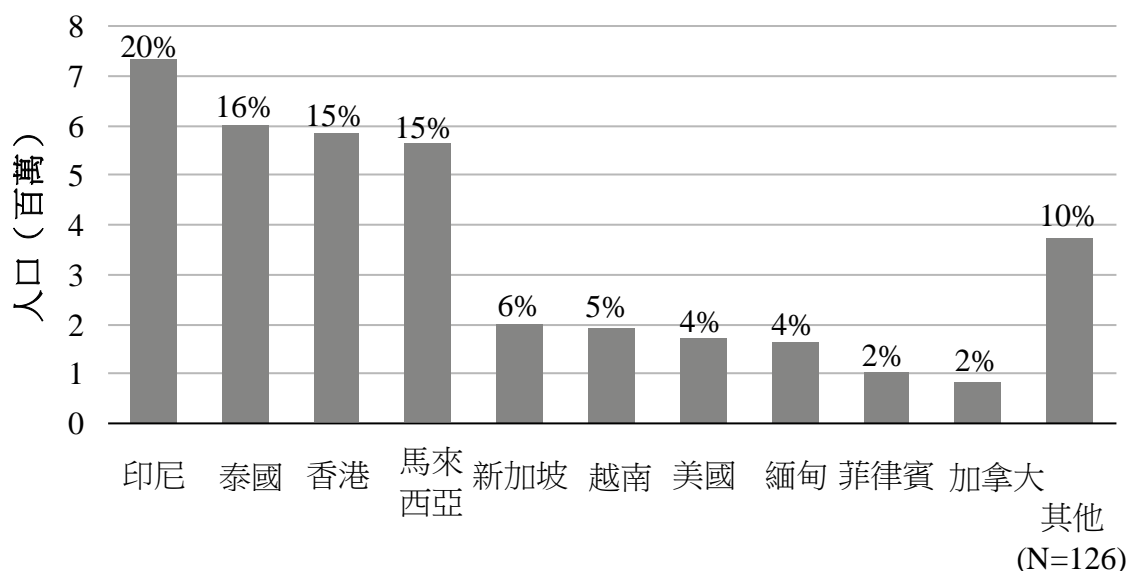


圖 2-1 1990 年境內海外華人佔海外華人人人口總比例較高之十大國家

資料來源：Poston, Jr. et al., (1994: 635)

由此圖表可見，印尼華人佔海外華人數 20%，泰國則為 16%，其他所列國家亦多為東南亞國家。根據資料顯示，遷居至東南亞之中國人多來自中國南部廣東及福建省，主因在於廣東及福建皆屬於沿海省份，較易於貿易與旅遊。例如廣東省廣州市幾世紀以來皆開放與非中國人文化、經濟交流，促成國際貿易、旅遊與向外移民。1567 年，福建省省長容許當地居民前往海外與外國人—日本人除外—貿易，因此十七、十八世紀東南亞當地已有眾多繁華華人社區、族群（Chang, 1968: 90）。至海外華人所居住區域類型則甚為廣泛，包括城市、鄉村、農村及礦區等，海外華人職位更涵蓋高層至低層位階（Unger, 1944: 202）。眾多定居南洋之中國人起初因在前往印度、中東貿易途中停留東南亞，最後決定就地生根。除商人移居他國外，眾多中國人亦選擇出國尋覓新職，但多為勞工；另一部分中國人則為逃難而離開中國（Wu, 1983:113）。


綜觀中國人外移，最主要動機仍在盼於謀取更好生活品質，抑或維持基本生存。此可謂推拉效果（push-pull dynamic）產物：中國境內貧窮、政治宗教迫

害抑或不適宜居住環境，皆迫使人民離鄉背井，而嚮往新居住地或可帶來較美好生活（Voss & Allen, 2008: 9）。至海外華人工作性質，大多取決於居住地欠缺及需要之服務類型，如貿易、農園莊園、鐵路抑或礦業。現今華人職業則演變成非勞力密集產業，如餐飲業、批發貿易業，多數成功賺取財富並成為東南亞各國境內活躍商人，最後，經商成為華人代表工作。

貳、何謂海外華人？

Chinese 一詞在使用英文上時常無法正確傳遞語意，簡單一字 Chinese 卻可能表示「中國的」、語言「中文」、種族「中國人」或「華人」、「中華民族」、「華僑」等眾多意涵。此字意思隨著時間一同演變，因此單單 Chinese 一字並無法完整詮釋華人身分內涵（Wu, 1991: 159）。人們倘若在出生地居住，便會認同自己為當地人；然而，當人們遷居至其他地區或國家，此身分認同則將有所改變。當一位中國旅人僅僅說 “I’m Chinese”，這似乎暗指中國人，然事實上亦可為華僑；此人得強調 “I’m a Chinese sojourner”，較能清楚表達其身分。又 “I’m an overseas Chinese/Chinese overseas”（海外華人）可能囊括華裔、僑生或僑胞。倘欲正確表達華裔身分，則必須說 “I’m a Chinese descendant” 實為較妥適。

對於 “overseas Chinese” 或 “Chinese overseas” 用法，王賡武（1993: 927）提出獨特看法。王賡武認為，“overseas Chinese” 在中文裡應該翻譯成「華僑」，意指旅居海外且仍具中國籍。惟近年來，此英文詞彙在使用上已擴大包含所有中國人後代，意指上一代父母親仍具中國籍。準確來說，「華僑」應不再包括已歸化之公民或海外中國人後代，這表示 “overseas Chinese” 不應再被解釋為「華僑」。至今仍未出現可囊括所有海外中國人—無論是否擁有中國籍—之英文詞彙，故王賡武選擇使用 “Chinese overseas”，「外籍華人、華裔」，意指任何居住海外之中國人後代，且不論其雙親是否仍具有中國籍。透過研讀王賡武的著作，可發現其所指的外籍華人主要為南洋華裔居多。舉例來說，一般美國華裔的英文稱呼為 “American Chinese”，日、韓華裔則為 “Japanese” 或 “Korean Chinese”，對於東南亞華裔的稱呼則顯少聽見專用的英文詞彙，故以外籍華人、華裔泛指南洋抑或其他地區華人。




中國人踏出中國領土定居他國後，即成為旅居華僑，並逐漸變成擁有雙重及多重認同華人，家族後代則僅認同居住地國籍，而成為華裔。少數華裔追根溯源，殷盼瞭解自身家族背景，甚期望再中國化（resinicization），拾回失去之華人身分。自稱中國人之人民對中國仍有情感聯繫，此乃承襲祖先傳承之文化，作為與非中國人區隔指標（Wu, 1991: 160）。而所謂雙重認同關鍵在於海外華人不僅認同居住地，同時認同中國。雙重認同又分為偏民族情感之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及偏政治之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Coughlin, 1960）。文化認同為族群基於家鄉傳統風俗文化而對中國有情感連結，除文化外，血統亦致使華人認同中國；至國家認同則偏向對政治及相關議題認同。當中國政府自 1980 年代起拒絕承認雙重國籍後，海外華人便與中國斷了聯繫，也因此多數華人國家認同演變成傾向當時生長及居住國家。有關華人身分可能為多重而非單一或雙重之議題，又究竟應如何定義抑或如何分類華人身分，至今仍為眾多學者所探究，學術研中對於華人身分定義可謂眾說紛紜。在海外華人一生中，認同乃多樣及複雜，且可能隨時變動（謝劍，2006: 15）。

探討海外華人學術著作中時常可見華人身分（Chinese identity）及華人性（Chineseness）二詞，然僅就字面解釋其內涵恐相當令人混淆，目前已有諸多文獻探討此二詞有何異同。概念上，華人性意即個人身為華人及不再身為華人，而華人身分則涉及認同，此包括國家認同、族群認同、文化認同、民族認同（ethnic identity）及階級認同（class identity）等（Wang, 2003: 222）。亦有將 Chineseness 翻譯為「中國特徵」，囊括宗教、文化及教育建制（謝劍，2006:8）。¹⁰ 總的來說，華人身分概念較為清晰，可由認同進行剖析，然華人性則較為籠統與模糊。

有關華人性內涵及意義，Rey Chow（1998: 6）曾批判此一概念恐帶有中國中心論意味，似乎暗指任何與中國相關之人事物則顯得較優越。Chow 所提主要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中國人所展現之華人性，似甚以自己國家為傲。Eugene K. B. Tan（2003: 751）則提出新加坡觀點之華人性。Tan 表示，新加坡華人性內涵

¹⁰ 戴國輝認為所謂的 Chineseness 意即中華性、中華人特徵，是身為中華人的事實（being Chinese）以及中華人式的處世態度，泛指從社會學、心理學、生物學、主觀客觀等各個層面所形成的諸多特性總體。詳細資料請參考雷玉虹，2012: 73。



除種族與文化身分，亦包括串連新加坡華人與中國緊密聯繫之過程。華人性一詞因並非不解自明（self-explanatory），故在文獻中時常可見各提出不同定義。筆者因長年觀察泰國華人，認為所謂華人性乃指個人身為華人（being Chinese）所以遵行傳統習俗、傳承歷史文化，並願意認祖歸宗、廣泛使用華語，且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皆與中國相關；此與王賡武定義之華人性相同。泰國華人与泰國本地人僅有膚色差距為肉眼可見，並無其他明顯特徵可供分辨。反觀，馬來西亞華人展現之華人性則為顯而易見。¹¹ 王賡武在其著作中亦提及華人性為某一個體自認為華人，除出生於中國且祖宗多為華人外，該個體與其他華人互動頻繁亦展現其華人性。（Wang, 2003: 222-225）

至華人身分研究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如雨後春筍般產生，主因在於二戰後更多華人外移，更出現認同問題。當時因孫中山所提倡「民族認同」概念從中國外溢至東南亞，華人除自認為中國人外，更加上強烈國家認同；在馬來亞地區，華人民族主義者更成立政黨。荷蘭籍印尼華裔 Ien Ang（1998: 227）在其著作中對於身為海外華人及華人性意義表示，儘管移居海外多年，華人性依然存在且不變。然在不同地理文化空間下，身為華人意涵則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隨著不斷變化之具體情境背景塑造而成。

參、華人身分內涵

華人對於自己的身分與認同會隨著周遭環境與事件所影響，這也是為何華人身分逐漸演變成現今包括多種認同的內涵（Wang, 2003: 222-225）。Charles Hirschman 在其著作中將王賡武對於華人身分的分析簡化成圖表，如圖 2-2：

¹¹ 就筆者自己多年來在泰國生長並觀察的經驗，接觸到的華人華裔所展現的華人性少於泰國性（Thainess）。這些華人華裔不使用中文名字、姓氏，鮮少使用華語（有些有上華語班），對於中國沒有任何情感，並自稱泰國人。筆者在他們身上看不到華人性，也認為他們就是泰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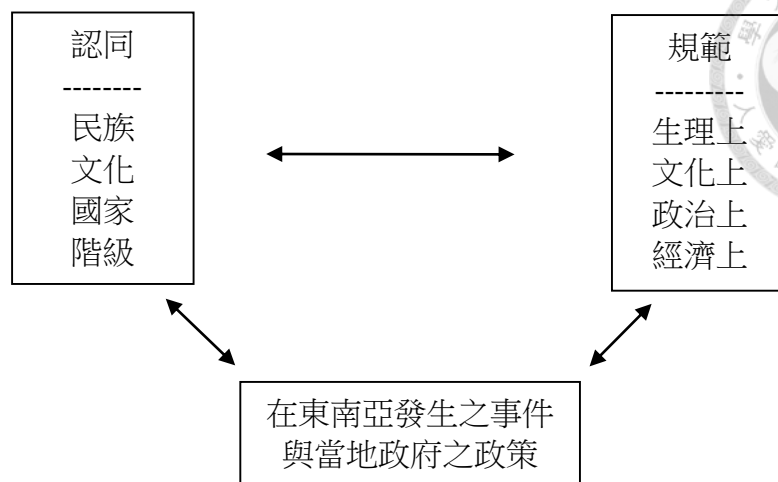


圖 2-2 王廣武的華人身分認同模型

資料來源：Hirschman (1988: 26)

右邊「認同」方框內代表需要被解釋之各種身分認同，包括民族、文化、國家及階級認同。左邊「規範」則為王廣武認為可影響各身分認同顯隱性因素，類此規範涵括共享信仰及族群。上述所提認同與規範二者皆受外在大環境及現況所影響。¹² 當研究身分認同時，與其將身分與認同想像及歸類為已完成事實，應將其視為一個待續未完成進行式；此再度呼應學者王廣武針對華人身分受各因素影響持續演進之看法 (Hall, 1990: 222)。

至華人身分建構，起初僅以簡單概念萌生而成，即倘若一個體為中國人則屬於中華民族一份子；倘能追溯一位具中國籍之男性祖先，則可謂華人。在民初提倡民族主義、中國遭受日本侵入威脅及海外華人飽受歧視等各大環境背景下，中國境外出現對中國強烈認同，對於身為中國人而驕傲。當時，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合而為一，並無分裂。三民主義與民族主義更從中國本土發揚光大外溢至海外華校、華人組織，無形中向海外華人宣傳具認同色彩之思想。海外華校對於整體華人身分建構影響甚鉅，David Yen-ho Wu (1991: 166) 以印尼為例加以說明。1957 年以前，印尼共有 2 千所華校，其中分為親台北與親北京二派。惟隨後因各不同事件使得印尼政府關閉華校，甚於 1965 年嚴禁在公開場合使用中文、表演中

¹² 階級認同意指華人身分認同可源自於他們在經濟體系位階，如勞工階級抑或資本階級，藉由自身工作性質而建立身分認同 (Wang, 2003: 222)。

國戲劇及進行宗教儀式。持續至 1970 年代，眾多印尼華人不再使用中文，多數尚未完全融入及同化之新移民亦逐漸失去中文能力。¹³

華人身分多元且具變動性，如同前述可分新舊。華人身分及認同甚為彈性，可隨身邊環境自在改變。在部分華人身上，甚至可看到重疊之華人身分。例如，部分華人於早期民族主義盛行時建立之中華民族身分可隨時間逝去，而此一舊身分終變得抽象模糊，逐漸不再影響華人生活、行為與思想（Wang, 1988），與此同時新身分緩慢建立而成。當個體移居至不同文化國家時，恐因此造成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此過程為海外華人在身分認同改變前必需面對與經歷。隨著個體離開熟悉與曾緊密聯繫之家鄉，嶄新社會環境致使個體頓失重心，因不熟悉居住地文化，而對何時該與他人握手、見面如何打招呼等各種日常生活中所需之基本社交技巧與禮儀感到陌生（Oberg, 1960: 180）。目前學術界跨文化研究領域亦探討個體身分、認同在跨文化中受到之影響。針對身分認同研究，可分為二領域，一為身分認同缺失（identity deficit），二為身分認同衝突（identity conflict）。Roy F. Baumeister（1986）在其著作 *Identity: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struggle for self* 一書中提到，認同缺失是在於個體無法建立並維持個人目標與價值，無法形成自我瞭解與定義，因此該個體將不停質問自己並盼能找尋完整自我。反觀，認同衝突則在於個體必須持續維持眾多不同個人價值與定義，而當各價值與定義相互衝突時，個體便無法擁有完整認同。猶如上述，身分認同可以新舊之分，在達到平衡前，個體將經歷認同衝突。一般來說，旅居者如海外華人，即屬較易面臨身分認同衝突之族群。海外華人因本身已有身分認同，惟在海外闖蕩時，因受當地環境影響而產生認同衝突（Leong & Ward, 2000: 765）。當個體面臨與以往不同之社會形態、道德價值、行為規範，因接收各種繁雜訊息而出現混亂現象，進而致使身分認同改變，家鄉與居住地對身份認同之影響多寡同屬學者研究範疇內；深受環境影響之身分認同，在許多時候並非單一，亦非永恆不變（Ward & Rana-Deuba, 2000: 292）。舉例來說，倘海外華人青年與居住地人民接觸經驗為正面且滿意，如當地人民給予海外華人青年善良且不具歧視性對待與回

¹³ 1958 年印尼出現區域抗爭，而因為我國政府參與此事，故印尼政府強迫關閉任何與國民黨有關聯之華校。7 年後，發生印尼政府險遭推翻事件，由於北京政府涉及此案，因此親北京華校最終亦遭迫熄燈，結束印尼僅存華語教學（Wu, 1991: 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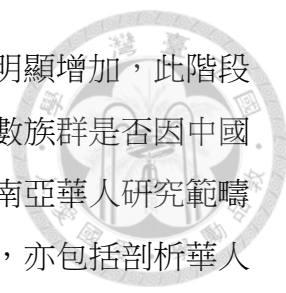
應，而青年同時又可流利使用當地語言時，則較少發生身分認同衝突。¹⁴ 以另一角度切入，種族歧視與移民族群在居住國適應不良結果甚有關聯（Lin, 2008: 131）。若海外華人因無法適應新生活而難以融入居住地社會，恐將致使居住地人民認為華人為異類，進而排斥接納。若海外華人長期在友善環境中居住，較易快速適應當地生活，並減少身分認同衝突，甚有可能直接改變自己華人身分認同。降低個體認同衝突確有助於適應及融入當地，進而逐漸改變認同。

然當個體面臨文化衝擊與身分認同衝突時，最佳改善及解決辦法為完全熟悉居住地，而要達到此一目的所須手段為認識當地語言，因語言為溝通主要管道（Oberg, 1960: 181）。當海外華人試圖適應當地生活時，學習居住地語言成為必經過程。此不僅可加速融入進程，亦可助華人產生不同身分認同。除華人自主性調適、習慣在居住地之生活，政府政策亦成為助長或壓抑新身分認同產生因素。

中國因當年歷經文化大革命後，遂於 1980 年改變接受雙重國籍作法，新公布之國籍法明定不再承認雙重國籍。此政策導致眾多海外華人在融入居住地後，毅然決然放棄中國國籍，使得身分認同不僅在文化層面有所改變，國家認同亦不復以往。對此，謝劍（2006: 14）將認同改變內因分為三部分：

- 世界觀與歸屬感改變 — 早期華人較有衣錦還鄉概念，渴望發達成功後凱旋歸國。身在海外時所創立之各類社團，乃盼成為傳承中國傳統社會形態至居住地之橋樑。惟隨逗留時間增加，新世界觀建立與舊有歸屬感日趨改變，華人漸追求融入當地、參與政治，並將居住地視為新家鄉。
- 人口結構量與質蛻變 — 早期海外華人人口結構多為性別比例不平等，且以職業較底等人口為主，然在新一代性別比例較為平均基礎上，且華人事業逐漸有成，華人對居住地看法與認同觀念必然改變。
- 華人與當地居民聯姻 — 當海外華人不再嚮往返鄉，且隨著生活適應、事業穩定後，華人便選擇與當地居民結婚，落葉生根。此時，華人原有身分認同開始變化，而華人後代則成為華裔。

¹⁴ 以筆者在泰國曼谷親身經驗，泰國華人與泰國人相處為和諧且毫無歧視。華人各個說得一口流利泰文，自認為泰國人，且結交之至親好友中更不乏泰國人。就連筆者在泰國生活十年中，也從未遭受到任何嚴重歧視，舉凡外出用餐、購物、上課求學等各類活動，筆者並未感受不公平抑或歧視性待遇。在學校求學期間亦與泰國同學打成一片，從未因我非泰國人而拒絕與我往來。




1950、60 年代，研究東南亞華人文獻因華人人口數提升而明顯增加，此階段研究主要由歷史學家及人類學家進行，主題居多為分析華人少數族群是否因中國特色文化及族群組織而與當地多數族群有所隔閡。反觀現今東南亞華人研究範疇較為廣泛，除探討在海外為少數之華人與居住地族群相處情形，亦包括剖析華人涵化（acculturation）、同化（assimilation）、華人性、華人身分、認同、政治經濟參與等，參與研究之學者不再以歷史、人類學家為主（Hirschman, 1988: 30）。在研究分析海外華人時，應謹記華人身分並非一常數，身分認同往往隨著時間、內外因素、歷史及文化等影響而有所改變。華人身分認同研究亦非一成不變，學術界此類研究已從初期使用抽象難以確切定義之「華人性」形容海外華人，演變至現今具體不易模糊之「華人身分」、「認同」定義並一一分類海外華人群族，整體研究可謂變得系統及脈絡化。自七世紀開始，歷史便記載中國人前往海外，歷經數千年，相關研究從研究海外華人在世界上分布、分析海外華人工作性質等外在範疇，擴張及深入至探討華人身分認同、華人意識等內在範疇。

對於華人身分內涵，現今仍以認同為標準，解釋海外華人對自身身分認同為何。研究海外華人對此一族群定義更有所不同，有如前述，「海外華人」或僅包括旅居海外但持有中國籍之中國人，抑或為已歸化居住地國籍之中國人，又或雙親、祖先某一方具有中國籍之後裔。由於華人身分認同多變性，使得相關研究日新月異，又因華人、華裔族群在世界上不斷演化，學者方能廣續分享嶄新研究結果。

根據研究顯示，個體身分認同常因周遭環境與內在心理因素而改變。當原先熟悉之風俗文化不復存時，個體身分認同極有可能因而轉變，逐漸對居住地產生情感聯繫。華人起初擁有之民族認同，在移居到海外後便成同化過程中關鍵且顯著要素。本節已介紹海外華人定義以及華人身分認同，下一節將探究泰國華人華裔及同化此二概念如何相互影響，且進而塑造現今與許多東南亞國家甚有差異之泰國華人族群。

第二節 泰國華人與同化

人們背井離鄉，難免有思鄉之情。中國人離開熟悉生活環境，踏出家鄉前往世界各地並展開嶄新人生。當個體已擁有對某一文化認知，在面臨新文化時應




如何應對？倘文化為強而有力行為塑型工具，個體在新文化環境中能否依舊遵照原有文化認知生活？（Berry, 1997: 5）如同搬家，人們抵達新環境後，極需儘速調適自我並適應當地生活。對海外華人來說，新環境可碰觸、看見、聽見以及品嚐之事物全構成適應障礙。除外在因素造成障礙，海外華人心理障礙同樣影響適應過程。思鄉之情可能致使華人心理鬱卒，無法提振精神，踴躍參與社交活動，進而阻礙適應進程（Anderson, 1994: 302）。個體在同一國家城鎮間遷居已需調整與適應，更遑論移居至文化截然不同之國家，此乃新移民一大挑戰。個體為有效適應當地生活，必須積極學習及瞭解新社會文化體系（sociocultural system），同時嘗試獲取各類所需社會文化技能，以便參與、融入該體系，此即跨文化適應（Anderson, 1994: 294）。海外華人在慢慢適應新環境期間，其身分認同將出現變化。學者對於在二種或多種文化相互接觸時產生之變化，以不同詞彙定義，最主要為涵化（acculturation）及同化（assimilation），而二者內涵異同亦屬眾多探究議題。

壹、涵化及同化定義

此二詞彙時常擁有相同意思，偶而則部分重疊，部分差異。Milton M. Gordon（1964: 61）認為社會學家較偏好使用涵化一詞，而人類學家則傾向使用同化。涵化乃個體或群體吸收並結合另一社會族群文化，此為結果亦為過程。亦有學者認為，涵化為不同文化群體相互不斷接觸後，致使自身或他人原有文化產生變化（Redfield et al., 1936: 149）。此涵化定義意即，其一社會族群文化將在接觸後有所改變，而反觀同化同樣為一結果與過程，惟差別在於個體或群體完全地吸收新文化而導致無法在其身上尋覓舊文化一絲軌跡，對舊文化忠誠不復尋獲（Rose, 1956: 557-8）。目前學術界針對涵化或同化究竟僅發生在個體抑或為群體現象分為二論述主軸。普遍認同涵化可為個體或群體經歷過程，惟一派指出同化較偏屬個體現象，另一派則認為同化為個體或群體現象。

Howard Woolston（1945: 424）提及，同化發生在個體進入當地社會網絡與關係並於吸收瞭解後外溢給他人之過程。然有學者表示，同化不應僅限於個體，此乃群體亦可能經歷之過程（Teske, Jr. & Nelson, 1974: 361）。另研究顯示，涵化



發生進程較同化迅速，甚可在移民第一代即有顯著差異。多數移民家族第三、第四代後裔子嗣幾毫無興趣瞭解或認識自己祖先。後裔因生長在新環境，鮮少關注祖父母原先居住之社會。以美國為例，涵化進行得較迅速之因在於美國文化為眾多移民所嚮往，且經新聞媒體大肆渲染，移民內心對當地文化早烙印深刻且刻板印象，爰加速涵化進程。此亦可套用於選擇移民之海外華人，因對新國家抱有希望及幻想，產生移民誘因，且通常較能迅速接受及適應當地文化。此外，涵化無需當地社會接受或給予正面回應，然同化仰賴另一文化釋出善意方能進行（Gans, 1997: 878）。

除上述所提研究外，Raymond H.C. Teske, Jr. 與 Bardin H. Nelson（1974: 351）亦在其著作中詳細地定義並區分涵化及同化概念與意涵。涵化為具不同程度之文化適應過程，並非單一事件。涵化意指個體適應新環境抑或因接觸新文化而逐漸改變原有文化認知，此乃文化與心理上雙重變化（Berry, 2005: 698）。影響涵化因素可分為五類：其一，時間長短；其二，涵化策略；其三，應對策略與資源；其四，社會支持；最後則為社會態度。所謂涵化策略意指個體或群體面對涵化所展現的態度與行為影響整體過程，而社會態度則為當地社會普遍態度是否具偏見或歧視（Berry, 1997: 15）。無論在個人或群體中，皆可發現涵化過程，而當地社會環境與個體、群體本身心理態度皆影響涵化進展。二種文化需長時間有第一手接觸方能開始涵化過程，所謂第一手接觸意即與另一文化親身接觸，而非藉由他人轉述或閱讀書籍吸收該文化。有關經由上述接觸所形成之涵化為單向抑或雙向，則有不同學說。E. C. Parsons（1936）以涵化為單向進程與同化區分，Parsons 認為同化屬於二種文化付出與收穫（give and take）相互影響。¹⁵ 又 Theodore D. Graves（1967:337）提出，涵化發生在社會中少數民族身上，而非多數民族。學術界傾向將涵化視為某一文化單方面受影響而改變，然另一派認為如同化般，乃二種文化同時受彼此影響而產生變化。¹⁶ 支持雙向說法之學者指出，涵化為其中一方或雙方都因長期第一手接觸，進而交換且改變原有文化基礎

¹⁵ Parsons 所提區分被認為無法成立，原因在於眾多文獻顯示涵化為雙向，同化為單向（Teske, Jr., & Nelson: 1974: 363）。

¹⁶ 更多有關涵化屬單方面或雙方面改變過程文獻可參考 “Acculturation and Assimilation: A Clarification”（*Ibid*: 353-4）。



(Redfield et al, 1936: 149; Herskovits, 1938: 15)。¹⁷ 另一說法為倘比較涵化及同化，則涵化群體為即便在第二、第三代民族性消逝，仍將保留些許顯著民族社會傳統特徵 (Gans, 1997: 876)。


二種文化相互接觸為涵化及同化皆不可或缺因素，惟同化過程與涵化略為不同。當個體或群體接觸其他個體或群體記憶、感觸與態度後，經由相互穿透及融合過程，雙方將彼此經驗與歷史嵌入共同生活文化，此即同化 (Park & Burgess: 1924: 735)。大眾普遍將同化解讀為，原不同文化個體經一段時間後，分享類似甚至相同外貌或禮節，惟外表相似並不意味整體一致性 (Woolston, 1954: 416)。如雙親為不同民族之混血兒或在外貌上有著與某一民族近一半相似度，然其內在身分認同、思想或與該民族天差地遠，此特徵則無法顯現在個體外貌上。

除相互接觸外，共同語言亦為不同文化群體更加親近必要工具。倘二種文化個體缺少共通表達能力，則將構成同化過程一大阻礙 (Park & Burgess, 1924: 736-7)。同化較涵化需要另一文化認同與接受，二種文化須正面互動方可同化。有關同化為單向或雙向，部份文獻指出，同化主體分為被動 (被同化者) 與主動 (同化推行者) 二群體，主動影響被動，而非相互影響。同化屬單向影響之關鍵在於，二種文化原有差異與衝突逐漸消失，意即被同化者不再遵從舊有風俗文化 (Cuber, 1955:609)。同化可進一步細分為七個階段或類型，如下 (Gordon, 1964: 71)：

文化、行為同化 → 結構同化 → 婚姻同化 → 認同同化
→ 接受態度同化 → 接受行為同化 → 公民同化

首先，文化、行為同化 (cultural or behavioral assimilation) 意即文化模式改變，包括宗教信仰與儀式，又稱涵化。如日常生活中飲食、語言這類外顯文化特質，較易發生同化現象 (李巧寧，2007: 61)。其二，結構同化 (structural assimilation) 意指個體為融入當地主流社會社交網絡，積極大規模參與當地各類性質社團、俱樂部、派系或組織。結構同化可謂最為重要，個體或群體通常較難融入主流社會，倘順利同化，此對後續同化階段影響甚鉅。其三，婚姻同化

¹⁷ Redfield et al (1936: 149) 在其著作提到同化有的時候是屬於涵化過程的一個階段。



(marital assimilation)，此謂大規模通婚，又稱族群合併、融合 (amalgamation)。其四，認同同化 (identificational assimilation) 意即以當地民族定義人民 (peoplehood)，認同自己屬於當地主流社會內。其五，接受態度同化 (attitude receptional assimilation) 意味著不受偏見態度對待，當地居民不再對移民抱持刻板印象。其六，接受行為同化 (behavior receptional assimilation) 代表個體不受歧視性對待。最後則為公民同化 (civic assimilation)，表示個體在當地社會中並無價值抑或權力衝突，且與當地民族共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為同一群體之境界。然針對 Gordon 將通婚視為婚姻同化，Park & Burgess (1924: 737) 認為通婚必須與同化有所區別。通婚為生理及種族融合，同化則屬文化融合。惟不可否認通婚確能推動同化及雙方相互培育文化遺產。不同種族之混血子嗣除遺傳雙方生理特徵，更受雙方生活型態、思想及感觸等影響，構成同化所需之第一手接觸環境。

同化並非涵化過程中某一階段或最終成果，此二者屬不同文化磨合過程。然同化確依賴涵化，成功涵化可造就深度同化。猶如 Gordon 提出之七同化階段或類型，涵化為其中一個類型，亦可視為同化過程第一階段 (Teske, Jr. & Nelson, 1974: 364)。同化過程完整性與快速性取決於社會接觸的頻率與深度，有如學習語言最有效方式為直接在該國生活，個體在同化過程中亦須快速、深入且頻繁與當地社會接觸 (Park & Burgess, 1924: 739)。由此可見，第一手接觸為涵化及同化最根本且重要之構成要素。

貳、泰國華人同化過程

當新移民初抵新國家與社會，個體身分認同在涵化過程中扮演或不可缺角色。個體或群體民族認同乃與血緣上民族身分有所不同，前者可因環境而改變，後者則無法。 (Pinney *et al.*, 2001: 494)。上一小節提及，身分認同易受外在環境影響而改變，故海外華人定居新國家時，其原有文化與當地文化接觸、摩擦，涵化及同化過程因而開始。影響身分認同之因素，除大環境外，個體家庭教育亦為其一。研究美國墨西哥裔身分認同之調查文獻顯示，當移民家庭父母對墨西哥文化高度認同時，則將教育其子女同樣認同該文化，使得子女對該文化同樣高度認

同 (Farver et al., 2002: 339)。位於東南亞海外華人後代亦出現類此受家庭影響之高度認同，而本文欲探討之泰國華人族群即為一個例子。

早在十二、十三世紀當時，泰國即為中國藩屬並定期向中國進貢，兩國更相互餽贈各式禮品以維持友好關係 (封麗金, 2011: 5)。紀錄顯示當時已有中國人移居泰國，而華人在泰國定居數世代後，其子女與後裔皆把祖先與自己視為泰國人，此乃因其家族在當地居住數十年甚至百年，已幾近融入當地文化。早期華人多被歸類為對種族十分忠誠且因身為華人而自認優越之群體。由於此群體難以且幾近無法涵化及同化，甚曾被稱為「無法改變之華人」 (Skinner, 1957a: 237)。然最終我們見到泰國華人走出屬於自己，且有別於東南亞他國之道路。泰國華人雖融入泰國當地社會，卻仍保留一絲絲中華文化。十五世紀時，泰國那萊王 (Narai the Great) 在位期間便給予中國商人享有與當地人同等待遇，如同現今國際貿易所提國民待遇原則。皇室此一政策背後因素，除因當時二國貿易之營利為泰國經濟主要收入外，亦在於中國商人經商不僅未造成任何貿易障礙，並遵守泰國風俗禮儀，且每每與泰國皇室會面時態度既謙虛又服從，給予皇室相當良好印象 (Jiang, 1966: 43, 56)。中國與泰國因緣並未止於此，1767 年緬甸入侵、佔領並摧毀泰國首都時，一位勇敢華人第二代青年—鄭信 (Taksin) —挺身而出，氣勢磅礴抵抗並打敗外來者，戰後更自行登基為國王 (Taksin the Great)，在位十五年 (1767-1782)。¹⁸ 由於鄭信父親為廣東省潮州人，因感念故鄉，執政時便給予境內潮州人優渥待遇，故吸引且鼓勵潮州人留根泰國。眾多學者認為，此說法解釋為何絕大部分泰國華人具潮州背景。

由上述可見，泰國與華人緊密關聯乃幾世紀以前便已建立，此亦為泰國華人与其他東南亞國家華人相異之處。儘管鄭信因遭親信謀殺而僅在位 15 年，其事蹟仍流傳歷史，且在泰國皇室族譜上留下華人血統。至謀殺鄭信之親信，則為建立當今泰國卻克里皇朝 (Chakri Dynasty) 之拉瑪一世國王 (King Rama I)，於登基後將首都遷至曼谷。當時泰國華人主要聚集於曼谷市區，隨後因國王下令而遷移至鄰近曼谷區域，至今該區仍為華人主要聚集處 (Jiang, 1966: 40)。1929 年人口普查顯示，逾半華人居住在曼谷都會區，組成四成該市人口。其餘華人雖非定

¹⁸ Taksin 的名字除了鄭信外，亦有翻譯成鄭昭，然「昭」實為泰文 เจ้า (Chao) 形容「王」一字的音譯，因此正確翻譯應為鄭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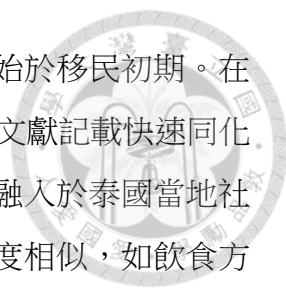
居曼谷，然仍選在泰國其他商業發展蓬勃城鎮，而盡量避開鄉村部落（Unger, 1944: 203-5）。華人選擇居住在曼谷或繁華城市主要因素在於，絕大部分華人因經濟困難離開中國，尋覓新生活，而往往一國首都及大型都市具較多經商機會，因此造就華人聚集並就地發展現象。長期以來，戰爭、饑荒及經濟為中國人離開家鄉最主要因素，部分中國人離開中國前往泰國可能出於自願，惟多數人皆因無法在中國繼續生活而被迫背井離鄉。一份 1934-35 年間調查顯示，受訪者中高達 70% 表示離開中國因素在於遭遇經濟壓力，數據如表 2-1：

表 2-1：1934-35 年間華人移民至泰國原因調查

移民原因	家庭戶數	百分比
經濟壓力	633	69.95
與南洋舊有關聯	176	19.45
天然災難損失	31	3.43
計畫拓展事業	26	2.87
不良行為	17	1.88
當地騷亂	7	0.77
家庭爭執	7	0.77
其他	8	0.88
總計	905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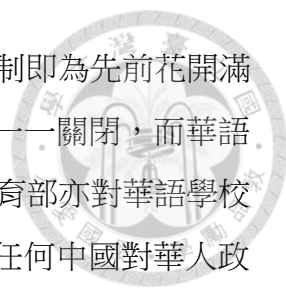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Chen (1940: 259-260)

依官方統計，現今泰國境內有約莫 11% 人口為華人、華裔，幾百年來他們並未遭受嚴重歧視，成功落地生根並在泰國社會、政治與經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此一現象促使眾多學者探究泰國華人涵化及同化發展。相較鄰近東南亞國家，泰國華人與泰國人確實形成你我共存之社會。華人長期且頻繁地與泰國社會交流，以泰文作為溝通語言，在社交場合上認同自己為泰國人，此乃涵化及同化過程。涵化無需經同化過程進行，然完整同化卻仰賴深度且全面涵化。



G. William Skinner (1957a: 237) 指出，泰國華人同化始於移民初期。在十六世紀前即有間接文獻顯示同化進程，而自 1910 年開始則有文獻記載快速同化進程。當時部分華人第二代及幾乎所有第三代皆已完整同化並融入於泰國當地社會。雙方文化可順利同化關鍵在於，泰國與中國東南部文化高度相似，如飲食方面皆以米飯、魚類及豬肉為主食，宗教則以佛教為共同點。此外，泰國人與華人外貌上差異較東西方人種相比來得些微。Skinner (1957a: 238) 於其著作中亦列出三個影響泰國華人同化甚鉅之因素，分別為通婚、教育以及民族主義。早期移民至泰國之華人以男性為主，定居後結婚對象多為泰國女性抑或中泰混血女性，致使眾多華人後代皆有泰國女性祖先。至於教育方面，在 1910 年之前可受正式華語教育學生少之又少，當首批華人社區學校成立於 1910 年後，華語學校便像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拓展華語教學，促進雙方群族交流及同化。早期中國法律將海外華人視為叛逃家鄉罪犯，進而截斷華人對於中國情感聯繫，不復認同中國為家鄉。當國父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政府，建立中華民國時，民族主義因而誕生。在此一潮流下，海外華人建立嶄新民族認同，故當時泰國華人同化過程較過往緩慢。身為泰國社會中產階級，下有泰國農民，上有泰國菁英，華人仍掌握國家整體經濟及商業動脈。華人主要為中盤商，負責對外出口貿易業務。1938 年年度報告指出，泰國九成商業及貿易掌握在華人手中，顯示華人在泰國經貿重要地位。以涵化及同化理論分析之，泰國華人與當地社會頻密交流，進行第一手接觸，致使涵化或同化進程加速且更為完整。除經手商貿業務，泰國華人另成立商會，建立中國銀行分行、發行中文報紙及創立華語學校，並遠從中國特聘華語教師，同時亦組織秘密地下社團，維持華人情感聯繫。華人族群蓬勃發展，同化過程因而從遲緩變成中止，致使在 1932 年泰國革命中上台之民族主義者，採取一系列強行同化政策 (Vandenbosch, 1947: 83-84)。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南亞各國因紛紛追求獨立建國而風雲激盪，反觀從未被殖民之泰國，未產生極盼獨立而強烈之國家與民族意識，故相較於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對外來者較無歧視及憤怒態度 (謝劍，2006: 12-3)。然緊接著中國新政權成立，儘管華人對於中國文化聯繫受政治風雲變化影響而削弱，然泰國政府甚為畏懼共產主義經由華人滲透泰國。在當時泰國總理 Phibun Songkhram 領導



下，政府在 1948 年推動一系列積極限制華人政策。¹⁹ 首要限制即為先前花開滿天下之華語學校與教育。政策公布後一個月內，所有華語中學一一關閉，而華語小學則須從 430 間縮減為 152 間。1948 至 1955 年間，泰國教育部亦對華語學校設置嚴格財政上限，企圖泰國化學校人員及課程，更嘗試剔除任何中國對華人政治影響。政策執行成效顯著，1955 年間所有華語學校多數職員為泰國人，課程安排改以泰語教學為主，華語為輔。為遏止共產主義侵襲，泰國政府不僅對教育動刀，亦插手干涉經濟。政府大規模提升當地職業學校教育品質，並在工業、運輸、商業及金融業積極擴張國營企業，盼可提高泰國人在本土經濟重要性。總理 Phibun 自 1950 年開始全力推動僱用法案並在 1965 年通過，此法案規定，凡任何企業僱用 10 位員工以上，則須依照皇家法令，確保企業人員 5 成以上為泰籍員工（Coughlin, 1952: 382; Skinner, 1959: 139）。此法案不僅保護泰國人就業機會，更藉以限縮華人企業發展。泰國政府另一歧視性華人政策為國籍限制。1951 年選舉法限制，選舉參選人父親必須具泰國。此外，1953 年國籍法規定，不再給予雖在泰國出生但雙親為中國籍之嬰兒泰國籍。²⁰ 除限制國籍取得方式，內政部早在 1943 年便規定外國人不得購買泰國土地，除其原國籍國家與泰國簽署土地互惠相關條約。由於當時中國與泰國並無此類協定，故不具泰國籍華人須藉由泰國籍配偶或子女，甚懇請友人協助，方可購買土地。內政部亦自 1952 年起開除機關內部華人員工，除其職務為泰國人不願接手者除外。上述所列歧視性政策方針可視為推動同化過程手法（Skinner, 1957b: 320, 374; Coughlin, 1952: 383, 385）。限制華人政策除避免共產主義流入泰國，同時亦促進華人與泰國人合作。多數華人企業為保障生存而邀請泰國政府官員加入董事會，建立緊密政商網絡，變相地推動同化進程。前述針對華人歧視政策至 1955 年趨於緩減，總理 Phibun 甚公開宣布，政府將盡可能給予華人與泰國人相同權利與待遇，另將減少居留證費用，盼藉以推動同化與融合（蕭文軒、顧長永，2014: 18）。1975 年，中國與泰國政治建交後，雙方交流互動更為良好，進而逐步達到現今華人與泰國本地人和諧相處且共存狀態（Skinner, 1957a: 247）。由於華人不再遭遇歧視性對待，當中國政府在 80

¹⁹ 簡稱 Phibun，亦有將其姓名稱為 Pibulsonggram，任期為 1938-44, 1948-57 年。

²⁰ 自 1911 年至 1952 年，所有於泰國境內出生的孩子皆可自動獲得泰國國籍，不論其雙親是否具泰國籍。詳細資料參考 Skinner, 1957a: 244。

年代宣布拒絕承認雙重國籍時，迫使原保留中國籍華人須擇一國籍，而絕大多數華人不意外地選擇入籍泰國。

泰國華人在居住地生活情形與其他東南亞國家華人相比可謂相去甚遠。泰國當地治理政府菁英與掌握商業華人互通良好關係，金錢與政治撮合二種文化融合。在 70 年代東南亞，泰國政府除對華語教育限制較多，其他各方面給予華人空間與自由，如華人企業公司行號可用中文名稱、公職人員可具華人背景，此開放政策在其他東南亞國家難見（Chang, 1973: 588, 591）。包容且廣納華人群族政策使華人更能無縫接軌融入當地社會，透過文化交流、通婚及教育等多種管道，華人身分認同亦因而改變。早期定居泰國之華人確可稱為華僑抑或華人，然其子嗣因身份認同轉變，應稱華裔較為妥適。欲追溯華人家族後代實為困難，因泰國華人第二代通常在各方面已相當本土化，第三、四代對祖先、宗親及祖譜等更一無所知。此外，眾多華人家族第三、四代子嗣皆捨棄原有中文姓氏，部分家族選擇完全捨棄原有姓氏並另取泰文姓氏，部分則將原有姓氏與泰文姓氏合併。²¹ Skinner（1957b: 382）發現，某些印尼華人清楚知悉家族十二代祖先，此在泰國華人家族甚為罕見。Skinner 認為泰國華人終將完全同化且僅剩單一認同，此推測有別於 Coughlin（1960）在其著作中提及之雙重認同。

在如此融入當地社會前提下，一位泰國華人身分認同可同時為中國人、潮州人、現代亞洲人及忠誠泰國人，華人可能不僅擁有單一身分認同。海外華人如泰國華人擁有第三文化（third culture），意即個體非完全泰國人亦非完全中國人，而為二種文化融合下產物，第三文化（Nonini & Ong, 1997: 11, 26）。William A. Callahan（2003: 495）在其著作中指出，泰國華人研究相較其他東南亞國家，如馬來西亞，較為困難，畢竟馬來西亞官方將種族清楚分類，明訂馬來人、華人及印度人身分，惟泰國華人早已順利融入當地，且華人認同自身為泰國人，外人著實難以分辨誰具華人血統。除難以區分泰國華人及泰國人外，泰國華人亦改變原有學術對「華人性」定義。由於華人性已與泰人性（Thainess）高度融合，已無法如過往輕易劃線界定何為華人及何謂身為華人（Callahan, 2003: 499）。相對的，

²¹ 以筆者在泰國所認識華人同學姓氏為例，原本姓「林」可能會保留成 sae Lim，如 Bong sae Lim，此處 sae Lim 意指姓林。抑或將原姓氏「陳」併入泰文姓氏，如 Tantanatipuyong，Tan 即潮州話發音「陳」。



泰人性內涵同樣受影響並逐漸包括華人性，故華人及泰國人呈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現象。

東南亞華人是否會因當地環境影響而完全同化，此結果難以預測，畢竟各地華人所面對變數相異。然華人是否將褪去原有華人性及中國特徵，如風俗文化、宗教以及教育，進而融入當地社會乃學者所關注議題（Heidhues, 1974: 58）。若嚴謹定義同化，此詞彙意指某一群體吸收另一群體，造成後者原有文化消失殆盡。反觀涵化則為二群體文化相互接觸與影響，並未致使群體原有文化消逝。故部分學者認為，泰國華人未被同化，而為涵化。主因在於華人原有中國文化仍對泰國社會影響甚鉅，而自身亦因當地文化而改變。惟若以上述涵化及同化定義分析泰國華人，則無法符合二者任一內涵，因泰國華人與當地融合程度遠遠超越文化上涵化，確偏向同化，然二種文化又相互影響彼此。

東南亞國家中，絕大部分華人群體經歷涵化過程，而非同化，然泰國為一特例（謝劍，2006: 8）。與其說泰國政府對華人實施同化政策，應稱該政策為「民族融合」政策，以一視同仁手段為達民族和睦目的。相較於實施歧視性政策易使華人反抗政府，累積反效果，泰國選擇給予華人平等政治待遇、社會地位與經濟機會，平等可謂民族融合成功核心因素。泰國之所以視為非同化亦非涵化特例主要原因在於，儘管華人皆為泰籍，使用泰語，就讀泰國學校，然泰國各地仍可見組織完善之華人社團，如宗親會及商會等。曼谷早在廿年前既已有逾 200 個華人社團，其中眾多社團更建立會館以便鄉親定期聚會，聯繫情感。即便華人與中國不再具有緊密關聯，華人仍在海外建立交流網絡，傳承流傳並發揚光大甚具特色之第三文化（許國棟，1994: 28, 31）。²² 華人在泰國從自由經商掌握經濟，至面臨歧視關閉華文學校，至與當地社會和平共處，一路上歷經風雨後方得安居樂業。

文獻顯示，泰國為對待華人最友善且限制最寬鬆之國家，此亦塑造今日特殊泰國華人族群。華人並未完全同化，即便他們入泰籍、說泰語、使用泰國姓氏等，惟仍保留部分中華文化。泰國華人族群特色吸引眾多學者探究，環境、政策、

²² 筆者本身在泰國曼谷生活時，具華人血統朋友曾跟筆者介紹「中華會館」。如同臺商在曼谷建立「臺灣會館」，中華會館不僅提供華人一個交流場所，亦聘請臺灣老師教授華語，筆者眾多朋友皆在中華會館學習華語。

文化等各因素如何雕刻出獨樹一格之泰國華人族群。從華人參與泰國國內政治現象可見，泰國政府已卸下心房，不再拒華人於門外。國家政治大事向為一國核心，而給予華人參與機會意表政府視華人為自己人。本文下一節將進一步探究華人參與政治生態。



第三節 同化與融合條件下泰國華人政治參與

本章第一節曾提及，身分認同主要可分為國家、民族、文化、階級以及政治等多種認同。本節欲探討泰國華人在前一節所述同化及融合條件下，如何參與國內政治，及其政治認同所扮演角色。

「政治認同」意指，個體對於政治自我（political self）表現，而個體在群體生活中須決定身屬何政治團體（黃俊傑，2006: 148）。華人政治認同往往與是否取得居留國公民權、國籍及身分密切關聯。一般來說，取得公民權即表示個體可真正得到與當地人民同等待遇，此對華人身分認同具顯著影響。²³ 政治認同為個體心理轉變過程，由落葉歸根轉為落地生根之情感培養歷程（楊麗，2008: 83）。政治認同亦為公民對政治權力贊同與認定，如認同該組織或權力所訂定政策、制度及政治思想。心理認同可潛移默化至生理行為與行動，而該行為則表現於個體政治參與（蕭文軒、顧長永，2014: 127）。個體參與政治形式可區分為公民主動接觸、合作活動、投票以及競選活動（郭秋永，1993: 23）。其中投票與參選乃現今社會中較普遍常見之公民政治參與，而當華人得進行上述任一政治參與行為時，意味華人已屬於該國家公民，享有與泰國人相同政治權利。政治權利乃個體與群體基本權利，為經濟利益保障，此對華人來說為必要關鍵（莊國土，2003: 29）。

²³ 詳細資料參考曹雲華、許梅、鄧仕超編，《東南亞華人的政治參與》。轉引自楊麗，2008: 83。

壹、早期泰國華人政治參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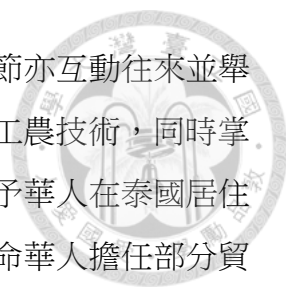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抗日戰爭時期，因革命情誼促使泰國華人建立傾向中國之國家、民族及政治認同。華人雖人在他鄉異地，仍以各方式支援中國境內革命與抗鬥，如捐贈物資、籌募捐款，或甚返回中國一同參戰等（范錦榮，2011: 21）。當時華人心繫中國，民主政治意識在華人心中萌芽茁壯，然華人政治覺醒卻無法有多餘心思給予泰國國內政治關注。此一情形卻因泰國政府所推動政策而產生劇變，最後則發展成現今我們所見，華人完全融入泰國國內政治生態。因華人善於經商累積財富並妥善運用財產，故多數泰國貴族菁英皆為華人。早在 40 年代，泰國政府即九成官員具華人血統，眾多華人更任職高官（Unger, 1944: 204）。舉例來說，曾先後二次出任泰國外交部長，三次出任泰國副總理職務，且於 2000 年當選為泰國國會主席兼下議院議長披猜（**Bhichai Rattakul** พิชัย รัตกุล，陳裕財）即為華人（黃鏞琨，1989: 29）。²⁴ 百年累積下來，泰國境內可追溯背景之華人人數成長至總人口數 10%，成為泰國不可忽視之族群。華人從早期初來乍至今，歷經風霜雪雨及動盪變遷，如今泰中二族可謂互動關係親且密。華人生長於此，忠於泰國，亦為泰國繁榮有所貢獻（王偉民，1988: 57）。

細究泰國人民認同，由於泰國本地人以泰族為主，而泰國不僅偏單一民族性且未曾受殖民統治，故泰國人相較其他東南亞民族似更清楚瞭解自身認同。面對外來者，泰國人與其他東南亞人民不同，通常並不認為恐因外來者而遭遇威脅，進而塑造容易使外來者輕鬆融入當地社會、政治與經濟生活環境。數世紀以來，泰國皇室寬容對待華人，使華人與泰國人共為國家社稷奮鬥打拼，同甘共苦。²⁵ 泰國華人可順利融入當地社會須歸功泰國皇室當時制定之對華政策。

回顧泰國華人參與政治歷史紀錄，華人參與政治乃自 12 世紀華人顯著移民至南洋時即已記載。起初，泰國政府重用華人官員主要為借用華人貿易專長及推行「以華治華」治理方式。早在 1350 年大城王國（**Ayutthaya Kingdom, 1351-1767**）

²⁴ 披猜更多次率團訪問其故鄉汕頭，詳細資料參考「泰國前國會主席披猜•拉達軍率代表團訪問汕頭」，國際日報，2009 年 9 月 7 日。<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9/09-08/1854535.shtml>。上網檢視日期 2018 年 3 月 14 日。

²⁵ 泰國舊名為暹羅（**Siam**），於 1939 年改為泰國（**Thailand**），1945 至 49 年又恢復為暹羅，1949 年後正式改回泰國。為使文章通順，故本文統一使用泰國稱之。



時期，泰國與中國開始進行朝貢貿易，二國除貿易外，雙方使節亦互動往來並舉辦文化交流等活動。相較東南亞國家，中國自古以來擁有先進工農技術，同時掌握貿易技巧，泰國國王甚為依賴華人發展國內經貿，並為此給予華人在泰國居住與行動便利。此外，泰國國王對華人信任日趨深厚，因此更任命華人擔任部分貿易機構職位，如外事官員及外貿船主等，以鞏固中暹二國貿易夥伴關係（許梅，2002a: 16）。當時皇家貨物倉庫廳負責管理對中貿易之左港廳所僱用人員全為華人，由此可見泰國政府甚為放心將貿易交手華人（鄭午樓，2003: 33-4）。華人在政府部門工作雖以貿易商業領域為主，然亦間接參與政治活動，如與中國往來交涉之外交領域。政府不僅在貿易領域給予華人方便，大城王國法律明文規定，泰國婦女僅得與華人通婚，不允許與任何其他國籍者結婚。²⁶ 寬容政策允許華人在泰國順利經商獲取鉅額利潤，落地生根，同時協助皇室對外貿易。華人跨足政治領域關鍵在於泰國皇室以封官進爵方式回報華人提振經濟，除得到官位，華人也因政治參與而換得了商業利益之保障。

前一節提及鄭信為泰國史上首位具華人血統國王，出生於泰國華人家庭但幼童時期即過繼給當時財政大臣，因而造就與皇室及政府緊密關係。1766 年緬甸入侵泰國，當時鄭信招集泰國人及華人一同抗緬，華人不僅勇於參與抗戰，亦慷慨解囊捐贈補給物資。學者認為鄭信成功團結泰國人及華人力量，甚至藉此完成復國大業，此乃前無古人，後無來者（Purcell, 1966: 89; 范錦榮，2011: 8）。鄭信成為國王所建立之吞武里王朝（Thonburi Kingdom, 1768-1782）對華人待遇同樣友善，延續前朝作法。鄭信給予在經濟及政治事務貢獻良多之華人爵位、官位，更重要為交托信任。如泰國華人史上留名政治人物—吳陽，曾任稅吏一職，後因表現優異而受封子爵，皇室甚至給予吳陽府尹官位，逝世後則追封為公爵，吳氏八代更因有功於皇室而同樣任職府尹官位（許梅，2002a: 17）。²⁷然為何華人須挺身而出，積極協助抗緬？華人表面看似愛國情懷，視泰國為祖國，惟背後原因恐涉及保護自身安全及商業利益。無論如何，華人使用資本買下了政治參與的門票，讓華人更能融入到國家社會的核心中。

²⁶ 《律法》「不准西方人和印度人與泰國婦女結婚，因為這樣外國人與泰國婦女所生的子女會向外國洩漏國家機密，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華僑則不受限制，可以和泰國婦女自由通婚，可以在泰國境內自由旅行、自由活動。」詳細資料參考范錦榮，2011: 7。

²⁷ 府尹官位等同於一府之主官。

鄭信僅僅執政 15 年，泰國便再度面臨改朝換代。吞武里王朝由鄭信親信 Phra Phutthayotfa Chulalok 建立之曼谷王朝（Chakri Dynasty）取而代之，新國王登基為拉瑪一世（Rama I）。²⁸ 1820 年至 1850 年間，由於華人數目劇增，政府除沿襲前朝以華治華作法，更增加開放相關職位，大方任命華人官員，相關職位內容如表 2-2 所列：

表 2-2：華人職位表

華僑官員職位	任命人選	職責	管轄、派駐範圍
華民政務司司長	原為泰國官員抑或高知名度之華人領袖	看管中泰貿易以及華人事務	華人聚集區域
華僑縣令	所在地中有威望、具說服華人能力之人	協助看管華人生活、調查華人戶口、協調華人之間爭執、協助處理民事刑事案件	華人聚集區域
華僑監察縣令	同上	同上，但因為管轄區域較廣，官階高於華僑縣令	華人不密集但地域較廣之城鎮
華僑副城尹	同上	同上	較多華僑縣令之城鎮
泰國治下華僑領事	同上	同上，同時亦為華僑法庭司法代表	華僑聚集之內地城鎮（如大城）

資料來源：范錦榮，2011: 13

為有效管理境內數目不斷增加之華人族群，泰國政府廣設上列職務，加強以華治華政策。任職官員除須協助華人處理各項業務，亦管理華人戶口登記、記錄人口分布及蒐報就業情況等。此手段屬溫和同化政策，藉由給予華人官位爵位，參與政治與治理，使華人願意效忠皇室及國家。資料顯示，位於上層社會之華人菁英確為較早順利同化群體（許梅，2002a: 16）。拉瑪一世及二世時期，華人因從事帆船貿易獲得鉅額利潤，繳納高額稅收解決泰國國庫財政問題，皇室對於華人貢獻甚為關注，使得華人得與皇室親近，獲得升官機會。政府在拉瑪三世時期，採取稅收承包制度，以進一步擴大徵稅、增加國庫收入。此制度將徵稅作業外包商人，由商人負責向人民收取稅金。華人因經商成功，通常可順利投標取得承包。

²⁸ 曼谷王朝為當今泰國皇室，拉瑪十世瓦吉拉隆功國王（His Majesty King Maha Vajiralongkorn Bodindradebayavarangkun 於 2016 年 10 月 13 日繼位，其父為在位 70 年拉瑪九世蒲美蓬國王（His Majesty King Bhumibol Adulyadej）。




又華人與當地泰國人較無情感聯繫，收取稅金輕鬆容易，易帶給國家固定鉅額收入，有助建立與政府關係，因此獲得政治地位與權勢（范錦榮，2011: 14）。拉瑪五世（King Chulalongkorn, 1868-1910）則曾表示（Skinner, 1957a: 240）：

「我的政策向來即為，在暹羅的華人都應該享有與泰國人相同工作機會及待遇。我視華人為這個國家重要一份子，而非外來者，理應共同分享這個國家繁榮與進步。」

泰國皇室與政府對華人寬容政策可由上述之言得知，皇室與華人關係不僅密切，皇室對華人更一視同仁，給予平等對待。然拉瑪六世登基後，卻以狹隘民族主義眼光注視華人，認為華人必定威脅泰國政治經濟。為鞏固面臨危機之封建君主政體，拉瑪六世推動「大泰民族主義」（Thai Nationalism），以忠誠與愛國作為口號，動員人民必須熱愛民族、效忠君主且尊敬宗教。泰國現今國旗使用紅白藍三色正因拉瑪六世當時下令使用此三色設計國旗。其中紅色代表民族，白色代表宗教，而藍色則代表君主。儘管擔憂泰國受華人影響，拉瑪六世並未強勢推動排華政策，反以同化政策順勢讓華人建立對泰國認同，降低華人對中國民族情感。拉瑪六世具體同化行為包括限制華人各項活動，如藉由立法變更國籍法、驅逐出境法、社團管理條例、民校管理條例、強制教育條例及報刊文件管理條例等，強制剝奪華人教育、言論、新聞、人身及居住自由（黃瑞真，2008: 8-9）。當時皇室認為華人將在國內原有社會中另起爐灶，與當地社會進行區分，導致整體社會出現二元化結構，恐致使國家內部動亂。為維護國家整體性，拉瑪六世故以強勢同化、融合政策要求華人必須融入當地社會。

然摒除拉瑪六世不平凡排華思想，文獻普遍分析泰國皇室對華人政策具下列特點（王偉民，1988: 60-1）：

- 以感化為手段，同化為目的。自古以來，皇室對華人普遍給予謀生機會，允許華人從事商業、農業等活動，給予平等待遇。此外，對於優異華人更封官爵位，提供華人從政並效勞皇室機會，藉此提高華人社會地位作為誘因，使華人打從心底忠於皇室。



• 重用華人，而非利用。皇室之所以未拒華人於門外主因在於，泰國未曾成為殖民地而不懼怕外來者，又泰國本身地廣人稀且人力不足為其二，華人成為國內社會所缺少之中產階級則為其三。長久以來，泰國社會以貴族及平民二層扁平階級所構成，其中缺少中產階級，作為貴族與平民溝通橋樑。由於華人不僅與平民往來，又因貿易而與皇室接觸，甚至可自由與皇室、一般人民通婚。華人猶如可讓油水相容完美混合之乳化劑，創造出和諧社會。

泰國政府以溫和方式同化華人，促使二民族融合。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依賴華人，而華人因在當地已蓬勃發展，不願返回中國，種種因素累積加深華人對當地認同感。

然前述所提寬容政策在 1932 年出現變化。一群青年、律師及軍官組成團體發起革命，此次行動推翻泰國幾世紀以來君主專制制度，改採如英國現行君主立憲制。儘管推翻舊有制度，國內政治局勢仍動盪不定。1932 年至 1973 年 60 年間，泰國發生 19 次政變，其中 13 次成功推翻政府，共 20 位首相分組成 48 屆內閣且頒佈 15 部憲法 (Neher, 1992: 586)。當國內局勢不穩定時，政府對華人政策則依情勢有所調整。每任新政府面臨之難題為，究竟該容許華人經濟實力發展至何種程度，而權力分配又該如何處理較為妥當。由於經濟富有往往可用於政治目的，因此政府認為應削弱僅有經濟力量然尚未完全融入國家文化及政治之群體影響力 (Thomson, 1993: 401)。政府對華人寬容政策在 1938 年至 1953 年間大幅轉變，當時政府執行對華人歧視性政策，華人族群歷經移民泰國以來前所未有排華浪潮。²⁹ 總理 Phibun Songkhram 執政兩屆任期 (1938-44, 1948-57) 延續拉瑪六世曾推行之一系列排華政策，政府無論在文化、經濟或政治等各領域皆全力打壓華人，推行「大泰民族主義」(陳健民，1989: 23)。此不僅因總理 Phibun 追隨當時美國反共排華之腳步，亦屬拉瑪六世民族主義與排華思想延續 (許梅，2002: 17；黃瑞真，2008: 10)。有趣且諷刺的是，總理 Phibun 本身為華裔，來自吳姓潮州人家族。Skinner (1957b: 252) 表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泰國對華人政策矛盾現實，即為最反華政府官員竟皆具華人血統。³⁰ 一戰後泰國國內以選舉方式執行所

²⁹ 其中 1944 年至 47 年由於 Phibun 下台，由「自由泰」領導新政府上台時，取消對華人高壓政策。詳細資料參考陳健民，1989: 23。

³⁰ 引自蕭文軒、顧長永，2014：132。

謂民主政治，惟因軍人干政為常有之事，致使政府運作時行時停，且國會議員一半為軍事政權任命，一半議員由間接選舉產生，民主政治似僅剩空虛口號。當時連當地人民政治參與皆受限，遑論華人。30 年代時期，泰國政府以選舉法進一步規定及壓縮華人參政空間，其法條內文規定選舉人及區代表候選人（蕭文軒、顧長永，2014: 131；Skinner, 1957b: 250）：

必須為法定泰國國民；惟，

- 如父親為外僑，不論其父母婚姻是否合法，皆須學習泰語並取得初中三年級證書；或根據《兵役法》已服役期滿者；或長期在政府部門任職，從擔任薪給書記地位起，連續服務滿五年者。
- 如屬於歸化泰籍者，須具備上述所列各條件之一，或者自歸化日起，在泰國居住連續滿十年者。

此規定變相要求候選人必須為第三代以後華人方可能參選，第一、二代較難滿足上述條件而難有參與選舉機會。類此在各方面限制華人參政之政策前後持續約廿年，泰國政府對華人認同與忠誠始終抱持懷疑。1955 年萬隆會議，中國總理與泰國外交部長會面後，泰國表達對擁有雙重國籍華人感到擔憂，並認為華人忠誠度尚有疑慮。中國為消弭中泰之間良好關係阻礙，進而宣布取消承認雙重國籍。此舉不僅鞏固中泰友誼，同時亦保護華人在泰國當地生活。³¹ 1957 年，泰國政府修訂選舉法，凡父親為泰籍之華人則擁有選舉與被選權，明顯放寬華人政治參與條件。憲法委員會更在 1973 年通過一規定：凡泰國出生—即便雙親為華人—得享有與泰國人相同政治權利，此決議取消前述泰語教育程度及兵役限制（蕭文軒、顧長永，2014: 133-4）。1975 年泰國與中國建交，兩國友好關係維持至今。自 1980 年以來，泰國再度回歸早期皇室一視同仁政策，華人不再遭受歧視及打壓。由於得到同等待遇，自 1982 年起每年歸化泰國籍華人人數逾千人，且每年約有 9 千人申請更改姓氏，顯示華人快速融入當地社會，放下過往中國身分，邁向嶄新身分與認同。

³¹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三條明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中國公民具有雙重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網站，<http://www.mps.gov.cn/n2254314/n2254409/n2254410/n2254413/c3930378/content.html>。檢視日期 2018 年 3 月 19 日。



貳、泰國華人參政過程演變

對於海外華人在居住國參政應具備何種條件，黃鏞琨（1989: 32）指出 4 項條件。首先，經濟壯大為首要且最重要條件。以往，華人克勤克儉、奮發圖強，僅為賺足財富並落葉歸根，重返中國與親人團聚。然隨著二戰後國際情勢變化，當地政府一改排華政策，敞開雙臂歡迎華人落地生根，且中國政府已取消雙重國籍，促使華人決定歸化當地國籍。取得國籍後，華人仍舊努力工作，盼在當地事業可深根且蓬勃發展。由於華人經濟須依靠政治權力方能維持，華人因此踴躍捐獻政治經費。部分有野心及餘力者則選擇親自參與政治，以保障自家企業。其次，華人多受過高等教育，尤其第三、四代華人不僅為高知識分子，且因家財萬貫，多數華人選擇出國留學，取得相當卓越成就，使華人一躍而升成為泰國社會菁英份子，進而提高參政機會。第三，由於取得當地國籍，華人則有應盡義務觀念。擁有政治權利意即，合法參與政治活動成為理應享有權利，同時亦為義務；如泰國國會過半議員具華人血統即為最佳證明。最後，主動且積極組織政黨抑或參加當地政黨，能為華人參政生涯注入生命力。如馬來西亞華人公會（*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以華人或華裔黨員組成，成立迄今仍在馬來西亞國內政治扮演重要角色。新加坡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 PAP*）同樣為海外華人組織政黨以參與政治實例。泰國現無以華人為主政黨，或強調華人族群之政黨，然各政黨可見華人黨員，內閣成員為華人更為稀鬆平常情形。以下簡列部分泰國內閣組成數據：1965 至 66 年間，內閣 19 位成員中，12 位為華人（63%）；1983 年，4 位副總理有 2 位華人，部長與其助理則有 7 位華人；1986 年，總數 147 位眾議員有 86 位華人（58%）；1987 年由泰皇任命的參議院 94 位議員中，20 位為華人；1991 年，近 360 位議員中，3 成為華人，而 44 位內閣成員則有一半以上為華人（許梅，2002a: 18）。2001 年至 2009 年間，泰國多項選舉中，曾有逾 8 成國會議員具華人身分，內閣則 5 至 7 成不等為華人。泰國華人參與國內政治並贏得選舉情況已非特例，由此可見華人政治認同不再如早期傾向中國，已完全轉向泰國（蕭文軒、趙長永，2014: 141）。由表 2-3 可知，1979 至 1992 年間，各政黨華人候選人比例約 1 成 5 至 2 成：

表 2-3：華人候選人比例表³²

年別/政黨	1979		1983		1986		1988		1992	
	比重 (%)	總數	比重	總數	比重	總數	比重	總數	比重	總數
民主黨	23.1	108	15.7	191	19	310	16.7	210	17.7	299
泰國黨	18.9	74	20.1	184	13.9	244	16.5	254	20.5	190
社會行動黨	18.9	153	16.7	252	21.2	240	15.9	213	13.1	153
泰國民眾黨	50	4	17.4	184	12.1	231	9	209	14.1	149
Ratsadorn						251	6.5	199	7.4	121
大眾黨						207	10	238	10.8	148
正義力量黨							12.5	319	14	270
新希望黨									17.3	243
國家發展黨									26.8	231
Seritham									11.1	225
團結黨									8.1	184
統一泰國黨					14	192	16.5	205		
進步黨	0	4	11.2	89	13.4	275	9.5	231		
泰國人民黨			11.1	27	6.6	211	11.1	244		
統一民主黨			0	3	18.5	271	9.8	214		
社區行動黨					14.2	205	7.9	213		
Liberal			5.8	17	12.1	288	9.5	189		
Palang Mai	22.2	18	2.7	37	14.2	183				
其他	20	165	12	472	12	614	8.7	668	10.5	142
無黨籍	19.7	152	15.1	383						
總計	20.2	678	14.6	1839	14	3722	11.2	3606	15	

資料來源：Thomson, 1996: 297; 轉引自蕭、顧，2014: 139

泰國華人政治生活發展迄今已有長久歷史，然華人社會並未形成固定參與政治模式。然與其說目前「未形成」華人參政模式，實際上，華人社會應無法形成統一參政形式。關鍵在於，華人個體政治意識、態度皆不同，且參政行為有所異同。不僅個體自身文化、年齡、階級或經濟實力差異，外在社會大環境亦影響著個體參政方式。在迥然不同歷史環境與條件下，泰國華人政治意識、態度及活動各鮮明獨特（許梅，2002a: 19）。華人在泰國經濟領域扮演之角色眾所皆知，掌握商業部門核心。為尋求商業保障及謀取利益，華人與泰國統治階級合作，並建立起政商網絡。此合作結盟關係在總理 Phibun 推動一系列限制華人政策時期

³² 比重為華人候選人佔該黨總候選人之比例；總數則為該黨候選人總數。

(1938-44, 1948-57) 更為明顯。如同前一節所述，華人企業家積極邀請泰國統治階級加入董事會，藉此維護既得商業利益，將經濟置於政治底下。對泰國統治階級來說，則可換得經濟利益與權力。1970 年代泰國經濟起飛，泰國政體亦受影響而有所改變。軍方雖持續主掌政府運行，惟大企業與財團逐漸跨界涉及政治，企業家推動政治民主以破除過往寡頭壟斷現象 (Wingfield, 2003: 257)。政治自由化可提升市場競爭，進而允許新興企業進入市場拓展商機 (Doner & Ramsay 1997: 264)。1972 年當時泰國 16 家商業銀行中共 12 家銀行董事會成員包括政府高官，完整呈現政商結盟關係 (Suehiro, 1985: 40)：稱此類合作為「恩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根據 Akira Suehiro (1994: 170) 分類，恩從關係可分三種方式：其一，泰國統治階級加入董事會；其二，軍事領袖為籌措經費而開辦國家資助公司，並邀請華商擔任高層管理階級職位；其三，當權軍事派系重組原有華人企業與工廠，將特殊產業集結成為「同業聯合性組織」(syndicate organizations) 後，劃入自身派系掌控中，並任命所信任華商擔任主席或董事。除邀請政界作為董事會成員或資助政黨，部分企業家直接參與政治，加入政黨並參選，成為得以影響政府之決策者。當時泰國主要政黨如泰國黨 (Chat Thai Party)、民主黨 (Democrat Party) 及社會行動黨 (Social Action Party) 逐漸由企業及財團掌控 (Laothamatas, 1988: 453)。泰國政商關係蓬勃發展跡象可從過往內閣成員是否具企業背景作為參考，如表 2-4 所示。圖 2-2 則呈現 1980 年代內閣具企業背景閣員比例穩定成長曲線：

表 2-4: 企業背景內閣成員比例表

年份	總理	具企業背景閣員	全體閣員	百分比
1963 年 2 月	Sarit	0	14	0.0
1968 年 12 月	Thanom	1	18	5.6
1969 年 3 月	Thanom	1	25	4.0
1973 年 10 月	Sanya	4	28	14.3
1974 年 5 月	Sanya	3	31	9.7
1975 年 2 月	Seni	8	30	26.7
1975 年 3 月	Kukrit	16	27	59.3
1976 年 4 月	Seni	11	31	35.5
1976 年 10 月	Thanin	1	17	5.0
1977 年 11 月	Kriangsak	2	33	6.1

年份	總理	具企業背景閣員	全體閣員	百分比
1979年5月	Kriangsak	9	43	20.9
1980年2月	Kriangsak	5	38	13.2
1980年3月	Prem	17	37	45.9
1981年1月	Prem	12	40	30.0
1981年12月	Prem	17	41	41.5
1983年5月	Prem	21	44	47.7
1986年8月	Prem	21	44	47.7
1988年8月	Prem	33	45	73.3

資料來源：引自陳尚懋，2008年，「塔克辛執政前後的泰國政商關係」，第163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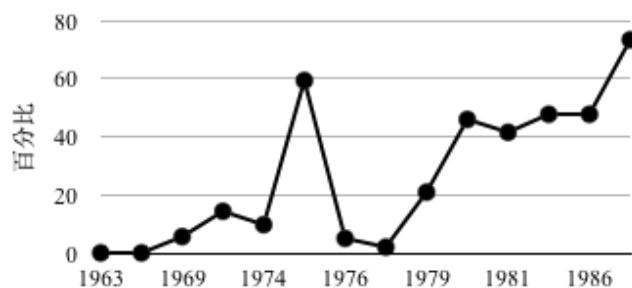


圖 2-3：企業背景內閣成員比例成長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有關泰國整體社會資本分布，Danny Unger（1998）提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意指「個體能達成妥協並對常見問題產生共享認知與理解之高凝聚力群體」。Unger 指出泰國人社會資本傾向低，華人傾向較高，甚具凝聚力。此分析指出，華人建立之關係網絡較為發達，使華人得在政治領域扮演重要角色。如泰國前總理塔信（Thaksin Shinawatra, ทักษิณ ชินวัตร）於 2001 年就任時，因出身企業財團而給予商人進入政府機會，使恩從網絡繼續蓬勃發展（蕭文軒、顧長永，2014: 125-6）。鞏固權力後，塔信隨即在政府各重要部門安插個人親信，並對親信涉及貪汙傳聞置之不理，導致泰國政商關係從原本政府企業合作，演變成複雜政商親信政府（陳尚懋，2008: 171）。泰國政府向來認定通過同化政策促使華人下一代成為泰國人，為限制華人經濟力量最佳作法。當華人入籍後，華人經濟即成為泰國人經濟，屬於國家經濟實力。在政府鏗而不捨努力下，藉由增訂各項法律條文規定且鼓勵華人入籍、減少華語教育及推動效忠泰國等，同化抑或民族融合政策實施皆獲得甜美果實。泰國華人參政情形從罕見成為司空見慣，華人等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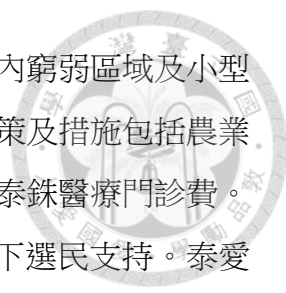
泰國人，「華人族群」掌控經濟命脈問題則不復存（王望波，1996: 38）。除在經濟領域大顯身手，泰國華人參與政治活躍程度顛覆以往海外華人對政治冷漠之刻板印象。前述泰國政府內閣華人比例，則證明華人對政治並不冷漠（楊麗，2008: 83）。隨著華人積極參與政治，將逐漸視泰國人福利為自身福利，華人候選人造勢及拉票時亦盡量泰化所有活動，拉近與選民距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見泰國華人與泰國人已深度同化及融合（蕭文軒、顧長永，2014: 141）。

前述泰國歷屆總理具華人血統情形實非罕見，數年前甚受關注之前總理塔信與其胞妹盈拉（Yingluck Shinawatra, อิงลิคชนม์ ชินวัตร）皆來自華人家族。然兄妹接連成為總理及同樣遭除職皆非因華人背景，此例體現華人性及華人身分在泰國政治中仍不顯著。2006 年泰國再度發生政變，軍人再次干政，一切猶如過往歷史重演。此次事件中下台之總理為塔信，自執政以來為泰國帶來許久未見政治風雨。

1997 年當時全球金融危機，泰國經濟並未倖存，眾多泰國企業及財團在面臨重挫後體悟，仍須掌握政治方能奪回國家對資本補助，因此商人更積極跨界進入政治領域（Phongpaichit & Baker, 2004: 23）。1949 年在泰國清邁出生，總理塔信為華人第四代，1973 年畢業於泰國皇家警察學院，塔信匯集金融及司法知識於一身。身為財團老闆，塔信創立之通訊企業卻因無政黨支持而在競爭中失利，此挫敗致使塔信在 1990 年代中期決意從老闆身分轉換跑道，一步踏入政治（Pathmanand, 1998: 60-69）。1998 年 7 月 14 日，塔信創立「泰愛泰黨」（Thai Rak Thai Party, TRT），此乃塔信走遍泰國拉攏各方菁英所組成之政黨。³³「為每一位泰國人民創新思考並突破格局」（New Thinking, New Action, for All Thais）為泰愛泰黨政黨標語，同時宣示將帶領泰國進行改革，促使國家更為強壯及現代並，足以面對任何挑戰（Baker & Phongpaichit, 2005: 258）。

起初，塔信並不奢望自己所創政黨有天可領導泰國，惟盼望自己能與黨員共同督促政府改進。塔信認為，糾正錯誤以帶給泰國人民快樂，遠比費心爭取權力更為重要（Phongpaichit & Baker, 2004: 65）。在 2001 年總理及國會大選前，塔信極力拉攏偏遠及鄉下地區選民支持。塔信背棄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³³ 在創立政黨前，塔信曾在 1994 年出任外交部長，另曾任正義力量黨（Palang Dharma Party）黨主席（Pathmanand, 1998: 69）。



Monetary Fund, IMF) 針對挽救金融海嘯災害政策，面對泰國境內窮弱區域及小型企業提出不同措施 (Phongpaichit & Baker, 2004: 82)。相關政策及措施包括農業債務延遲償付、提供每村莊百萬泰銖流動資金及實施每次僅 30 泰銖醫療門診費。此類區域重點式「民粹政策」(populist policies) 獲得眾多鄉下選民支持。泰愛泰黨在競選期間使用之競選手段彷彿將選舉轉化成商界企業鬥爭，由於塔信將競選結合商業手段，透過顯見利益擄獲人心，使其他傳統政黨無法與之抗衡 (McCargo & Pathmanand, 2005: 89, 99)。

2001 年選舉，塔信及所領導泰愛泰黨獲得空前未有大勝。泰愛泰黨結合其他二黨派在國會 500 個總席次中取得高達共 340 個席次。喜上加喜，當時訂定之新憲法不僅增加總理職權，同時要求議會倘欲針對總理進行不信任投票，則須至少 4 成國會議員同意進行，意即塔信幾乎掌握無法想像之龐大權力 (Baker & Phongpaichit, 2005: 259)。競選前，塔信曾表示：「我期望可連結新舊世代政治家」。因此，塔信首屆內閣成員甚為多元，且國會議員除舊會員亦有新面孔，為一融合政治局面。為強調任內將進行改革，塔信曾信誓旦旦公開聲明倘任何內閣及國會議員涉嫌貪腐，將立即親辦 (Phongpaichit & Baker, 2004:92)：「我們都夢想著要改革，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目前國會有一半議員為資深官員，尋找新人將耗費些許時間……我雖不清楚這些內閣首長曾經做過什麼，但我將給予他們一次機會……但只要任何一位在我執政期間涉嫌貪腐，我必將嚴辦。」


具豐富商業經濟經驗之塔信及富有各領域人才之泰愛泰黨就任後，隨即進行泰國金融財政改革。泰國另一大黨民主黨當時推廣 IMF 提出之「新自由模型」(Neoliberalism) — 市場在自然狀態運作最好，而政府職責為確保此市場順利運行。塔信則認為，泰國經濟處於成長過程中，政府應該多干涉市場機制以保護及促進各部門與企業互動發展。塔信上任後，偕同內閣將國家作為一大型企業管理與營運。作為企業家，塔信認為企業既為國家 — 國家既為企業，二者管理方式相同，皆由經濟作為主軸。在自己與泰愛泰黨帶領下，泰國必將邁入以經濟為主之新時代。以經濟至上為執政理念，塔信甚至稱呼自己為 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執行長) 總理，而各部門首長、外交人員及地方官員皆須接受「CEO style」訓練，學習將重心放在經濟成長 (Baker & Phongpaichit, 2005: 258-9)。塔信曾表示將設法使更多泰國人變成「頭家」(Thaokae)，原因在於企業及商業

可創造經濟成長、提升就業率及帶動消費（Phongpaichit & Baker, 2004:115）。隨著泰國經貿成長，此將有助推進泰國經濟發展，與塔信推行之經濟至上政策相符。前述此段話特別在於，塔信使用「頭家」二字強調人民應自己作主，由於頭家為潮州話「老闆」，清楚顯示塔信華裔及企業家背景。由於塔信在任期間積極且試圖扭轉泰國經濟，致使大眾及以「塔式經濟」（Thaksinomics）形容塔信一系列企業經濟改革。由此可見，塔信新政權將泰國政治與經濟緊密網綁在一起，並強調全國上下各區域改革，以創造經濟茁壯且實力堅強國家。

2006 年 9 月 19 日，泰國再度發生軍事推翻事件，此案源頭指向涉嫌賣國及貪腐之塔信政權。眾多報導認定，距前次改變 15 年後泰國政治再次腥風血雨原因在於，2006 年初時，塔信與新加坡電信買賣交易涉嫌賣國，由於新加坡收購塔信家族電信企業後，該國政府將可監聽幾乎任何在泰國境內通話，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塔信則藉此交易獲益高達美金二億元，且因該案交易公司設立海外，相關獲益無須扣稅。然該交易僅可定義為反塔信抗議活動引爆點。

1997 年憲法中《官方資訊法》，力圖規範政府透明化且對公民揭露義務，同時此憲法使泰國當時媒體自由程度較東南亞其他各國高。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分類，民主決定因素為選舉自由及新聞自由。塔信接任總理一職前，曾遭憲法法庭指控不實隱瞞財產，塔信透過各方勢力施壓後才被未遭起訴。上任後塔信面臨批評及反對聲浪，而為免負面形象持續散播，塔信開始賄絡媒體。至 2003 年，塔信政府積極限制媒體，甚至開始檢查線上網頁內容並勒令封鎖任何不利於塔信名聲之網頁。³⁴ 2005 年，泰國共 17 家廣播電台遭勒令停業，而停業電台共通點在於播出內容多在批評政府（張靜尹，2009: 165）。隨著塔信持續使用嚴厲手段對待批評及反對聲浪後，國內反塔信力量逐漸凝聚。儘管如此，塔信及泰愛泰黨仍在 2005 年 2 月大選再度獲得勝利。在反對情緒一片激昂時，塔信仍能獲選主因在於眾多泰國東北及北部地區選民對塔信負面新聞毫無所悉，依舊給予支持。然群聚曼谷市之華人族群甚瞭塔信所作所為，又塔信在南部地區同樣名聲直落，因而不得民心。2006 年 9 月，反塔信聲浪高漲，衝突最終爆發。儘管當

³⁴ 1997 年憲法賦予政府可在緊急時刻（如皇室、佛教受侮辱時、涉及國家安全時抑或需維護公共秩序時）限制新聞自由。此外，塔信政府亦重新修改並採用 1941 年出版法，規定廣播電台執照須每年更換，政府及軍方可擁有媒體，且可檢查各媒體營運情形。政府可隨時要求媒體停業，且倘若發現媒體報導涉及色情內容或主張分離主義言論皆可懲處。



時塔信身在紐約參與聯合國會議，泰國人民依舊走上街頭抗議，要求幾乎獨裁專制之總理及其政府一同下台，還給人民公道及光明未來。泰國人民如此不滿塔信絲毫無關其華人身分背景，與種族歧視無關連。人民站出來反抗，純粹因無法接受塔信多年來踰矩及危害國家安全、人民權利之行為。泰國軍方隨於 9 月 19 日發動軍事政變，推翻塔信政權。而後泰國政治仍持續動盪不安，政局依舊不穩。

2008 年 9 月，部分支持塔信之政治人物決議創建「為泰黨」（Puea Thai Party, PTP）。隨著塔信創立之「泰愛泰黨」（TRT）及支持塔信之「人民力量黨」（People's Power Party, PPP）紛遭憲法法庭判決解散後，為泰黨成為延續塔信勢力之黨派。2011 年選舉中，為泰黨首次競選並與當時執政黨民主黨爭取議會席次及總理職位，並推派黨主席盈拉－塔信胞妹－競選。盈拉競選政策著重挽救低迷經濟，同時延續塔信執政採用民粹政策，藉以拉攏低收入戶選民。競選期間，並未傳出盈拉藉由彰顯華人背景拉票。為繼續鞏固塔信在東北及北部地區選民支持，盈拉承諾廣續塔信推行「稻米抵押政策」（rice mortgage program），由政府以高於市價行情向農民收購稻米後，再轉售至開放市場，協助農民維持生計。針對都市選民，盈拉則推出提高最低薪資政策，然無論稻米抵押抑或薪資政策皆遭受到批判及抨擊。經濟學家認為，稻米政策恐大幅提昇泰國米價，致使越南及印度提昇稻米出口泰國商機。調高最低薪資則將影響大企業，迫使人事成本增加。然儘管政策頗遭批評，為泰黨仍在選舉中獲得過半數大勝（53% 選票），如同塔信當年參選時勝利。與胞兄塔信如出一轍，盈拉決定與其他小黨共組聯合政府，以掌握議會高達 7 成席次，鞏固權力。惟盈拉內閣 35 位成員，其中共 29 位來自為泰黨，僅 6 位為無黨籍及聯合政府中小黨派（Dalpino, 2012: 196-97）。當時眾多反塔信民眾指稱盈拉實為塔信接班人，並抗議盈拉毫無決策能力，僅為塔信傀儡，由塔信控制一舉一動以掌控大局。泰國人民雖極力反對盈拉及家族，然從未抗議盈拉華人血統，所有批判僅限盈拉政府及政策。

為一掃負面流言，盈拉上任初期堅決婉拒任何與胞兄塔信相關議題，且努力營造全心全意願為人民付出形象。然盈拉除須忙於極力緩和國內緊張及分裂氣氛外，天公不作美，在盈拉甫接任總理一職即遇泰國多年未發生之嚴重水災。每天 7 月起為泰國雨季，維持約 2 個月每日午後雷陣雨氣候。2011 年 7 月，泰國中部及北部在雨季初期即已出現淹水災情，10 月時水災嚴重程度足以影響及威脅泰

國整體經濟，約千萬民眾生活受影響且逾數百人傷亡，經濟損失高達千兆泰銖。

³⁵ 泰國主要生產稻米區域遭大水淹沒，主要外商工廠所在區域同因水勢嚴重而迫生產中止，致使眾多生產全球零件供給之工業進入空窗期。為何此次淹水情勢演變成一發不可收拾慘狀？關鍵在於，當時盈拉政府未及時妥處淹水，且遲遲不願在雨季初始階段將上游水壩洩洪，至背後原因則尚無確切說法。³⁶ 災情發生初時，泰國緊張氣氛尚未到達至高點。隨水勢迫近曼谷市區時，人民逐漸擔憂安危且甚感恐慌。為防守曼谷最後陣線，避免淹沒國家首都，盈拉政府最終將淹水引至曼谷鄰近區域，方得控制災情。惟鄰近地區民眾深感自己成為守護都市「高階」居民安危之犧牲品，盈拉政府因而引起民怨。值得注意之關鍵為，人民針對此次水災依舊未將批評矛頭指向盈拉華人身分，怨懟與不解僅限於盈拉對災情處理不當。有關作出犧牲鄰近城鎮決策，盈拉曾公開聲明：「倘若水勢淹及曼谷，我們國家首府，外國將會對我們失去信心並質疑我們怎麼連首府都無法守護住。」（Dalpino, 2012: 200）在水災事件過後，民調顯示人民對盈拉政府信心雖仍稍高於前總理 Abhisit Vejjajiva 領軍之民主黨政府，惟針對 Abhisit 個人信心指數卻遠高於盈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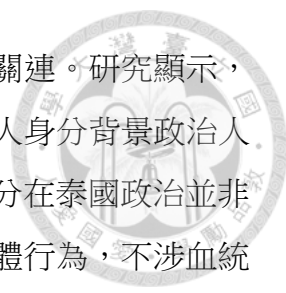
2012 年底黃衫軍再次走上街頭，抗議盈拉政府試圖推行赦免塔信提案，激起反塔信政權人民憤怒。³⁷ 2013 年底，遊行事件再度上演，反對盈拉前於 2011 年非法調任國家安全顧問，圖利家族親戚。經司法調查，泰國憲法法庭於 2014 年 5 月判決盈拉及其部分內閣成員須立即卸職，不得再掌權執政。³⁸ 反思過往所有事件起因，泰國人民多次走上街頭反對及抗議塔信盈拉兄妹，皆非針對其家族華

³⁵ 詳細資料請參考：World Bank, “The World Bank Supports Thailand’s Post-Floods Recovery Effort.”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feature/2011/12/13/world-bank-supports-thailands-post-floods-recovery-effort>. 檢視日期 2018 年 3 月 27 日。

³⁶ 詳細資料請參考：BBC News, “Bangkok vulnerable to floods, Thai PM Yingluck warns.”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pacific-15459227>. 檢視日期 2018 年 3 月 27 日。

³⁷ 2010 年 2 月 26 日，前總理塔信遭泰國最高法院宣判沒收部分凍結資產。此判決引起塔信支持者不滿與反抗，在塔信海外遙控及鼓吹下，同年 3 月 12 日至 14 日發起百萬人大遊行，而當時支持者皆身著紅色衣衫，因故得名「紅衫軍」（陳尚懋，2010: 7）。至尊從皇室及反對塔信群眾則挑選象徵皇室顏色之黃色衣衫與紅衫軍區隔。詳細資料請參考：Aukkapon Niyomyat, “Thai ‘yellow shirts’ rally against Thaksin amnesty moves.”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5/30/us-thailand-politics-yellowshirts-idUSBRE84T0MN20120530>. 檢視日期 2018 年 3 月 27 日。

³⁸ 詳細資料請參考：BBC News, “Thailand court ousts PM Yingluck Shinawatra.”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27292633>; Thomas Fuller, “Thai Military Detains Ousted Leaders as Coup Sets Off Small Acts of Protests.” http://www.nytimes.com/2014/05/24/world/asia/thailand.html?_r=0. 檢視日期 2018 年 3 月 27 日。



人背景。當年人民要求推翻塔信政權，亦著實與種族歧視毫無關連。研究顯示，華人身分在泰國政治中確不如其他鄰近東南亞國家顯著，具華人身分背景政治人物較可免於遭受抨擊與批判。塔信盈拉案例明顯證實，華人身分在泰國政治並非成為頭號人物關鍵，無論名聲遠播或惡名昭彰，往往僅涉及個體行為，不涉血統背景。

綜觀泰國當代政治發展歷史，不難發現自泰國於 1932 年改為君主立憲制後，政變成功及試圖政變次數高達近 20 次 (Farrelly, 2013:281)。泰國當代政治發展為華人精英掌握文人政治為主，泰族精英則主掌軍事政治，二者形成另類輪替現象。每當軍方研判目前文人政治恐有危及國家利益、威脅皇室等疑慮時，便透過軍事政變穩定局勢。然軍方推翻現有政府並非因反對具華人血統者執政，而視當時政治故華人領導之文人政治及軍事政治非屬種族差異對抗。

自多年前從中國移民泰國，華人家族對中國抱持國家主義及情感日趨消逝，逐漸轉變成全力融入泰國當地生活與政治。華人努力融入當地社會時，試圖一切盡量從泰，在參與政治時亦無例外—視泰國人利益為自身利益。華人與泰國人不再區分你我，種族不再有所分割與鬥爭，華人參與國內政治更成為常態。在經歷過反覆納華、排華政策後，華人在泰國及國內政治中擁有一席之地，甚可稱掌握政經大權。當華人族群蓬勃發展，泰國政府則必須正視看似少數又如多數之族群。至泰國華人對政府外交政策是否產生影響，則為本文下一章節所欲探討。

第三章 國際情勢主導之泰國對華政策



本文第二章探討華人身分在泰國國內政治顯著性，本章則將剖析泰國對華政策演變及國內華人族群對外交政策影響。第一節為泰國外交政策與策略整體分析，第二節研究中泰兩國關係變遷，第三節則討論國際情勢所主導之泰國對華政策。

第一節 泰國外交政策分析

徐徐微風吹拂，穩固地深根土壤竹林卻仍能隨風飄逸而未斷。泰國外交政策正如竹子迎風擺盪，以當下國際情勢權威作為扈從及靠攏對象，此極具穩固性及彈性政策使泰國外交獲國際社會稱為「竹子外交」（Bamboo Diplomacy）（Singh, 1963: 535）。自古國際社會既視一國對外交往能力為該國實力表現，猶如門面，外交時常意味一國形象。彈性且務實（flexible yet pragmatic）外交政策則為泰國門面，而其外交政策核心關鍵在於維護國家獨立性與完整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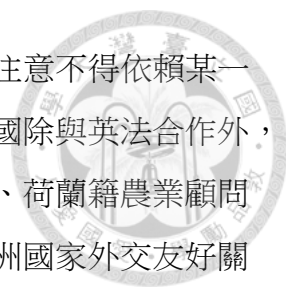
壹、竹子外交意涵

泰國精湛外交技巧得以聲名遠播，乃因泰國在戰爭及鬥爭歷史中，始終能維持國家獨立，此清楚說明其外交政策甚為成功（Phuangkasem, 1984: 1）。作為人力及資源稀少之中小型國家，泰國外交須因應內外情勢而即時改變（Phuangkasem, 1980: 29）。泰國雖非大國，卻可謂中小型國家最佳外交典範。除政策成功，泰國地理位置便利使其可佔優勢且能在國際關係中追求孤立主義。數百年以來，泰國總能在波濤洶湧時穩妥地駛出風波，平安地遠離鬥爭（Suharki, 1971: 429）。泰國「彈性」外交政策特點源自多年與短暫外來勢力交手經驗累積而成。為積極保護自己國家免遭侵入，泰國政府學會如何以柔克剛（Buszynski, 1982: 1037）。綜觀歷史，泰國歷代王朝皆可成功巧妙運用外交手段統一人民，曾以此擊退比鄰之柬埔寨高棉及虎視眈眈之緬甸蒲甘王國（Khmer and Pagan）。

隨著歐洲勢力逐漸擴張至東南亞後，泰國也因而視情改變其外交政策，努力與新勢力維持友好關係。

14 世紀至 18 世紀泰國大城王國 (Ayutthaya Kingdom) 極力與眾多外來勢力建立複雜且緊密貿易、政治及軍事關係。儘管面臨國內改朝換代，唯一不變為政府仍舊重視外交，且藉由對外交往過程大幅拓展其在東南亞地區勢力。1840 年代時期，英美二國曾嘗試說服泰國開啟貿易大門，增加與西方經貿互動，惟泰國並未敞胸歡迎。當曼谷王朝拉瑪四世 (King Mongkut, Rama IV) 在 1851 年繼位時，正逢英國勢力擴及馬來亞區域，的東南亞岌岌可危，隨時可能落入西方手中。拉瑪四世眼見東南亞各國遭外來西方勢力瓜分，不得不擔憂泰國遭受侵略可能性。面對險惡國際情勢，拉瑪四世深知泰國必須與西方合作，否將淪為殖民地。為研究如何與西方在亦敵亦友關係間共存，拉瑪四世因而對國際關係甚感興趣。由於泰國最大敵人為大英帝國，為拉近與敵人關係，泰國首先在 1855 年簽署《泰英友好通商條約》(The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mmerce)。儘管在經貿上須諸多退讓，泰國仍視此條約為維護獨立必要手段。成功踏出首步保全獨立腳步後，泰國接著與法美簽署類似貿易條約，後續更與其他歐洲國家締約 (Nuechterlein, 1965: 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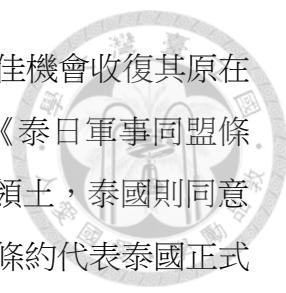
正因泰國努力耕耘外交，使其得在面對 20 世紀初眾多歐洲殖民勢力入侵時，成為東南亞唯一免於殖民之國家，此乃豐碩外交果實 (Kislenko, 2002: 538-9)。對於泰國得以在國際情勢風雲變化之際仍保有獨立，不得不歸功於拉瑪四世當時杞人憂天，預先妥善應對歐洲勢力及機智決策所賜。泰國政府通常在面臨數個潛在敵對勢力時，選擇採取鸚蚌相爭漁翁得利手段，抑或挑選最強而有力之敵人作為盟友，猶如英語諺語「親近朋友，但更要親近敵人」(Keep your friends close, and your enemies closer) 所稱。由於一國外交政策多受國際情勢及事件左右，較不受意識型態、通俗理論或推測影響，總視情作出務實外交政策成為泰國外交另一特色與關鍵 (Suthiwart-Narueput, 1980: 3)。然彈性及務實二字尚無法完全定義泰國外交政策，「機會主義」(opportunism) 乃泰國外交另一顯著特色。舉例而言，早在 1896 年，英法二國雙方即曾同意泰國作為中立緩衝國，使泰國得以免遭殖民，賡續其獨立狀態。當時在位拉瑪五世朱拉隆功 (King Chulalongkorn, Rama V) 認為，即使已與英法合作，仍須避免泰國過度依賴英法任一國，須維持



泰國獨立自存能力。在國際關係中無論選擇制衡或扈從，皆須注意不得依賴某一大國，乃泰國外交政策長久以來核心理念。為執行此理念，泰國除與英法合作外，同時拉攏西方各國，如聘請丹麥籍海軍顧問、德國籍軍事顧問、荷蘭籍農業顧問及美國籍外交顧問。五世皇更藉由出訪歐洲時，大力拓展與歐洲國家外交友好關係，作為維護泰國獨立性重要手段（Tuttle, 1982: 6）。然英法二國在 1904 年簽署《英法協約》（Entente Cordiale），使得東南亞兩大歐洲外來勢力不再處於敵對狀態，反朝合作前進，此非泰國樂見之發展。對泰國而言，英法鬥爭意即泰國可從中機智地謀取生存空間，如今卻受困兩國勢力範圍間，猶如釘子戶。失去取巧機會後，泰國在短短五年內即損失原有在遼國、柬埔寨及馬來亞北部領土（Thompson, 1941: 40-4）。當時泰國眼見自身在東南亞正面臨生存危機，然制衡英法最佳機會竟從天而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崛起，泰國看準美國反帝國主義理念，把握機會並選擇與美國並肩作戰（Soonthornrojana, 1986: 6-9）。學術文獻中關於泰國外交政策探討多聚焦在上述 20 世紀迄今此一時期，且著重剖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至戰後，泰國如何巧妙運用獨具風格外交手段，奠定今日勢力。

除國際情勢局面影響泰國外交，其領導者決策核心理念亦雕塑泰國外交政策。1932 年，泰國結束百年來君主專制體系（absolute monarchy），轉而邁向君主立憲政體（constitutional monarchy）。此時泰國國內除面臨動盪，政府更改由軍方上台掌握政局。然當外界懷疑泰國恐將因軍方執政而一改過往外交策略，泰國政府意外地延續彈性作為。在國際舞台上，泰國外交官可謂全世界最頂尖優秀。當東南亞各國完全淪陷西方勢力及掌控時，唯有泰國屹立不搖，揮舞著獨立旗幟（Nuechterlein, 1965: 91）。1938 年，新上任之總理 Phibun Songkhram 將軍甚為愛好並崇拜當時德國及日本軍事主義，總理 Phibun 盼藉由積極進行全國政治經濟改革，建立其規劃設想之嶄新國家（Kislenko, 2002: 540）。³⁹ 泰國向來透過敏銳觀察力及彈性外交政策妥善處理對外關係，當發現日本勢力正在東南亞崛起時，泰國以迅雷不及掩耳地速度，選擇加入反西方陣營。

³⁹ 總理 Phibun 執政時期為 1938 至 1944 年以及 1948 至 1957 年。



1940 年，隨著法國遭受德國攻擊並戰敗時，泰國趁此絕佳機會收復其原在中南半島領土（Reynolds, 2002: 39）。⁴⁰ 泰國另與日本簽署《泰日軍事同盟條約》，其中條約所附密約規定日本將協助泰國收復英國殖民之領土，泰國則同意在日本與西方戰爭中給予協助（陳鴻瑜，2015: 244）。簽署此條約代表泰國正式向英國及美國宣戰。然二戰後，泰國卻發現美國實力強大，應作為盟友而非敵人。所幸，當時美國並不承認位在曼谷政府，而支持位在美國華盛頓特區之流亡政府，故泰國對美宣戰視為無效。⁴¹ 戰後日本投降，獨留泰國頓時措手不及，又遇英法強烈要求泰國補償，可謂四面楚歌。泰國須在中立主義或親近美國二者擇一，以確保順利退出戰場並將補償降至最低。⁴² 此時美國不僅對於泰國釋出善意，代替其與英法溝通協商補償，更伸出援手，大方給予軍事及經濟協助，使泰國得在戰後重建（Suharki, 1971: 430）。此機會有如天上掉下禮物般之一線生機，泰國更不可能放手錯過，因而造就戰後及冷戰期間泰美堅實友好關係發展（Kislenko, 2002: 541）。

二戰結束後，人民不贊同政府當時選擇與日本同一陣線，不再支持泰國軍方政府執政，國內政局因而出現動盪不安。由此可見，國際大局情勢對泰國內部政治影響不容小覷（Darling, 1965: 39）。自 1932 年改行君主立憲制後，泰國政局時由軍方控制，時由文官掌握。總理 Phibun 在 1944 年下台後，便盼望某天再捲土重來。1948 年，Phibun 確實再任總理一職且掌握政權數年後，泰國與美國友好關係逐漸開花結果。此進展歸因於當時美國華府將軍事政權視為東南亞最可靠及有用反共勢力（Suharki, 1971: 430）。⁴³ 總理 Phibun 上任時，鄰近國家內部動盪不安，甫獨立之緬甸正在共產勢力中求生存，英屬馬來亞同樣積極與共產搏鬥，法國盡全力摧毀「越南獨立同盟會」（Viet-Minh），荷蘭則盼望能重建其在印尼

⁴⁰ 儘管暫時收復失土，泰國最後仍歸還遼國、柬埔寨及英屬馬來亞領土。詳細資訊參考 Reynolds, 2002: 39。

⁴¹ 1940 年，泰國前總理 Seni Pramoj (เสนีย์ ปราโมช) 轉任泰國駐美國大使，負責泰美關係事務。1941 年 12 月，前總理 Seni 因反對其政府與日本合作，在華府發起「自由泰運動」（Free Thai Movement）及親美反日政策。詳細資料參考陳鴻瑜，2015: 244。

⁴² 泰國為脫離當時過於亢奮之國家主義、軍事主義情緒，更短暫地將國名改為暹羅，期望一切能恢復至以往不招惹亦不侵犯任何一國之國際關係。詳細資料請參考 Terwiel, 2005: 279。

⁴³ 戰前美國便積極吸收大量泰國學子，逐漸地形成每年赴美求學的泰國人數穩定成長；此情況無形中強化了泰美關係。詳細資料參考 Terwiel, 2005: 282。

統治權。放眼望去，東南亞一片混亂，然泰國仍能如此愜意、和平，可謂暴風中屹立不搖之泰山（Nuechterlein, 1965: 96）。



貳、戰後泰國外交政策

世界大戰雖在多年後平息落幕，歐洲各國忙著整頓自家戰後亂世，此時世界二大國卻悄悄地展開無聲戰爭。泰國原先躊躇著應保持戰前，僅與西方國家打交道之外交走向，抑或應加強耕耘與鄰近國家如緬甸、馬來亞及印尼關係。然因畏懼共產主義如流水般無限擴散，泰國在美國開始積極尋找亞洲可靠盟友時，決定一同對戰共產主義（Nuechterlein, 1965: 93）。戰後與美國關係為塑造今日泰國重要因素，泰國在美國全球外交政策及預防外交下，成為美國有力盟友。撇除泰國當時非民主治理因素，美國認定泰國可作為其開發第三世界模型及模範。二國自 1833 年建交迄今已 185 年，友誼累積多年，惟堅實邦誼乃在二戰同仇敵愾情感下所建立。⁴⁴


前述提及美國戰後給予泰國經濟與軍事援助，此乃美國政府基於協助東南亞重要盟友發展考量，當然亦為預防泰國遭受共產主義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影響（Tuttle, 1982: v, 1）。回顧泰國政治歷史，領導者向較注重國際關係多過國內政治。此原因在於泰國認知自身為中小型國家，且 19、20 世紀帝國主義迫使東南亞國家淪為殖民地慘痛經驗，泰國政府瞭解泰國必須依靠他國協助方能生存（Tuttle, 1982: 15）。1945 年至 1950 年間，泰國外交政策主軸在於與更多國家建立友好關係，惟仍應注意不得與任一國過於親近，以免有失中立。戰後泰國與英國和解，雙方迅速展開經濟領域合作，泰國在軍事關係合作則另有保留。另一方面，儘管泰國與美國維持良好氛圍，此並未阻止泰國與蘇聯保持正常關係。泰國此彈性且兩面討好東西方外交政策在 1950 年正式轉向。總理 Phibun 認為，與其嘗試維護與東西雙方關係，倒不如協助獵狗捕捉白兔，由此獲得利益較符合泰國所需。畢竟，面對強大共產鄰居宣示推廣共產主義政策，泰國不免有所擔憂。因此，泰國最終選擇站在美國陣線，並表明反對共產蘇聯及新興中華人民共和國

⁴⁴ 2013 年為泰美建交 180 週年，詳細資料請參考：「泰美建交 180 週年，穎拉主持慶祝會」，泰國世界日報，2013 年 5 月 30 日。http://www.udnbkk.com/article/2013/0530/article_107376.html。上網檢視日期 2018 年 4 月 7 日。

(Fineman, 1997: 66)。當時泰國國內領導者紛紛認定共產中國將不會成為泰國朋友，反倒可能軍事協助積極在泰國東北挑起分離紛爭之越南及遼國共軍。鑒於境內有近 1 成國民具華人血統，泰國對強大鄰居中國突然成為共產國家，難免心生畏懼，甚為擔憂中國政府利用華人推翻泰國現有政府及君主立憲制。究竟國際情勢如何影響泰國對華政策，本章後續二節將深入探究。

有關泰國選擇與美國同一陣線事，泰國人民起初對美國會在危急時傾力協助東南亞抵抗共產不以為意，英國同樣半信半疑。然在中國跟隨共產主義後，英國立即變更其政策，催請美國務必加強守護東南亞。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亦為影響泰美關係另一轉捩點。泰美二國原僅在經濟及文化領域交流，惟當美國見識到蠢蠢欲動之共產中國積極拓展後，隨即展開泰美國軍事合作。此時東南亞正處於權力真空狀態，共產及西方勢力皆盼取得掌控，而泰國則扮演美國安全政策關鍵國家角色。同年 9 月，泰美雙方先簽署《經濟與技術合作協議》(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Agreement)，隨後締結《軍事協助協議》(Military Assistance Agreement)。回顧美國及共產勢力抗衡之韓國戰爭(Korean War)，不僅影響泰國外交政策，亦改變其國內政治。變化體現在人民逐漸理解且諒解總理 Phibun 當初為何積極與西方外來勢力締結協約，以保國家完整(Nuechterlein, 1965: 107-8)。美國為廣續鞏固其在東南亞勢力，在 1954 年一舉促成東南亞地區共同安全防禦組織，稱作「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Singh, 1963: 535)。⁴⁵ 此組織組成對泰國來說，宛如定心劑。象徵著泰國多年來苦苦爭取西方勢力給予安全保障，且保護泰國不受共產中國或任何其他共產勢力攻擊，諸多願望在組織成立時一一實現。美國亦藉機填補英法二國離開東南亞後真空權力(Nuechterlein, 1965: 114)。此時身為新東南亞霸主之美國，開始將大量資金輸入泰國，扶持親美政權及協助開發。除仰賴美援重建及發展國家，泰國政府亦依靠世界銀行(World Bank)，加速基礎建設發展，如高速公路網絡及擴大電力供給區域，鄉村地帶更逐漸轉型成為工業區，為泰國帶來進步與繁榮(Terwiel, 2005: 282)。


⁴⁵ 東南亞公約組織在 1954 年 9 月 8 日成立，原始會員國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澳洲、紐西蘭、菲律賓、巴基斯坦及泰國。詳細資料請參考 Singh, 1963: 535。



1955 至 1975 年間，長達 20 年之越南戰爭促使泰美友好關係發展日趨緊密。鄰近越南南部且據地理優勢之泰國，為美國最重要盟友及駐營理想地點。當時約 8 成美國轟炸越南北部之武器攻擊為泰國境內發射，而泰國亦派遣約 11,000 名軍人加入美軍前往越南參戰。泰國除作為美國軍隊休息及重新整頓營區，同時提供運美軍輸及通訊協助。具彈性之泰國外交政策在國際情勢影響下，政策視情調整，韓、越戰期間策略主軸則為親西方反共產。文獻指出，泰國與美國緊密外交關係實際上並未偏離傳統舊有外交策略。共產主義提倡暴力、革命及無神論，明顯違背泰國其傳統風俗文化，故共產主義本身即為巨大威脅。反觀美國防堵共產主義擴散至東南亞努力，正好符合泰國自身利益，二國合作可為理所當然且與彈性外交政策概念不相違背（Kislenko, 2002: 543）。

泰國外交政策彈性及務實特性，隨越戰邁入尾聲再次印證。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問中國，而隔年美國即自越南撤軍。國際情勢如今演變成西方與共產勢力不再鬥爭，而泰國倘盼於戰後生存，則意味著須學習與共產勢力來往。原先仰賴美國軍事實力之東南亞國家，均須為改變策略而積極博取美國以外國家支持，又或得設法與共產敵國商討共存之道（Clough, 1975: 183）。眼見美國防堵政策意外失利，泰國則旋重新檢視與美國互動。如今共產國家環繞，泰國若不與其為友，則必與其為敵。如何免遭共產主義襲擊，成為泰國外交首要課題。戰爭亂象甫落幕，鄰近新興共產國家對泰國曾協助美國炮擊仍記憶猶新，並恐藉此將泰國作為攻擊目標。為阻絕共產勢力侵襲，泰國勢必須窮極一切。

適時以柔軟身姿迎接微風吹拂，敏銳觀察時下情勢，且尋找務實而不失利之政策，乃泰國外交令人讚嘆原因。為保存國家安全與獨立，泰國積極與各國搭起友誼及經濟合作橋樑，暫不論與他國意識型態、政治、經濟或社會體制相同與否。戰後礙於情勢所逼，泰國無法延用反共產傾向外交政策，政府因而修正其政策為承認共產政體，並與中國及其他中南半島共產國家建立外交邦誼。儘管美國在二戰後曾給予泰國各領域協助以交換軍事基地，現今泰國對泰美關係則應輕描淡寫，改以強調其仍具有與其他國家交往能力（Clough, 1975: 201）。時任泰國外交部長 Thanat Khoman (ถนิต คอมันตร์) 表示，期望東南亞地區各國可更深入合作，應減少對非亞洲國家依賴。至權力真空情形，理應由東南亞國家進行填補，而非拱手讓人。為擴展對外關係，泰國不僅加速建立與鄰近大國－中國－友好關係，




同時向蘇聯及其東歐衛星國伸出友善之手（Suthiwart-Narueput, 1980: 56）。此時期泰國外交政策特色為平衡（Balancing）。在與大國交往時，泰國選擇不同於韓、越戰期間過度倒向一國，以廣泛接觸各國以培養友誼。與中國友好，意即泰國勢力可抗衡甫統一之共產越南；與蘇聯培養關係，則為證明泰國不會輕易讓越南得以趁隙而入（Buzynski, 1982: 1038）。與大國友好確實為泰國外交主軸，惟並未因而忽略東南亞鄰國。泰國向與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及菲律賓保持相當良好關係，彼此間互動以合作多於鬥爭。因時常須扮演爭執仲裁者角色，泰國得到鄰國信任與尊重，再次呼應彈性外交樹立泰國中立特色。透過與鄰國建立之友誼，泰國在各國際組織中均獲得鄰國協助，雙邊高層互訪相當頻繁。上述東南亞五國在 1967 年成立之東協即象徵五國邦誼深厚，盼相互協助之意願。東協提供泰國與鄰國溝通協商平台，探討議題廣泛。五國外交、經濟、勞工、社會福利、教育及資訊部長每年至少開會一次，而此機制有助五國同心協力，共同為飽受外來勢力干擾之東南亞整合成共同體。泰國與其他四國緊密貿易關係更為政府重中之重，因泰國以出口稻米為主，須仰賴進口石油及製成品。泰國善以外交作為管道，開啟與鄰國合作大門，且隨時見風轉舵，把握最佳機會，維護國家利益，乃其外交得以成功之因（Phuangkasem, 1984: 13-4）。

身為東南亞半島唯一免遭殖民之國家，泰國成功外交政策貢獻甚多。傳統泰國外交政策著重於維護國家主權及領土安危。自數百年前起，外交相關事務皆由泰國皇室及政府領導人主張。泰國總理 Phibun 即曾在二戰期間向泰國人民表示，目前國家深陷危急情勢中，無所依靠，因此懇求人民相信並跟隨總理領導（Chachavalpongpun, 2010: 63）。⁴⁶ 雖早期人民幾無政治參與權，惟泰國政府藉由絕佳外交政策成功守住國家主權，避免如鄰近國家慘遭殖民命運，廣獲人民支持。

回顧歷史，當歐洲殖民潮蔓延至東南亞地區時，泰國國內興起民族主義。政府外交政策以現實主義（Realism）為主軸，保護國家利益為首要目標，輔以實務主義（Pragmatism），做出實際且符合泰國民族利益之決策。相較鄰近國家被動等待殖民主義侵食，泰國則主動化敵為友，積極與強國合作以提升雙邊關係。同時在泰皇全力推動下，進行全面現代化。泰國深知，除強化國力及不停進步，

⁴⁶ 透過此發言可見泰國政治領導者在國內政治崇高地位，帶領全國人民拼外交、搏生存。



方可跟進西方世界潮流。如前述，拉瑪五世朱拉隆功（King Chulalongkorn）在位時，大力推廣國內改革，包括行政、軍事、法律及貨幣體系，拉瑪五世相信，寧可割讓土地與外來強權協商，而不得犧牲國家主權（Chachavalpongpun, 2010: 67-9）。拉瑪五世愛國情操使得泰國安穩在殖民潮時期存活。隨著外在環境變更，泰國習得如何隨波順勢漂流以免覆舟。Leszek Buszynski 指出，泰國外交政二大特徵，軍人強權及外部聯盟重要性。軍人領導者往往透過軍事經驗，順利帶領泰國度過歷史艱困時期，而泰國決策者時常機伶地將不對等外交關係轉化成對本國有利情勢。（Buszynski, 1994: 721-22）

作為君主立憲制國家，總理主導國家重大事務在泰國可謂司空見慣。無論對內政治抑或對外交往事務，皆多由政府領導者掌控。如前述提及多次之總理 Phibun，為泰國歷史著名總理。總理 Phibun 於二戰時不顧民意決意與日本同盟，完整展現總理主導國家權力。本文前一章節已分析具華人血統塔信家族如何在泰國政治圈崛起衰落，從塔信獲得人民高度支持當選總理，至 2006 年遭軍事推翻流亡海外、2011 年塔信胞妹盈拉成為總理、2015 年盈拉遭卸職及最終與塔信一同在海外躲避風頭。有關塔信以企業家視角領導泰國外交作法，亦為眾多文獻所剖析探討。

塔信為甚具野心之領導者，其外交政策主要目標為將泰國強大聲勢擴及東南亞區域內外，並同時藉由在國內貫徹之經濟改革政策，使泰國在東南亞霸主地位屹立不搖。延續泰國歷任領導者採取之外交手段，塔信認為，與鄰近國家保持友好雙邊關係乃外交最重要奠基。為提供鄰國誘因與泰國建立友誼，塔信將過往在企業界叱吒風雲之 CEO 經營方式帶入泰国外交。回溯泰國歷史，以經濟作為外交政策主軸並非新穎作法。1988 年至 1991 年間，當時總理 Chatichai Choonhavan（ชาติชาย ชุณหะวัณ）便在外交策略中著重經濟（Chachavalpongpun, 2010: 2）。總理 Chatichai 上任後，重大改變長久一致不變之泰国外交政策規劃與實施。在外交上，總理 Chatichai 當時甚為仰賴由 6 位年輕專家學者所組成之顧問團，使得外交部地位不如以往，外交官員淪為二線。⁴⁷ 1989 年，總理 Chatichai 公開發言表示歡迎

⁴⁷ 二戰後至 1980 年代期間，外交部擁有較高自主性與影響力，該部高層官員為主要決策者，主導外交走向。惟自總理 Chatichai 上任後，外交部則頓失權力，政治佈局風雲變色。詳參 Pongsudhirak, 2004。

中南半島國家加入東南亞族群，另強調泰國扮演該區域經濟發展中心角色。其理想藍圖為由泰國主動串連周邊國家，將東南亞發展成黃金地段（泰文為 สุวรรณภูมิ，音譯 *Suvarnabhumi*—Golden Land），期望將中南半島從混亂戰場轉型為繁榮市集（Kislenko, 2002: 547）。⁴⁸ 塔信對於外交同樣抱持著野心，不僅為鞏固與中國經濟連結而在特定政治議題中退讓，同時亦努力維持泰美多年來累積之友好關係。塔信期望透過外交為其打響名聲，順勢拓展其企業帝國，並輔佐在國內之民粹計畫。塔信將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連結，「民粹外交」（Populist Diplomacy）一詞因而誕生（Chachavalpongpun, 2009: 450）。期望將泰國塑造為東南亞區域參與者，塔信稱其構想為「進取性」外交政策（Forward Engagement Foreign Policy）。塔信除促進雙邊友好關係，亦著眼於未來泰國將能帶領亞洲，進一步推動區域整合並讓世界看見亞洲。2002年由泰國所倡議成立之亞洲合作對話（Asia Cooperation Dialogue, ACD）正為塔信外交政策里程碑，為亞洲帶來區域合作相關討論與對話平台（Pongsudhirak, 2004）。順利推動 ACD 之後，塔信另一政策構想則為試圖整合柬埔寨、遼國、緬甸及泰國經濟，最終成功推動「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經濟合作戰略」（The Ayeyawady-Chao Phraya-Mekong Economic Cooperation Strategy, ACMECS），可謂推動區域經濟整合前驅。

1978年柬埔寨紛爭（Cambodia Conflict）爆發至1991年結束，爭端期間泰國即棄守原二戰時投靠美國策略，改以仰賴中國以保障國家安全。歷史上泰國與中國關係向為友好，塔信認為與中印二國在政治經濟領域密切合作，能為國家帶來好處與利益（Chachavalpongpun, 2010: 10-20）。⁴⁹ 塔信在職期間推動多項雙邊協議，主要著重增進與他國貿易夥伴關係，尤其自由貿易協定。隨著近十年來，中國及印度紛紛崛起，泰國機會主義外交政策更不容錯過強化與中印二國關係絕佳機會。然在塔信於2006年遭推翻後，泰國歷經民主震盪時期，政府更迭頻繁，任誰皆無心發展新外交策略。外交部因總理及內閣多次更換，則須持續為不同政

⁴⁸ 現今泰國曼谷國際機場英文名稱即為 *Suvarnabhumi Airport*，延用前述 *golden land* 概念。

⁴⁹ 部分文獻稱此紛爭為柬埔寨—越南戰爭（Cambodian-Vietnamese War）。柬埔寨與越南雙邊關係自1960年代起則日趨惡化，中國與越南關係則自1970年代起即非友好，反觀中國與柬埔寨關係卻漸而緊密，此三角關係間接為柬越紛爭埋因。由於越南對柬埔寨持有「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t）態度，視柬埔寨為中南半島聯盟（Indochina Federation）一分子，紅色高棉（Khmer Rouge）認為越南此想法實為侵犯柬埔寨主權及領土完整。因而當紅色高棉在1975年取得政權後即頻在柬越邊界挑起紛爭，並在1977年逕與越南斷交。參考：Guan, 2015: 101-102。

府宣傳不同理念，更須替國家一而再重新塑造良好形象，致使外交幾乎全面停擺（Chachavalpongpun, 2009: 448）。

五年後，塔信胞妹盈拉擔任總理一職，其國內、外交政策皆遭評論具塔信影子。本文前章節已探討盈拉在國內政治表現，而盈拉甫上任時，反對聲浪認為盈拉並不會在外交領域中有亮眼成績。著名泰國 Pavin Chachavalpongpun（2012）對盈拉外交表現亦不抱樂觀態度。Pavin 指出，盈拉及外交部長皆非外交專業，又二位不具豐富外交經驗，且如同大眾所認知，盈拉在某程度仍為塔信傀儡。為開創外交新路，盈拉企圖跳脫泰國傳統外交政策框架，屏棄總以國家利益為主且犧牲普世價值—如民主與人權—亦在所不惜之政策。由於泰國長年飽受邊境糾紛困擾，近年來與柬埔寨關係更因而時好時壞。為緩和泰柬外交氣氛，盈拉任職第二個月前往柬埔寨金邊拜訪總理。該次會晤遠比外界預期更為順利，雙方就雙邊協議可行性及未來多方面合作可能性交流對話。⁵⁰ 此外，盈拉亦在 2011 年底前往緬甸訪問，積極修補泰緬雙邊關係。盈拉另表示，期盼長年由軍方統治之緬甸，未來在政治上能更多改革。儘管盈拉努力一改過往泰國對外交往策略，然最終因成效不彰，仍決定傾向延用塔信提倡之以經濟主導外交策略，由總理掌權領導以國家利益優先，至普世價值則仍暫須擱置一旁（Chachavalpongpun, 2012）。

泰國外交歷經多位總理與政府替換動盪，惟多年一貫「竹子外交」策略與作風使其安然度過歐洲殖民潮時期，冷戰期間更成功抵抗共產勢力侵入。泰國外交政策雖偶為自保而忽視普世價值，然正因宛如竹子隨風擺動，泰國彈性務實政策成功避免吃力不討好外交局面，並讓泰國在國際情勢巨大動盪下仍屹立不搖。

第二節 1938 年至 1974 年泰中關係及泰國對華政策

泰國與中國領土雖看似肩並肩，然領土邊界實際並無接壤。泰國最北端與中國最南端間隔緬甸及寮國。早期交通往來路線為搭乘船隻由中國東南方港口出

⁵⁰ 詳細資料請參考 Tim LaRocco, “Yingluck and Foreign Policy.” *The Diplomat*, 2011 年 9 月 24 日。
<http://thediplomat.com/2011/09/yingluck-and-foreign-policy/>。上網檢視日期 2018 年 4 月 12 日。

發，經越南及柬埔寨等地後到達曼谷（Wilson, 1967: 149）。在此途中，眾多中國人盼尋覓新生活因而索性定居東南亞。泰國與中國雙邊關係可回溯至 8 世紀前進貢時期，當素可泰王朝（Kingdom of Sukhothai）在 1238 年建立時，泰國即為中國所稱之「藩屬」，二國不時互贈禮物並維持友好關係。⁵¹




壹、二十世紀初泰中關係

朝貢體系發展，於周朝時期便有文獻記載，當時中國人民已認知自身為文明人，與其他非中國外夷有所差異。與藩邦交易往來，更顯中國自身優越感，且經漢朝至明朝數世紀累積，中國與非中國地區地位不平等朝貢體系甚為顯著。對於在中國眼裡作為藩屬國之東南亞來說，進貢意義並非尊敬或崇拜「天朝」，而為與中國平等且相互尊重友好互動。1592 年，泰國大城王朝在中國明朝遭受倭寇襲擊時，曾主動表示願意提供海軍支援，盼協助明朝擊退敵人。然中國卻一口回絕泰國好意，因自認為天朝，中國豈能接受藩屬國協助，以免顯得中國無能。儘管中國認定東南亞為藩屬國要求定期進貢，東南亞統治者僅禮貌上認知到中國對「天朝與天子」看法，而非實際臣服於天子統治。隨著 16 世紀歐洲勢力滲入東南亞，東南亞殖民政府倘欲與中國建立經貿關係，須由歐洲殖民母政府決定。在中國國民政府建立初期，東南亞唯一可自立自強決定是否承認中國之國家僅泰國，然當時泰國政府卻無所作為，致使泰中經貿關係仍舊淺薄（Stuart-Fox, 2003: 23, 34, 130）。如本文前一章節所述，泰中關係雖早自 13 世紀便奠下基礎，惟正式建交為僅數十年前之 1975 年 7 月 1 日（陳林，2009: 1）。泰國境內華人人口佔總人口約 11%，與中國經貿關係亦尚屬良好，而為何遲至 20 世紀方建立邦交？⁵² 由於早期泰中官方互動較不頻繁及顯著，故本節將聚焦在 20 世紀初期及二戰爆發迄今，雙邊關係動盪與發展。

⁵¹ 詳細資料請參考新加坡國立大學海外華人研究網站：
http://www.lib.nus.edu.sg/chz/chineseoverseas/oc_shequ_thailand.htm。上網檢視日期 2018 年 4 月 12 日。

⁵² 泰國眾多華人家族因改姓而在人口統計上難以區分，致使泰國境內實際具華人血統人口數應較官方統計之 11% 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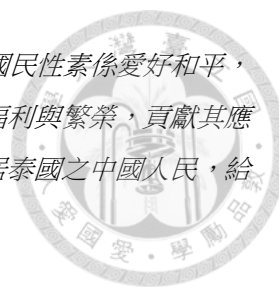
幾世紀以來，東南亞菁英眼看國家遭外來歐洲勢力掌握卻束手無策。邁入 20 世紀後，國內華人菁英族群逐漸受到新興中華民族主義影響亦引起波動。1913 年，泰國政府將原國籍法屬人主義（*jus sanguinis*），修改為凡在泰國出生即自動獲得國籍之屬地主義（*jus soli*），試圖讓華人落地生根且身分認同及思想皆成為在地泰國人。泰國政府向給予境內華人平等及良好待遇，盼藉華人經濟實力提昇國家競爭力（Stuart-Fox, 2003: 139）。1926 年，中國政府成立僑務委員會（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mmission, OCAC）。⁵³ 當時成立宗旨在於，提醒海外華人認同並效忠中國、確保華人在居住地享有平等權利、協助華人後代接受華文教育及鼓勵華人投資中國抑或返鄉投入資本。⁵⁴ 3 年後，政府更進一步通過雙重國籍屬人主義法案，給予所有中國籍父親子女身分，無論出生地為何（Stuart-Fox, 2003: 131）。此法案致使華人無法拋棄對中國原有身分認同，卻同時建立對居住地嶄新認同，華人因而經歷身分認同衝擊。

儘管早期華人族群對泰國來說為二面刃，一方面可替泰國闖出繁榮經濟，另一方面則為泰國政治及外交帶來影響。相較周邊國家，泰國歷來對華人政策甚為寬鬆。惟好景不常，隨著名限華總理 Phibun Songkhram 在 1938 年上台、數年後二戰在歐洲掀起序幕、冷戰鐵幕落下及擁戴共產主義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在致使泰國與中國關係降至前所未有冰點。泰國在 19 世紀末便始與其他國家建立邦交關係，包括日本，然遲至 1946 年方與中國建交（Wilson, 1967: 150）。

回顧 1938 年總理 Phibun 上任就職，隨即更改國名及國歌歌詞，並提倡「大泰主義」以激發泰國人愛國情感。為免國內華人族群影響推行大泰主義，總理 Phibun 因而針對華人實施各種限制：如設立禁止華人居留區域及限制華語教育與報刊。隔年蔣前總統介石即致電泰國政府，內容重點如下（余定邦、陳樹森，2009: 277-78）：

⁵³ 僑委會英文名稱原為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mmission，2011 年改為 Overseas Compatriot Affairs Commission，2012 年改回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uncil，同年再改為目前使用之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詳細資料參考自由時報，「僑委會英文名 朝野決議拿掉 Chinese」<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630205>，2012 年 11 月 13 日。

⁵⁴ 僑委會官方網站介紹：「民國 35 年 12 月，國民大會制定頒布之《中華民國憲法》，將僑務列入「基本國策」，明訂保護僑民權益、應扶助並保護僑居國外之國民經濟事業發展、獎勵或補助僑民教育事業，之後憲法增修條文更將保護僑民政治參與列入，顯見政府對僑民權益之重視。」<https://www.ocac.gov.tw/OCAC/Pages/Detail.aspx?nodeid=554&pid=2110>。



「中泰兩國之關係，因地理接近，與經濟需要，向及親切。……中國民性素係愛好和平，遵守法律。在泰之中國僑民，亦均勤勞操作，各盡良知。……並對泰國之福利與繁榮，貢獻其應盡之職分，固別無其他目的。……為此主種理由，余特請泰國政府，對僑居泰國之中國人民，給予充分之保護，並仍如昔日之允許其從事合法事業，而不受干擾。……」

總理 Phibun 對此電文回覆：


「……貴國僑民在過去及現在對泰國福利繁榮上所給予之駁可貴的貢獻，自亦深為感荷。……誠如閣下所云，乃愛好和平，守紀律，憑其良知，辛勤操作，除為謀其正當之生活外，並無其他目的，而此類僑民，實佔最大多數。但近有不肖之徒，從事非法活動，妨礙我國公共秩序，並危害貴國良善僑民之生命財產，我方乃不得不採取必要的制止措施，專以應付此類違法舉動。……」

從泰國政府回文可清晰看見總理 Phibun 為其實施華人限制政策辯解，且並無擬修改政策之意，泰中關係因而駐足不前。蔣介石表示關心與介入可謂徒勞無功，主印在於此時泰國政府早已心向日本（Stuart-Fox, 2003: 140）。

二戰期間，泰國政府持續運用彈性且務實外交政策引領國家，並成為經濟改革成功且軍事武力茁壯之亞洲新興勢力，而日本亦與泰國站在同一陣線。自 1931 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東北起，中國正處在長達 14 個年頭抗日戰爭水深火熱中（李蓉，2005: 5）。當時部分泰國華人仍具傾向中國之國家、民族及政治認同，雖身處異鄉卻心繫中國，以捐贈物資、返國參戰抑或籌募捐款等方式，支援中國抗日戰爭（范錦榮，2011: 21）。泰國與中國互動因日本而中止，然戰後雙邊關係亦未見好轉。

1944 年激進限華之總理 Phibun 下台，新任總理 Pridi Banomyong (ปรีดี พนมยงค์) 為當時地下「自由泰」抗日組織（Free Thai Movement, 音譯 *Seri-Thai*）發起人，因而與歐美國家保有良好關係。為免泰國因身為戰敗國恐遭制裁，總理 Pridi 立即調整泰國外交政策，取消眾多總理 Phibun 執政時期實施之激進政策（羅文春，2009: 9）。⁵⁵ 隔年二戰落幕，泰國無法避免必須與東亞新興強權中國交往，尤在泰日聯盟慘烈失敗後，泰國須如竹子般適應風向。

⁵⁵ 總理 Pridi 卻因遭懷疑為策劃 1947 年泰國國王離奇死亡陰謀一份子，而自此流亡中國雲南，不再返泰。總理 Pridi 雖逃難他鄉，卻仍延續其「自由泰」理想並在雲南建立「自由泰自治區」。



戰後中國如何看待泰國呢？意外地，中國政府與美國作法如出一轍，將泰國日本一分為二，並未將泰國視為敵國及戰敗國（余定邦、陳樹森，2009: 294）。蔣前總統介石在戰後提及二國關係時堅定表示，泰國乃受日本脅迫而向中國宣戰，中國願意與泰國建立正常且友好關係（萬仁元、方慶秋，1993a: 775）。二國隨於1946年1月簽訂《中暹友好條約》明定雙方交換使節及保護雙方僑胞權利義務。條約第六條更詳細規定僑胞信仰、結社、集會、教育及出版自由與權利。⁵⁶ 為此，泰國政府一併取消限制國內華人各項政策，確保華人可設立華語學校及報社，自此華人免受歧視打壓（Wilson, 1967: 151; 羅文春，2009: 9）。條約簽訂可謂二國克服障礙所得結果，宣告泰中正式締結邦交，此乃二國關係難得一見進展。惟締約數年後，中國風雲變色，泰中雙邊關係光明前景猶如曇花一現。

貳、泰國與新中國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正式宣告即日起中國遵從共產主義。由於意識型態偏向自由主義，泰國即視共產主義中國為一潛在威脅。當泰國境內華人分成兩大派系—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支持者—更為泰國帶來政治動盪（Skinner, 1957b: 326）。

泰國於二戰後一改原先與日本保持緊密友誼策略，轉與初到亞洲新興霸權—美國—建立友好關係，一同抗共。為鞏固政權，初建政之中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聲明：「凡與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係、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友好態度之外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之談判，建立外交關係。」⁵⁷ 泰國因持續承認中華民國政府而與共產中國保持疏遠關係，當時雙邊連結僅剩認同共產主義之泰國華人族群（Stuart-Fox, 2009: 1）。所謂華人族群則僅限於給予中共支持者，而不包括心向中華民國政府之華人。對共產中國來說，位在東南亞各國且承認國民黨與其政府之華人同樣為一威脅，畢竟此類華人國家及政治認同仍傾向共產黨不承認之中華民國。泰國政府畏懼共產華人族群將與中國聯合並對國家安全帶來危害，

⁵⁶ 條約詳細內文請參考余定邦、陳樹森，《中泰關係史》，頁300。

⁵⁷ 詳細資料請參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56條，騰訊新聞網：<https://news.qq.com/a/20111116/000896.htm>。上網檢視日期2018年4月18日。

同時亦積極改變另一派華人的身分認同，如本文第二章所述。當時泰國政府擔憂甚至排斥境內華人，關鍵在於眾多華人持有泰中雙重國籍，而華人族群極可能成為中共宣傳工具（Chivanno, 1992: 61）。

中共建政後將重心放置東北亞、中亞及臺灣，另忙於處理越戰，並無多餘心力關注與泰國關係。泰國政府對與共產黨建交同樣不抱興趣，且當時泰國國內共產團體處於弱勢，故雙邊無論官方或非官方互動皆不多。David Wilson（1967: 154）分析 50 年代中共對泰國評估並認為，倘毛語錄可套用在外交政策上，則中共應無法容忍任何受困於帝國主義及社會主義陣營間之中立主義者。舉凡印度、印尼、緬甸、菲律賓及泰國皆屬於非社會主義國家，然卻無法進而區分差異。文獻顯示，當時中共新聞及廣播皆提及認定泰國政府投靠帝國主義陣營。在泰國選擇加入聯合國韓戰隊伍、與美國協商軍事經濟協議及對中共黨與華人實施限制政策後，泰國傾向非社會主義陣營說法已不證自明。

如前一章節提及，二戰期間上任之總理 Phibun 甚為提倡由拉瑪六世提出「大泰民族」理念，積極推行泰化運動，並實施排華政策以加深民族主義。1944 年卸任後，總理 Phibun 在 1948 年再次就任時便大肆鎮壓國內共產黨活動，採取親美政策並拒絕承認中共政權。總理 Phibun 對「大泰民族」完整性甚為敏感，相當畏懼中共透過泰國華人族群侵略泰國，造成社會分裂。為免共產主義滲透，泰國從 1949 年起開始限制華人入境、提高歸化費用及限制參政等。政府另於 1952 年制定《反共活動法》（Anti-Communist Law），宣布泰國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Thailand, CPT）為非法團體，並且禁止任何共黨活動。泰國政府此舉獲得美國讚賞，認為制定法律為具體反共行動，有助打擊共產主義（Chivanno, 1992: 88）。此外，泰國政府更擴大反共政策涉及範圍與行動，如逮捕親共華僑並驅逐出境、大幅縮減開放華人移民至泰國名額、限制華人得經營行業類別、限制華校與華語教學、調查疑似親共之公務員及勒令親共報刊一如《全民報》—停刊。⁵⁸ 華人突然再度成為箭靶，華校被視為共產溫床，反共產主義變成例行公事（余定邦、陳樹森，2009: 317）。中共對於泰國政府如此大動作剿共並侵犯及迫害華人舉動相當不以為然，頻頻發出照會及提出抗議。然泰國政府無視中共反對，仍持

⁵⁸ 《全民報》在 1951 年刊登反美新聞，泰國政府隨即逮捕總編及出版人，同時沒收已發行且印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之年曆，並勒令停刊。

續排華政策，以徹底掃除共產主義（羅文春，2009: 27）。當時遭迫害之泰國共產黨改成地下化組織，儘管黨內領袖早已逃至北京避難，組織仍在泰國繼續營運作業且私自召開全國會議。隨著國際情勢改變，共產主義與泰國意識型態背道而馳，故泰國政府害怕且反對共產，擔憂華人族群助長共產勢力。對泰國來說，國際情勢即為風向，華人族群則為小草。泰國政府考慮國際大環境，如竹子彈性般調整政策內容，華人如小草並無法影響竹林擺動方向。

隨著 1950 年韓戰爆發，中共及蘇聯毫無疑問選擇支持北韓，證實擁戴共產主義為上理念，致使泰國身處自由主義陣營，為國家安全著想而不得不與中共保持距離。同年，中共成為首個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或稱北越（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 DRV）國家。此舉不僅為未來越戰埋下種子，對鄰近泰國來說實為一大震撼（Stuart-Fox, 2009: 10）。中共承認北越意即正式將中南半島戰爭國際化，歐美勢力隨即調度軍事援助前往越南、柬埔寨及寮國，與以抗衡。泰國受困戰爭核心地帶，不僅擔心共產勢力侵略國內，在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出兵北韓時，亦須派兵參戰，著實為蠟燭二頭燒。隨著戰況膠著，反共泰國跟進美國對中共經濟制裁，禁止向中共出口大米、橡膠及錫等（賴欣宏，2012: 17）。

1953 年，泰國在考量國際政治情勢後，決定與美國簽訂《軍事援助協定》，並於隔年 9 月簽訂《東南亞集體防禦條約》，成立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⁵⁹ 此二協定代表泰國正式加入美國反共軍事聯盟，作為美國冷戰時期堵共重要東南亞盟邦。眼見東南亞公約組織成立，中共透過《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抨擊該組織為「直接以中國人民為敵的一個侵略組織」，並藉此告誡泰國政府「為了美國而犧牲自己的利益，不會得到任何好處」（張錫鎮，1990: 2）。當中共逐漸瞭解東南亞鄰國因共產主義而感到畏懼，與中共保持距離且互動冷漠，中共決定主動釋出善意。為避免與這些國家更加疏遠，周恩來接見印度政府代表團時曾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並延伸適用東南亞區域。該五項原則為⁶⁰：

⁵⁹ 美國軍事援助資料。東南亞公約組織於 1975 年 9 月通過決議解散，並於隔年 2 月舉行最後一次軍事演習，1977 年 6 月 30 日組織正式瓦解。詳細資料請參考陳林，2009: 23。

⁶⁰ 詳細資料請參考「中國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官網：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wjs_674919/2159_674923/t8987.shtml。上網檢視日期 2018 年 4 月 2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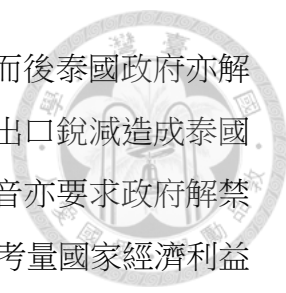
- 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後於萬隆亞非會議上改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
- 互不侵犯；
- 互不干涉內政；
- 平等互惠（於中印、中緬聯合聲明中更改為平等互利）；
- 和平共處。

為進一步提升泰中友誼，毛澤東與周恩來更在 1954 年底接見印度、緬甸總理時，特請二位總理轉告泰國政府，中國欲基於和平共處原則上與泰國建立友好關係（余定邦、陳樹森，2009: 319）。隔年 4 月，「萬隆會議」（又稱第一次亞非會議, Bandung, Asian-African Conference）在印尼萬隆召開，包括共有亞非地區 29 國參與，中共藉此再次對東南亞國家展現友好誠意，同時企圖影響東南亞對中共看法。⁶¹ 撇除以黨名義持續地支持各地革命運動，中共仍積極與中立國家建立友好雙邊關係（Stuart-Fox, 2009: 14）。承上所述，不難看出中共對美國圍堵政策應對措施之一，即為鞏固與東南亞國家友誼。倘有國家表示中立，中共則儘快建立正常關係；若有國家加入美國陣營，如菲律賓及泰國，中共則絞盡腦汁使對方相信並無入侵或大肆散播共產主義意圖。中共期望透過和平共處原則建立和平區域，而和平要點在於，去除美國置於東南亞軍事武力佈局，然此概念明顯與東南亞公約組織宗旨背道而馳（Wilson, 1967: 165）。儘管如此，中共仍不氣餒持續努力接觸東南亞各國，伸出友善之手。萬隆會議期間，周恩來更與泰國外交部長 Wan Waithayakon 親王會晤，作為雙邊首次正式接觸。當時因雙方對彼此皆抱持疑慮，仍處於相互探索及瞭解階段，周恩來則滿是誠意地對親王說：

「中國絕沒有侵犯鄰國的意圖，也沒有為了擾亂和潛入泰國而在雲南省訓練人員。為了證實這一點，中國政府歡迎泰國代表團去中國訪問，去看看西雙版納，中國有沒有調動部隊或幹些敵視泰國的行動。至於比里·帕儂榮作為政治避難被允許居住中國，也絕沒有做出任何敵視泰國的行動。」⁶²

⁶¹ 主要 29 個國家包括五個發起國印度、印尼、緬甸、錫蘭以及巴基斯坦，其他國家則有阿富汗、柬埔寨、中華人民共和國、埃及、衣索比亞、迦納、伊朗、伊拉克、日本、約旦、寮國、黎巴嫩、利比亞、賴比瑞亞、尼泊爾、菲律賓、沙烏地阿拉伯、蘇丹、敘利亞、泰國、土耳其、越南共和國（南越）、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葉門。

⁶² 此處的比里·帕儂榮乃註腳 41 所提及流亡至雲南之泰國總理 Pridi Banomyong。



此次萬隆會議促成泰中建立溝通平台與瞭解彼此機會，而後泰國政府亦解除原先跟進美國對中國禁運。其中主因當然在於大米及木材等出口銳減造成泰國貿易數字顯著下滑，影響整體經濟。此外，泰國工商界眾多聲音亦要求政府解禁並期望能與新中國建立貿易關係。曾積極限華之總理 Phibun 在考量國家經濟利益後，毅然決定解除禁運。由此可見，即便在積極反共情況下，泰國政策仍會視國際情勢與國家利益決定，是否與中國往來並不受其國內華人族群影響；泰國隨著國際情況而轉舵改變外交政策，再次展現其竹子外交特質。

為改善泰中關係，泰國於萬隆會議後即派遣秘密訪問團前往中國。泰國委派代表更於 1955 年 12 月在中國駐緬甸大使館中與中國大使簽署共同聲明，內容如下（余定邦、陳樹森，2009: 327-8）：

- 中泰兩國有著歷史悠久的深厚友誼。兩國願意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友好關係。
- 中國同情泰國目前的處境，願意考慮兩國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發展經濟聯繫，以便幫助泰國擺脫困境。這種聯繫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而且也與維護亞洲和平的崇高事業相一般。
- 兩國願意即時地和逐漸地採取相應措施，在貿易和文化範圍內增加交流和建立聯繫，以便最後達到兩國關係的正常化。
- 為了就兩國之間的問題進行交談和協商，雙方願意彼此保持正常的接觸。

針對雙邊關係未來發展，毛澤東曾表示中國有意願改善與泰國關係，且說明泰中至今仍無法建立正常關係乃因美國從中作梗。東南亞公約組織在毛澤東眼裡有如一道牆，隔絕與東南亞互動。錯並非在於參加聯盟之東南亞國家如泰國，而在於萬惡帝國主義。自萬隆會議後，泰國前往中國訪問非官方團體數量在 1956 至 1958 年間劇增，訪問團返泰後便順道介紹中國政策，更進一步要求政府重新檢視其對華政策。對此，泰國外交部長在 1956 年 5 月曾發言表示（羅文春，2009: 36）：

「從當前國際情勢變化來看，關於承認中國問題，泰國政府已經改變了原來的立場，一旦中國進入聯合國，泰國就會承認。」

透過外交部長談話，不難得知國際情勢掌控泰國外交決策，尤其政府對華政策。境內華人族群不影響泰國對華政策，反倒國際現況可輕易改變對華政策，進而影響政府對國內華人態度。總理 Phibun 為爭取人民支持，雖積極於執政後期一改過往強勢限華政策，然仍免不了於 1957 年遭推翻。領導政變之 Sarit Thanarat (สฤษดิ์ ธนะรัชต์) 接任總理一職 (1958-1963) ，原本傾向同意與新中國更多接觸之總理 Phibun 則被迫流亡海外，而總理 Sarit 則持續實施反華政策。

1959 年泰國政府隨即中斷與中共任何往來，並頒佈《53 號法令》禁止進口中國產品。與此同時，華語文報刊再次遭查封及勒令停業，華商則皆遭冠上「親共」標籤。泰國代表在 1961 年聯合國大會表示，泰國與遷至臺灣之蔣介石政府保持外交關係並無違反聯合國憲章。當隔年大會討論是否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時，泰國代表更堅決且強力反對，表示泰國無法肯定該國是否為愛好和平國家。1965 至 1969 年間，泰國持續在聯合國會議中譴責中共進行顛覆活動，企圖阻止中共進入聯合國 (余定邦、陳樹森，2009: 335; 張錫鎮，1990: 6) 。泰國共產黨原遭受打壓而被迫地下化，突然在 1966 年公開聲明該黨將不再低調、將拋棄原有中立主義且敞開懷抱迎接共產主義，並採用中共「沒有第三條路可走」理念。⁶³中國更多方面給予泰共黨支持，目的在於欲透過泰共黨抵制泰國政府親美政策。此舉動使泰中關係除陷入低迷外，亦更加惡化 (Gurtov, 1975: 45; 陳林，2009: 26) 。

參、泰中關係邁向和解

一晃眼至 60 年代末，東南亞諸國視美國勢力因戰爭逐漸下滑，便紛紛尋找嶄新道路，擺脫大國並由自己掌握東南亞。基於各國共識，「東南亞國家協會」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因而在 1967 年誕生。印尼、新

⁶³ 毛澤東在 1949 年 6 月 30 日《論人民民主專刊》表示：「中國不是倒向帝國主義就是社會主義，騎牆是不行的，沒有第三條路可走。」克萊恩與台灣：反共理想與理性之衝突和妥協，涂成吉

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及泰國外交部長在泰國曼谷簽署《東協宣言》（ASEAN declaration），宣告東協正式成立，其宗旨與目標為⁶⁴：

- 加速該地區的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文化發展；
- 持續尊重該地區個國家的法律規範，以及固守聯合國憲章的原則下，促進該區域的和平與穩定。

自冷戰掀起序幕以來，牽動泰中關係發展乃美中二國之間互動。身為美國親密反共盟友，泰國對華政策絕大部分受美國牽制。1958 至 1970 年間，中共與蘇聯因領土邊界認知不同而產生摩擦衝突，1969 年更發生武裝衝突造成雙邊關係破裂。美國總統尼克森於是在同年提出「尼克森主義」（Nixon Doctrine），調整美國在亞洲對外戰略，期望儘快自越南戰爭泥淖中脫身。美國欲藉由改善美中關係來聯中制蘇，因此展開和解行動。當中國出乎世界意料邀請美國訪中參加桌球比賽時，美中即已開啟對話管道。此事件更成為歷史著名「乒乓外交」（Ping Pong Diplomacy）（張錫鎮，1990: 7）。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森公開拜訪中國，象徵美中長年僵化關係正式破冰，並在中國上海發表聯合公報，為美中關係正常化掀起序幕。受邀前往中國參加桌球比賽除美國外，泰國乒乓球隊兼代表團亦藉此前往中國訪問。當時泰國訪問團代表曾言道（余定邦、陳樹森，2009：341）：

「我們兩國很長時間沒有邦交關係了，就好像我們生活在兩個世界裡。這種情況，我感到很不對頭，是與中泰親如兄弟的歷史背道而馳的。我們兩國的隔閡是件很奇怪的事，兩國離得那麼近，卻沒有任何關係。...我們泰國有句話—中泰一家親。」

除表示久未互動外，泰國代表同時提及泰國畏懼中國且甚為擔憂共產主義將顛覆泰國內政。得知泰國代表一席話後，中國代表釋出善意並回覆：

「您回到泰國後，請轉告泰國朋友和領導人，中國願意與泰國友好，我想，泰國也沒有什麼可怕的。如果泰國有什麼事還不清楚，就到中國來問好了，中泰兩國是應該友好的。」

⁶⁴ 詳細資料請參考「東協發展簡介」，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http://www.aseancenter.org.tw/ASEANintro.aspx>。上網檢視日期 2018 年 4 月 2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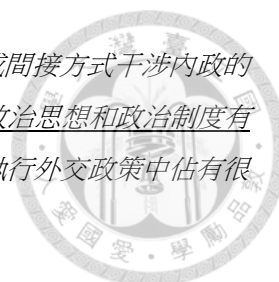
乒乓球賽後陸續數次相互拜訪皆由泰國外交官陪同訪問，增添拜訪政治性，而泰國亦逐漸更改對中國心態及政策。70 年代初，泰國人民便看好與中國交往，泰國中華總商會會長更表示，由於居多華人後代早已歸化泰籍且心向泰國，故泰國 50 萬華人與中國進行貿易，將不會對政府產生任何政治問題。泰中互動日趨熱絡，雙方各自釋出善意，促成貿易上緊密往來（張錫鎮，1990: 8）。

1973 年 10 月，泰國發生「十月十四事件」。此事件由大學生及文人發起，表述人民追求民主理念之抗議活動。執政軍政府起初以暴力鎮壓民眾，而後卻因無法抵制人民力量，選擇讓步並進行政府改選（何展傑，2007: 52）。新上任文人政府，當一改軍政府以往強勢親美外交政策，以顧及多方之彈性政策取而代之。除新政府執政可為泰中雙邊關係發展奠基外，中國在同年 12 月底協助解決泰國石油難題則為另一助力。由於泰國因國內工業石油需求量大，當時因「石油輸出國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調升石油價格，泰國工業深受影響。為緩解泰國經濟燃眉之急，泰中簽署貿易協定。中國決定以友情優惠價格，出售 5 萬噸柴油至泰國。此協定不僅開啟雙邊貿易大門，更附帶政治意義。泰國外交副部長對此表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今僅剩時間問題（余定邦、陳樹森，2009: 346）。對於中國雪中送炭舉動，泰國政府與人民皆心懷感激，同時消弭原有對中國負面印象。次年，泰國隨即廢除禁止與中貿易之《53 號法令》，恢復雙邊貿易往來。然儘管泰中互動日趨頻繁，雙方對彼此仍有所擔憂。泰國國安會副秘書長曾表示，盼可與中國協商減少對泰國共產黨支持。另一方面，中國則擔心泰國與美國友好關係是否將威脅中國（陳林，2009: 31）。

1975 年成為泰中關係發展轉捩點。年初新任總理 Kukrit Pramoj（คึกฤทธิ์ ปราโมช, 1975-1976 年執政）接任即聲明，新政府將奉行「不結盟政策」，以逐步實現泰中關係正常化。同年 6 月 30 日，總理 Kukrit 受邀前往中國與毛澤東、周恩來及鄧小平會面。鄧小平在歡迎宴會上特別提到（余定邦、陳樹森，2009: 348-9）：

「克立總理閣下這次訪問我國，在中泰關係史上揭開了新的篇章。……實現中泰兩國關係正常化，是我們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

而總理 Kukrit 則公開表明：



「泰國外交政策的目標是獨立自主地在公正、平等和互不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干涉內政的原則基礎上，發展同一切對泰國表示善意的國家的友好和平共處，而不論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有何不同。因此，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同它實現關係正常化，在我的政府執行外交政策中佔有很高的優先地位。」

透過泰國總理一席話可得知，泰國期望減少美國影響，欲獨立且自主決定邦交關係。然泰國起初同意卸下心防與中國來往，同樣受美中關係改善所驅。當美國越過政治思想及意識型態鴻溝時，泰中互動阻礙與隔閡亦不復存。泰國對華政策改變並非因其國內華人族群遊說或行為舉動，反因國際形勢變化，造就泰中關係正常化。

泰國總理 **Kukrit** 訪中歡迎宴二天後，泰中在中國北京簽署聯合公報，重點內容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泰王國政府為了恢復和進一步加強兩國人民傳統的親密友好關係，並根據兩國人民的利益和共同願望，決定於 1975 年 7 月 1 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泰王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認中國政府關於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並決定在本公報簽字之日起一個月從台灣撤走一切官方代表機構。.....中國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他們不承認雙重國籍.....對自願選擇保留中國國籍的在泰國的中國僑民，中國政府按照其一貫政策要求他們遵守泰國法律，尊重泰國人民的風俗習慣，並與泰國人民友好相處。他們的正當權利和利益將得到中國政府的保護，並將受到泰王國政府的尊重。」

於是乎，泰中建立正式邦交關係，而泰國與中華民國外交關係則就此畫下句點。中共宣布不再承認雙重國籍對泰國來說甚具安心作用，使泰國無需惶恐國內華人族群可能再與中國有何非法及叛亂之舉。在越南、寮國及柬埔寨於 1975 年接連赤化後，親美且反共泰國處境岌岌可危，四面楚歌。眼見國際局勢迅速變動，泰國政府隨即更改原有一邊倒親美政策，在外交上採取多邊政策（李小軍，2007: 42）。與其跟鄰居交惡，倒不如盡力改善關係，爭取轉圜空間。

1975 年實為泰國外交歷史充滿轉折一年。國際環境影響，促成泰中關係自此譜寫新一章節，對後續雙邊關係發展留下重要足跡與意義。

第三節 1975 年迄今泰國對華政策沿革



泰國與中國自 1975 年建交後，迄今已逾 43 年。泰中在新中國成立之際，便踏上相互對立道路，後歷經近 30 年方達成共識，互為友好。建交初期，因泰國長年對中國抱持負面印象，且泰國仍畏懼共產及革命主義騷動境內華人族群，使得建交後仍經歷磨合期。

壹、瞭解與信任之泰中關係

甫建交之泰中蜜月期相當短暫，原因在於泰國國內政治動亂。1976 年 10 月由 Thanin Kraivichien (ธานีศรีวิเชียร) 領軍之反總理 Kukrit 政府軍人勢力推翻政府後，新任內務部長旋即下令所有華語報刊須經批准後方得繼續營運及出版。泰國頓時由多家華語媒體驟減成僅剩世界日報、星暹日報及京華日報三家華語報刊，其他皆被認定為親共報刊，遭禁止出刊。此外，泰國政府另於 1977 年 1 月頒佈新法令，限制政府官員前往任何共產國家，此亦包括中國。然當時泰國政局變動頻繁，泰中關係原日趨漸惡，卻因 1977 年 10 月新上任之總理 Kriangsak Chomanan (เกรียงศักดิ์ ชมนานนท์) 推行與中國友好政策，結束逐漸走下坡之雙邊關係。

隔年，東南亞情勢風雲變幻。泰國因越南與蘇聯簽訂友好合作條約，而恐懼越南將逐漸擴大其在東南亞勢力。為預防此夢魘成真，泰國與中國合作，同意中國經泰國運送軍事武器至柬埔寨，以抵抗越南勢力。此為泰中建交後首次軍事合作。泰國政府期望透過改善兩國關係，藉以減少中國欲支持泰國共產黨機率。中國知悉且瞭解泰國自 1949 年起便不曾停止畏懼共產主義，更遑論泰國共產黨倘若逐漸茁壯，將對泰國帶來超乎想像影響。為此，鄧小平對 1978 年來訪總理 Kriangsak 表示，泰共的暴動乃泰國內部事務，且中國不願因共產黨而影響國與國之間的交往與互動。而後的幾年，兩國持續每年互派訪問團，聯繫友誼，消弭猜忌（余定邦、陳樹森，2009: 350-53; 戴萬平，2011: 79）。當越南侵略柬埔寨時，泰中對於東南亞情勢達成共識，使泰中合作更加緊密。針對侵佔事件，鄧小平表示：



「面對越南侵略柬埔寨這一局勢，我們兩國有必要密切合作。」

為免越南持續侵佔柬埔寨及擴張侵略版圖，泰國與中國因而同心協力支持並援助柬埔寨人民抗越鬥爭，另協同其他國家合作解決此次危機。越東鬥爭最終於 1988 年在巴黎國際會議所簽訂之《巴黎和平協議》畫下句點。

1979 至 1989 年長達 10 年間，泰中對彼此信任日積月累，雙方高層官員相互拜訪次數高達 20 次，而領導人互訪則約 15 次。隨著政治和解，緊接而來則為緊密經濟交流。1978 年泰中簽署貿易協定，泰國政府更在 1986 年成立「泰中貿易協會」，主要負責促進與協調雙邊進出口貿易事務，包括泰國出口大米、橡膠及人造纖維，而中國則出口柴油及原油。在經濟貿易開放政策下，雙邊貿易量在 80 年代逐年增長。為推進全方位雙邊合作，泰中亦相互投資企業、承包工程及開展科學技術合作（張錫鎮，1990: 11）。1989 年，中國因「六四事件」遭世界各國譴責與撻伐，部分國家堅信「中國威脅論」，因此制裁中國。然當時泰國政府卻未跟隨國際潮流一同制裁及疏遠中國。由此可見，泰中關係發展至 1990 年時，已如藤蔓般交結。雙方彼此信任依賴，友好關係不斷成長茁壯。

隨著冷戰在 90 年代初落幕，泰中友誼前景看好，意識形態不復為雙邊交往隔閡。然儘管如此，泰國不忘警惕自己，須適時迎合大國以保障國家利益。惟仍須注意避免過度依賴大國，以免導致國家失去自主性而受他國控制及影響。在泰中頻繁經濟貿易及全方位良好互動往來基礎上，雙邊關係更為深厚。由於瞭解泰國視國際情勢發展，偶須靠中國軍事武力，泰國因此透過武器採購及軍事訪問，與中國保持穩定軍事合作（李小軍，2007: 43）。泰中軍事合作自建交後日益加強，不僅雙方軍事高層互訪，軍方更不時進行團體交流、考察及觀摩，相互切磋軍事實力。此外，泰中亦合資創辦軍工企業，展開前述軍事武器採購貿易。儘管泰國向世界各地採購軍事武器，中國仍為主要供應國之一。1991 年 6 月，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前往泰國拜訪時提及泰中關係穩固（余定邦、陳樹森，2009: 382-6）：

「親戚越走越親，中泰兩國關係是很好的。希望兩國關係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繼續前進。中泰關係有著堅實的基礎，不會因為國際風雲變幻和兩國國內發生什麼變化而改變。」

1988 年，泰國新任總理 Chatichai Choonhavan (ชาติชาย ชุณหะวัณ) 接任並大力推行經濟政策。總理 Chatichai 盼將中南半島由戰場轉變為商場 (turning the Indochina battlefield into a trading market)，除積極創造泰銖經濟圈 (Baht Economic Zone) 外，泰國亦邀請中國參與整個中南半島改造過程 (李小軍，2007: 44; 戴萬平，2011: 80)。對於推展與意識形態相去甚遠之中國經濟合作一事，總理 Chatichai 曾表示 (李文志、蕭文軒，2006: 227)：


「政治是政治，貿易是貿易，兩者不能混為一談；任何人都應該可以與其想要的對象進行貿易。」

由此可見，泰國在後冷戰時期已將政府重心從國家安全及意識形態，完全轉移向經濟貿易議題，由經濟主導國家政策方針。不難想像，接下來數十年泰國全力衝刺經濟畫面。

貳、著重經濟之全面合作

承前一節所述，國際情勢變動往往為泰國外交政策帶來影響及挑戰。隨著全球化潮流席捲而來，各國逐漸強調開放性政策。泰國觀察國際主流，發現開放及自由政策能為國家帶來經濟急速成長 (Snitwongse, 2001: 189)。受務實主義影響，泰國為提升經濟遂於 90 年代推行組織「次區域經濟區」(sub-regional economic zone, SREZ)，此乃當時泰國重要經濟發展戰略之一。⁶⁵ 歷經世界大戰與冷戰，泰國經濟在國際政治鬥爭結束後逐漸復甦。由於泰國追隨西方經濟發展模式，以工業化為優先。政府迅速將資源投入，力使原本農業經濟轉型為加工業及輕工業型態，然此舉卻致使泰國國內產業部門無法均衡發展。泰國北部與東北部偏遠地區人均生產總值不達國家生產總值一半，而東北部總值更低於北部。為改善偏鄉地區經濟慘況，泰國政府設置偏鄉工業區及邊境經濟特區，加強與鄰國經濟合作，盼透國裡外同時發展，以緩解偏鄉經濟資源不足問題 (金榮勇，1994: 18; 李文志、蕭文軒，2006: 225)。

⁶⁵ 「次區域」意指某區域之一部分，如東南亞地區為亞太地區次區域。詳細資料請參見李文志、蕭文軒，2006: 227。



至次區域經濟發展推動，則可回溯至 1957 年時由泰國、南越、寮國及柬埔寨四國所成立之「湄公河下游調查協調委員會」(Committee for Coordination of Investigations of the Lower Mekong Basin)，負責合作勘察、規劃及開發湄公河流域 (Jacobs, 1995: 135)。然各國真正進行密切合作時機為 1992 年亞洲開發銀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開始主導後，並執行「大湄公河流域開發計畫」(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al Economic Zone, GMS)。當時各國皆期待大湄公河計畫能作為次區域經濟發展先驅。該開發計畫包括泰國、中國、寮國、緬甸、柬埔寨及越南，因此亦稱為六角經濟合作。計畫主軸著重共同開發自然資源及基礎建設，另涵括跨邊境貿易、運輸業網絡及旅遊業發展，以進而建構區域經濟區。為使計畫順利，泰國及中國扮演領導角色，積極推動與監督各種項目執行進度。大湄公河流域開發計畫包括 2 億 5 千萬人口，國內生產毛額約 1 億 9 千美金。後冷戰時期政治穩定及經濟改革乃加強次區域經濟合作主要因素，由於國際間不再因意識形態而對立，反倒齊心協力合作共拼經濟。越南、緬甸及柬埔寨原先採用計畫經濟政策，亦選擇跟隨鄧小平於 1978 年起提倡之經濟改革腳步，使合作不再成為一大難題。泰中更在基礎建設開發並肩合作，包括航空、水陸運輸、運河網絡建造、道路聯結及鐵路開發，項目相當全面多元。礙於泰國與中國邊界並無接壤，開發基礎建設須與寮國及緬甸溝通協調。然泰國與緬甸相接邊境時常發生紛擾爭執，為阻礙泰中經濟發展一大因素。儘管面對困境，泰中仍不氣餒持續推進雙邊合作。畢竟，伴隨合作而來為經濟起飛及鞏固邦誼等重要利益，對泰中關係發展可謂只有好沒有壞 (Masviriyakul, 2004: 302-4, 316-7; 戴萬平, 2011: 82)。

除顧及區域經濟發展外，泰國亦協同中國推動東南亞區域安全合作，建立東南亞與中國區域對話機制。為囊括相關利害關係國家一同探究區域安全，1994 年在泰國曼谷所舉行之第一屆「東協地方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便邀請中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日本、韓國及歐盟成員國 (何展傑, 2007: 73)。同年，中國正式加入「東協部長會議」(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 AMM)，1996 年更成為全面對話夥伴 (dialogue partnership)。為增進東南亞與

東亞區域合作，1997 年日本及韓國皆受邀加入東協高峰會，「東協加三」（ASEAN Plus Three, APT）因而誕生（戴萬平，2011: 83）。⁶⁶

隨著區域合作逐漸茁壯，催化泰中關係且促使雙邊友誼與信任更加深厚之契機乃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⁶⁷ 當時中國雖同樣受危機影響，但為避免泰國經濟再度受創，中國宣布人民幣不會貶值，同時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泰國 10 億美元金援，另大幅增加進口泰國產品。對泰國來說，僅中國在危難中伸出援手，美國置身事外態度成為泰中關係緊密推手（Kurlantzick，2007: 36）。經過此次金融危機，泰國深知國家必須繼續落實經濟優先戰略。又泰國與中國原有安全矛盾不再，因此泰國暫時擱置政治議題，改採溫和對華政策。泰國盼藉由鞏固與強化泰中邦誼，以推動未來更多經濟合作（孫學峰、徐勇，2012: 80）。

泰中關係歷經顛簸，雙方由對立轉為合作，逐漸由經濟及軍事朝全方位合作發展。1993 年雙方簽訂《旅遊合作協定》及《引渡條約》、1994 年《民商事司法協助和仲裁合作協定》、1995 年泰國舉辦首屆漢語文化考試、1996 年文化合作諒解備忘錄—雙方互派留學生前往當地國交流及 1997 年簽署《衛生醫學科學和藥品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1999 年泰國外交部長與中國外交部長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泰國關於二十一世紀合作計畫的聯合聲明》，該聲明內容包括貿易、政治、農工業、海運科技、軍事安全、區域整合、文化教育、衛生環保、旅遊等多項議題合作；泰國為東南亞國家中首個與中國簽訂此類聯合聲明國家。⁶⁸ 同年泰國成為該區域首個解禁開放民眾前往中國旅遊之國家，當年民調指出高達 7 成 6 泰國人民認為中國為泰國最親密朋友。該民調出乎意料之結果為僅不到 1 成泰國人民將美國視為泰國最親密朋友（孫學峰、徐勇，2012: 81）。

⁶⁶ 邁入遠離戰後之 21 世紀，東協與中國合作面向日趨漸廣並陸續簽署多邊合作協定，如 2002 年 11 月《東協—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04 年《貨品貿易協定》及《爭端解決協定》、2007 年《服務貿易協定》及 2009 年《投資協定》。隨著各項協定一一生效，亦促成東協與中國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在 2010 年正式成立。詳細資料請參考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東協加一」，<http://www.aseancenter.org.tw/ASEAN1.aspx>。上網檢視日期 2018 年 4 月 21 日。

⁶⁷ 90 年代亞洲國家經濟快速起飛，吸引大量資本流入，致使亞洲各國名目匯率上升。各國為加強吸引外國資金而將匯率與美金掛鉤，實施聯繫匯率制度。

⁶⁸ 聯合聲明詳細資料請參見本文附錄三。

1985 年所成立的泰中兩國部長級經貿聯委會，於 2003 年 6 月升格副總理級；兩國副總理隔年於北京主持首屆副總理級經貿聯委會。泰國政府相當看好與中國的合作，遂於 2003 年與中國單獨簽訂了加速消除蔬果產品關稅協定，共計 116 項產品零關稅。此一協定促使兩國邊境貿易金額大幅增長，兩國經濟整合的程度同樣提昇（戴萬平，2011: 84）。⁶⁹ 自建交以來，泰國與中國於各方面皆有較以往更進一步的合作，如文化、教育、旅遊、科技、政治、經濟等領域，表 3-1 整理出近四十年兩國所簽署之相關協議：

表 3-1 泰中兩國近 40 年所簽署之協議

年份	協定名稱
1975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泰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
1978	《科技合作協定》
1985	《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
1986	《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協定》
1993	《旅遊合作協定》
1993	《引渡條約》
1994	《民商事司法協助和仲裁合作協定》
1997	《貿易經濟和技術合作諒解備忘錄》
1999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泰國關於二十一世紀合作計畫的聯合聲明》
2001	《文化合作協定》
2001	《中國與泰國聯合公報》
2003	《刑事司法協助條約》
2007	《關於相互承認高等教育學歷和學位的協定》
2009	《教育合作協議》
2009	《擴大與深化雙邊經貿合作協議》
2011	《雙邊貨幣互換協議》

⁶⁹ 詳細資料請參考泰國駐華大使館官方網站，「中泰關係」，<http://www.thaiembbeij.org/thaiembbeij/cn/republic-of-china/thai-relations-china/>。上網檢視日期 2014 年 12 月 8 日。

年份	協定名稱
2012	《經貿合作五年發展規劃》
2012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泰王國關於建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
2013	《中泰關係發展遠景規劃》
2014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泰王國政府聯合新聞公報》
2014	《關於在泰國建立人民幣清算安排的合作諒解備忘錄》
2017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泰王國政府關於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諒解備忘錄》

資料來源：表格作者自繪，資料取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官方網站⁷⁰

隨著泰國與中國雙邊合作日趨緊密，雙方更加信任彼此，泰國對華政策漸有別於新中國建立初期排華政策。泰國原先恐懼共產主義經其國內華人滲透整個國家，惟在中國於 1980 年宣布不再承認雙重國籍後，復中國持續對泰國伸出友善之手，故早期泰國擔憂境內華人族群忠誠度情形已不復存。

國際情勢在催化泰中關係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然泰國皇室亦具重要意義。在泰國政治中，總理與其內閣雖握有大權，但在鞏固外交關係如泰國與中國邦誼上，泰國皇室二公主－詩琳通公主（Her Royal Highness Princess Maha Chakri Sirindhorn，มหาจักรีสิรินธร）貢獻絕不容小覷。詩琳通公主長年參與實務外交，並積極推廣泰國文化。由於精通泰英中法日德西多種語言，公主與中國高層官員溝通時並無隔閡，使關係建立更加順利，泰國多少亦因公主與中國保持更為友好關係。⁷¹ 1981 年 5 月，泰中建交甫步上軌道之時，詩琳通公主便代表泰國領團前往中國訪問。期間公主乙行參訪西安、成都及昆明，沿途所遇官員與民眾熱烈歡迎，實難以想像泰國皇室在中國竟可獲得如此待遇。對此，公主當時在訪問歡迎宴會上致詞表示：

⁷⁰ 詳細資料請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官方網站，「中國同泰國的關係」，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sbgx_676936/。上網檢視日期 2018 年 4 月 21 日。

⁷¹ 詳細資料請參考 Cynthia Peters, “Princess Maha Chakri Sirindhorn of Thailand Receives Honorary Degree From Pomona College.” Pomona University News: <http://archive.is/P8MPi>。上網檢視日期 2018 年 2 月 14 日。


「我及全團將把我所見所聞及學習得到的事物，尤其是中國人民的友誼，傳達給泰國人民知悉這次訪問中國的成就。」

返泰後，公主便撰寫名為《踏訪龍的國土》（*บ้านดงมังกร*）一書，描述此次旅程所見識之中國，同時更將中國人民熱情寫入書中，而此著作對改善泰中關係功不可沒。公主近 40 年來訪問中國 40 餘次，可謂每年皆訪問中國。⁷² 公主曾在 1990 年踏訪絲路、1991 年非正式拜訪、1992 年前往京津唐地區、1994 年訪問東北三省、1995 年參訪雲南、1996 年遊覽長江三峽、1997 年參加香港回歸典禮及 1999 年當年更分次訪問香港、江蘇、浙江、雲南並參與澳門回歸慶典。對詩琳通公主來說，前往中國彷彿探訪遠房親戚，而每回自中國歸來時，同樣撰寫書籍記載訪問，以便更多泰國人民透過書本認識中國。多年累積對中國認識，公主除撰寫上述《踏訪龍的國土》記錄中國遊歷外，亦有《平沙萬里行》（*มุ่งไกลในรอยทราย*）、《雲霧中的雪花》（*เกล็ดหิมะในสายหมอก*）、《彩雲之南》（*ใต้เมฆที่เมฆใต้*）等書，分享在中國所見所聞（余定邦、陳樹森，2009: 389, 92）。由於詩琳通公主深受泰國及中國人愛戴且視為模範，故公主不僅為眾多泰中民眾學習中泰文動機，更曾於 2009 年當選「中國緣：十大國際友人」（*Chinese Connection: Top Ten International Friends of China*），作為泰中兩國友誼橋樑。⁷³

綜上所述，泰國從擔憂華人族群淪陷、畏懼共產主義入侵、推動與中國活躍經貿交往至目前全方位合作，泰中雙邊關係在歷經風波後，達至穩定友好邦誼。90 年代出口導向、金融開放及自由化政策為泰國敞開長年閉鎖之大門，迎接全球貿易。與中國等其他經濟體合作，促使泰國經濟狀況大幅改善，帶來豐饒收穫。儘管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重創泰國經濟，然政府在此次經驗學習到，在全球化波浪下，務必得與國際合作且接受他國協助。泰國外交策略，尤其與鄰近國家互動政策，亦隨國際情勢改變。其中變化最顯著，既為泰國與中國關係。泰中雙

⁷²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泰國大使館官方網站資料顯示，2017 年為詩琳通公主第 41 次訪問中國。另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於 2018 年 3 月 27 日表示，公主受邀於 4 月 3 日至 10 日再度訪問中國。詳細資料請參考「泰國詩琳通公主對中國進行第 41 次訪問」，<http://www.chinaembassy.or.th/chn/ztgx/t1453702.htm> 及「2018 年 3 月 27 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545795.shtml。上網檢視日期 2018 年 4 月 22 日。

⁷³ 詳細資料請參考“Princess Sirindhorn: An Outstanding Envoy of Sino-Thai Friendship,” CRI English: <http://english.cri.cn/6909/2009/11/26/2301s531846.htm>。上網檢視日期 2018 年 2 月 14 日。



邊關係發展自早期進貢身分、冷戰前短暫合作、冷戰期間勢不兩立至 1975 年建交出現逆轉，雙方互動自此日益頻繁且合作日益緊密。僅在 1998 年至 2000 年間，雙方各階層互訪交流次數既高達 1,500 次。而後泰中幾近每年簽署一份協定，泰中關係發展逐漸邁向高峰。在國家利益與經濟發展凌駕在政治堅持情況下，泰國不再因意識形態或政治議題而排斥與中國合作。

泰國對華政策因應國際局勢與國內經濟需求，穩妥順著最有利國家之風勢轉向。華人族群自始並未能直接影響泰國對華政策。泰國政府向來視大環境變動調整外交政策，對境內華人擔憂僅限早期華人掌握經濟及反共時期害怕華人淪為共產中國工具。除泰國政府與華人相安共處，華人族群亦不再認同自己為中國人，視自身為正統泰國人。如今泰國華人對華人性意識沈寂已久，是否又將在中國崛起之際，拾獲原先遺失對華身分認同呢？華人意識能否逐漸復甦？本文下一章將針對中國崛起對泰國華人身分認同與意識影響加以分析。

第四章 中國崛起對泰國華人身分認同影

響



本章節主要探討中國崛起是否對喚醒已沉寂泰國華人認同及意識有所作用，且當鄰國逐漸成為強權大國時，泰國又如何積極應對。本章節將分為二小節，第一節探究中國崛起意涵、中國經濟強權如何影響東南亞及泰國如何透過經貿合作加以維繫與中國關係。第二節則分析中國崛起是否影響泰國華人再華化及改變華人身分認同。

第一節 中國崛起意涵及其影響


近年亞洲出現一顆冉冉升起耀眼星星，此新興勢力—中國—不僅經濟快速起飛，更在國際政治上搏得主要角色。中國不僅與美國並列世界二大強權，美中更譜出新型大國關係。如今中國已儼然成為國際關注焦點，本文前一章節已分析新中國如何在後冷戰時期全力推動及參與區域整合，以積極提升保持與東南亞國家友好關係。面對中國崛起（China's Rise, Rise of China）及可能帶來之影響，國際上衍生出「中國威脅論」（China Threat Theory），眾多鄰近中國國家更是畏懼此一新興強權威脅國家利益。⁷⁴ 為紓緩國際社會因中國崛起負面印象而產生壓力，中國乃以「韜光養晦」策略試圖營造其在區域和平崛起氛圍。⁷⁵

壹、中國崛起

為改善新中國表現不佳之經濟，鄧小平於 1978 年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經濟旋一躍而升（高朗，2006: 56）。國際情勢因而在後冷戰時期出現新局面，

⁷⁴ 隨著中國在 1979 年起推行經濟改革開放政策起，20 世紀末之中國經濟迅速發展，部分將中國此新興經濟及軍事強權視為危害美國及亞太地區國家利益者。「中國威脅論」意指中國將使用其新興勢力破壞區域安全。根據 Emma V. Broomfield (2003: 266) 分析，所謂中國崛起將帶來之「威脅」可分為意識型態 (ideological)、經濟 (economic) 及軍事 (military) 三種類型。

⁷⁵ 中國自 90 年代初期以來，即以「韜光養晦」作為對外戰略方針，以謹慎及自我克制之低調戰略處理外交關係（周方銀，2011: 6）。



當時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平均成長率高達 10%，成功將新中國推上世界舞台（孫學峰、黃宇興，2011: 22）。中國不僅經貿實力提升，在外交及軍事方面亦成為主要強權（Christensen, 2006: 101）。由於國內龐大人口持續增加，中國成為亞太地區最大經濟市場。區域經濟則因而以中國為核心發展，中國逐漸變成亞太各國最大貿易夥伴（Christensen, 2006: 89）。曾為世界強權之中國重返世界中心，國際社會不禁擔憂未來勢力佈局。有關中國潛在實力，拿破崙曾表示：「讓中國繼續沉睡吧，否則當她甦醒時，全世界將為之震驚。」⁷⁶ 隨著 2003 年中國太空船神州五號成功升上太空、2008 年中國擔任「奧林匹克運動會」主辦國及大量外國資金流入中國，中國近 20 年來不但已從長眠中醒來，更逐漸崛起且再度躍上國際舞台（初國華、張昌吉，2010: 130）。除積極發展科技及承辦國際運動賽事，中國生產能力更令人眼睛為之一亮。世界各國製造業為降低成本，維持市場競爭力，紛紛將生產線移至中國（高朗，2006: 58）。亞太地區對中國投資金額直線成長，當美國對中投資增加有限時，亞太國家對中投資卻以倍數成長（Christensen, 2006: 91）。經濟起飛之中國雖帶來經貿機會，然同時致使亞洲地區及全世界擔憂恐懼，深怕中國成為霸權並威脅區域穩定繁榮。

對國際社會來說，強權崛起乃無法避免之事實。然除大國崛起將為國際情勢帶來改變外，強權如何崛起及其崛起過程中對他國影響則更為緊要。如同前述，隨著中國實力增長，此不免引起他國警惕與懷疑。國際社會之所以提出中國威脅論或中國崛起論調，乃受過去美國主導國際局勢影響。美國依照對國家利益與安全定義，劃分界定國際社會中敵人與朋友。隨著國際情勢變遷，當中國未抵觸美國利益時則為朋友，時則為美國敵人（高朗，2006: 64）。儘管部分國家跟隨美國評析中國崛起論調，然各國在面對中國實力增加及崛起之情感與認知－視中國為威脅亦或機會－仍須端視該國屬性與中國異同及身分彼此相互獨立或可為同群（石之瑜、張登及，2009: 197）。故除中國威脅論外，國際社會亦存在「中國機會論」（China Opportunity Theory），部分國家把握中國經濟起飛契機，順勢藉由與中國經貿往來以大幅提升國內經濟。

⁷⁶ 引文原文為 “Let China sleep; when she wakes she will shake the world”。詳細資料出自「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China’s fitful sleep”，<http://www.economist.com/node/151617>。上網檢視日期 2018 年 4 月 23 日。

回顧中國崛起過程，為免國際過度注視中國快速增長之實力，即以「韜光養晦」包裝崛起事實。中國何須「韜光養晦」及「包裝」？以字面意義分析，韜光養晦意指隱藏才能，以便隱忍待機蓄勢待發。此外，透過包裝及掩蓋耀眼光芒，中國使自身實力顯得較弱，以避免強敵關注並認為中國足以構成威脅。藉由低調及掩飾，中國得以創造寬裕發展空間，降低外界干擾阻力（周方銀，2011: 9）。

為減緩國際對中國崛起質疑及批評聲浪，中國外交人員自 90 年代起，便極力向在世界各國塑造中國作為友善世界公民及區域好鄰居名聲，以扭轉鄰國及世界各國對中國崛起刻板負面印象。中國外交人員任務在於，建構中國乃負責任大國形象，此大國不僅不危害他國利益，亦不挑戰現有國際秩序。此外，中國更可提供區域—乃至全球經濟—持續繁榮絕佳機會（Breslin, 2009: 822）。中國亦不尋求成為亞洲或任何區域霸權，而在處理與鄰國外交關係抑或周邊關係時，則皆以「睦鄰、安鄰、富鄰」為準則。⁷⁷ 針對睦鄰外交意涵，中國國務院前總理趙紫陽在 1984 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許志嘉，2007: 47）：

「我們特別重視發展同鄰近國家的睦鄰關係，因為這不僅關係到我國的安全和發展，而且影響整個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和穩定。」

儘管中國早早便提出睦鄰外交、友善世界公民等外交方針，然為消弭國際長年累積對中國負面印象，胡錦濤亦在 21 世紀初接任總理後便提出以「和平崛起」作為中國對外交往與國家發展原則（初國華、張昌吉，2010: 135）。為確保國際社會主要國家對中國保持友善，中國踏出亞太地區，將善意延伸至拉美及非洲地區發展中國家。此外，中國亦藉由積極參與多邊對話機制，推進國際合作，展現中國身為大國而不傲之姿態（周祉元，2005: 101）。

為落實上述睦鄰友好政策，中國推動各項與亞太地區合作具體作法，以同時鞏固其在亞太地位及與各國關係。而在亞太地區中，與中國鄰近且華人族裔活躍之東南亞更為中國外交佈局重中之重。本文將接著探究東南亞視中國為威脅或契機、如何因應中國崛起及目前中國與東南亞關係。

⁷⁷ 胡錦濤在 2004 年 9 月「亞洲政黨會議」時表示，中共將持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旗幟，以「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及「與鄰為善、以鄰為伴」作為週邊外交方針，另以「睦鄰、安鄰、富鄰」作為週邊外交政策指標（周祉元，2005:100）。

貳、崛起之中國與東南亞關係



近年中國快速發展，連帶提升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雙邊及多邊關係。由於中國一躍成為區域內最大經濟體，高額對外投資亦塑造中國成為東南亞重要貿易夥伴。中國崛起，對鄰近東南亞國家具有經濟及文化影響（劉宏，2012: 67）。Joshua Kurlantzick（2007: vii）在其著作《魅力攻勢：中國軟實力如何改變世界》（*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描述1998年初抵泰國時，根本從未想過某天中國影響將席捲泰國或甚全世界。

然中國確實在近20年來急速崛起，而自21世紀初以來，已有眾多學術著作探討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相關分析主要著重當中國發展持續奔騰時，對東南亞經濟發展影響及挑戰。為全力衝刺中國經濟，鄧小平時期即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就此踏上蛻變道路。隨著國力不停增長，中國猶如一把雙面刃，雖極具威脅性，然部分國家仍將此新興霸權崛起視為轉機。由於中國與東南亞經濟合作快速發展，部分東南亞開發中國家得以接觸中國龐大市場，並進口原物料及出口部分產品（Yeoh, 2009: 3; Yeoh et al., 2009: 3）。相較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甚為恐懼，如今東南亞與中國在經濟及安全議題達至共識，透過雙邊及多邊合作鞏固友誼，似較能接受中國崛起此一事實，並視此為機遇。由於中國不僅與越南、寮國及緬甸比鄰，亦相當接近泰國與柬埔寨，此地理位置亦賦予東南亞與中國特殊亦敵亦友關係。東南亞國家畏懼崛起之中國可謂毫無疑問，然中國並不以此為傲，反倒透過積極溝通與合作消弭他國恐懼。對於中國主動示好，東南亞除盼望藉此由東協與中國雙邊經濟合作，更追求大亞太地區多邊經濟整合。

在國際社會中，大國經濟起飛雖可間接提升鄰近合作國家經濟，卻又如同黑洞深不見底。當全球經濟景氣低迷，對崛起之中國帶來衝擊相當微幅，而屹立不搖之中國經濟為東亞金融復甦更帶來貢獻。然長年以「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作為國家經濟支柱之東南亞，如今不禁擔憂外國資金將不停外流並轉移至中國此新興經濟體。在21世紀初暨中國甫崛起時作為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Lee Hsien Loong）曾針對前述憂慮表示（Chantasawat et al., 2003: 3-4）：

「東南亞國家現正因為國內勞工密集產業外移至中國，而面臨極大競爭壓力。此外移現象指標在於，原先東南亞外資金額約為東北亞二倍，如今該比例卻已反轉。」

由於中國廉價生產成本致使東南亞產業鏈外移，造成眾多國家經濟萎縮。東南亞貿易政策原以出口導向為主，如今因各項資源外流而大受打擊，中國儼然成為威脅。儘管 FDI 流向報告顯示，中國在 1992 至 1997 年間既已擁有超越東協外資額，惟 1999 年確實為資金轉向顯著分水嶺。當時中國 FDI 每年增加約 500 億，而東協 FDI 則相對驟減（Ravenhill, 2006: 654）。二世紀以來首次，東南亞諸國政府熱烈討論中國經濟表現與發展。中國與鄰近國家經濟關係猶如蜘蛛網般，牽一髮動全身。現今東南亞國家最大難題，莫過於應如何保證及保持與中國長期良善合作。與中國擁有最相似的利益與安全擔憂的毫無疑問為東南亞國家。區域的經濟繁榮與國家安全乃東南亞各國與中國共同的期望，尤其中國崛起的堅強實力，致使東南亞各國對於如何應對與中國之關係更加步步為營。

自 1980 年代起，中國即以三個政治原則作為與東南亞國家及其他區域交往政策決定原則（Ku, 2009: 23）：

- 開放政策（Open-Door Policy）－此政策不僅改革中國政治經濟，邁向現代化發展，同時也改變了國際政治經濟的秩序走向。中國於 1981 年首次於新加坡建立商務代表處（Commercial Representative Office），1985 年則是與印尼恢復雙向直接貿易，同時與汶萊接洽進行間接貿易。
- 睦鄰政策（Good Neighbour Policy）－假設 80 年代為中國開放門戶，走向東南亞與世界，那麼 90 年代則為中國積極強化與東南亞關係的階段。所謂的睦鄰政策共有七個要點，其中四個與東南亞有關。南海能源利用潛能；尋找透過緬甸連接印度洋的方法；鞏固、擴大與整合市場並與東協更緊密合作；填補蘇聯瓦解後於中南半島所留權力真空。1989 年中國與寮國關係正常化，1990 年與印尼、新加坡建交，而 1991 年則是與越南正常化交往。
- 邁向全球策略（Going Global Strategy）－2002 年的中國政治策略則是迎向世界，當年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邁向

全球之目的在於讓世界看見中國，將中國的企業推上國際。與此並行的為東南亞睦鄰政策，讓東南亞國家能夠放心中國在經濟飛揚之時，不會給予鄰國壓力與威脅。



除直接加強與東南亞合作外，中國更運用其崛起勢力，宣布「一帶一路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此一倡議象徵，中國將自東南亞出發並推展至與全世界合作。2013 年習近平出訪中亞及東南亞時，便提及絲綢之路經濟帶及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根據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之一帶一路倡議內容，該倡議有助提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經濟繁榮、增進文明間交流與認識及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而東南亞及相關國家在一帶一路倡議中均扮演不可或缺角色。⁷⁸ 該倡議內涵亦可歸納為「五通三同」，五通為政策溝通、攝氏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及民心相通，三同則為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及責任共同體。透過一帶一路，除推進經貿交流，更可展現中國軟實力（任弘，2017: 247）。

當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積極建立相互信任及推進雙邊合作時，泰國已悄悄敞開國家大門歡迎中國前來作客。因中泰一家親，21 世紀初中國熱即在泰國引領風潮。泰國民主黨黨主席 Abhisit Vejjajiva 曾表示，許多國家稱中國為威脅，但對泰國來說，二國猶如親兄弟血濃於水，故何來威脅？儘管中國是世界強權，泰國並未視中國為威脅（Zawacki，2017: 194）。相較於其他國家擔憂中國成為亞洲霸權，壓縮甚至損及各國國家利益，泰國民眾對中國印象則著重在隨中國崛起而來之契機。早在 2003 年，一份針對曼谷市民問卷調查即顯示，高達 76% 市民認為中國與泰國最親近，僅 8% 市民選擇泰國最大貿易夥伴及投資來源國—日本，另僅約 9% 市民認為美國與泰國最友好。⁷⁹ 泰中情誼乃仰賴中國魅力攻勢外交政策，透過資助、與海外華人互動逐步累積關係，而泰國則看準搭上中國崛起順風車可帶來之龐大利益，雙方可謂互取所需（Kurlantzick，2007: 128）。泰國大眾或企業對於親近中國並無反彈或反對，因此龐大利益為全民共享之，企業進軍中國市場投資獲利最

⁷⁸ 詳細資料參考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ull text: Action plan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ttp://english.gov.cn/archive/publications/2015/03/30/content_281475080249035.htm。上網檢視日期 2018 年 4 月 29 日。

⁷⁹ 詳細資料參考 Washington Post 2003 年 11 月 5 日報導，"China's Improving Image Challenges U.S. in Asia"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2003/11/15/chinas-improving-image-challenges-us-in-asia/7e9b4f66-5291-4b86-ae09-e2386399ba70/?utm_term=.fc922d2be7b9。上網檢視日期 2018 年 4 月 28 日。

為可觀。如由泰國華人家族創立之正大集團（Charoen Pokphand Group，簡稱 CP Group）20 世紀末即前往中國投資，包括與中國合資開發旅遊區，大幅擴展正大集團在中國勢力（莊國土，2014: 10）。泰國金融業同樣跟進企業腳步，由華人協力創立之盤谷銀行（Bangkok Bank）已在中國設立 5 家分行，積極拓展版圖。

80

為推進雙邊關係，中國頻對泰國釋出善意。如 2013 年雙方簽署《中泰關係發展遠景規劃》及 2014 年簽訂協議同意共同建設貫穿泰國南北之雙軌鐵路（稱中泰鐵路）等，本文前已詳列泰中簽署之相關協議（者貴昌，2017: 38）。中國除在經貿及文化推動雙邊合作，在教育方面同樣拉攏泰國。為促進學術交流，將中國形象及中華文化透過教育使泰國學生潛移默化，中國積極邀請泰國前往中國訪問及進修（Kurlantzick, 2007: 63）。此外，隨著中國崛起及一帶一路倡議各項合作持續推行，泰國華人族群成為中國連結泰國社會橋樑，其中華商扮演重要角色。該倡議做為中國經濟與華人經濟融合新動能，透過華人當地網絡進而促使雙方交流互動（任弘，2017: 262）。在中國強勢影響下，泰國華人角色及認同如何轉變即成為學術研析議題。

第二節 中國崛起下泰國華人與再華化

泰國與中國雙邊關係自初期朝貢體系發展迄今，已演變為泰中親如兄弟一家親。泰國境內華人族群透過參政及經商，在泰國政治及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有關泰國華人身分，本文前已探討分析華人在文化融合下身分及政治認同有何轉變。作為融合同化較為完全之華人族群，泰國華人早已不再自稱中國人，而為道地泰國人。

壹、華人血統展現

華人家族在泰國深耕多年，在政府積極推行同化政策下，華人與當地族群融合程度較其他東南亞華人更高。回顧泰國華人發展歷史，早期華人保有強烈中華

⁸⁰ 詳細資料參考盤谷銀行中國官方網站簡介。http://www.bangkokbank.com.cn/index_en_1.html。
上網檢視日期 2018 年 4 月 28 日。



文化傳統、宗族觀念及血脈傳承精神。當時華人多沿用中文姓名，惟在泰國政府強力實施同化政策，復泰國數任總理曾前後推行限華排華政策，華人因而面臨須更名改姓難題。泰國拉瑪六世曾在頒布《制姓條例》（Surname Designation or Family Name Act）時表示鼓勵華人使用泰姓。⁸¹ 由於不堪當時限華政策對華人課徵高額稅金及諸多限制措施，眾多華人為保生活而選擇歸化泰籍並採用泰文姓氏。由於華人紛紛捨棄中文姓名，致使目前絕大部分華人家族皆為泰國籍且使用泰姓。然值得注意部分華人合併新取泰文姓氏與舊有中文姓氏，如姓氏開頭使用 Tan（陳）、Lim（林）及 Wong（黃）等，部分華人完全捨棄原有姓氏，而另一部分華人除新取泰文姓名外亦保有中文姓名。⁸² 此現象即說明泰國眾多宗親會及華人聯誼組織存在原因（金勇，2006: 60-61）。然隨著 21 世紀到來，中國崛起並成為亞太地區強權，泰國華人與中國互動往來頻密，華人姓名使用情形漸出現變化。早期華人因受泰國政府限華政策影響，難以將資金回流中國，惟隨著政府開放及中國經濟起飛，華人經商逐漸須頻繁接觸中國生意夥伴。為拉近與中國商人距離，部分華人便主動告知中文姓名及祖籍，以建立情誼。根據筆者曾在泰國居住近 10 年及因工作須頻繁接觸泰國人經驗，早期泰國人名片僅印有泰文姓名及聯絡資訊，中期出現泰英雙語名片，近年則以泰中英三語名片最為普遍。筆者近 2 年內所接觸之泰國人，時常以中文姓名面朝上方式遞交名片，似以凸顯與中文潮流連結。除告知中文姓名並以簡易中文問好，筆者接觸之泰國華人亦順帶介紹祖籍，透過對談方式不經意提及自身華人背景。然值得注意泰國華人並未因而宣揚中華文化或讚賞中國崛起，故此類談話內容僅限於中文姓名及祖籍，做為初次見面開場白。

83

⁸¹ 在拉瑪六世於 1913 年頒布《制姓條例》前，泰國並未使用姓氏，而該條例規定公民須具完整姓名，泰國姓氏因而誕生。

⁸² 部分華人將中文姓氏以泰文字意併入泰文姓氏，如姓氏「馬」則以泰文字意為「馬」之“*Asawa*”或“*acha*”為姓氏字根或字尾，如“*Asawaheam*”或“*Sinlapaacha*”。又或以潮州發音之「姓」（*Sae*）加上原有姓氏如陳、林等，取姓氏為 *Sae Tan*（姓陳）或 *Sae Lim*（姓林）。以筆者前在泰國泰國華人同學為例，部分使用中文姓氏併入泰文姓氏、部分取泰文字意及少數以 *Sae* 合併中文姓氏。詳細資訊參考看見泰國，「泰國姓名藏玄機」<https://visionthai.net/article/secrets-in-thai-name/>。上網檢視日期 2018 年 4 月 29 日。

⁸³ 根據筆者經驗及分析，此類泰國華人多因見筆者為臺灣人，而盼以中文及中華文化做為橋樑拉近彼此距離。筆者鮮少遇見泰國華人對中文姓名情感深厚，瞭解其文化傳承意義，中文姓名及學習簡易中文成為與其他熟稔中文者建立情誼工具。


承接上述分析，隨者近年部分泰國華人逐漸使用中文姓名自我介紹，華人似喚起沉寂長久之華人身分認同，對於中華文化認識與聯繫似日益增升。然根據學術抽樣調查，高比例新生代華人及其家族成員並無使用中文姓名。即便擁有中文姓名，華人家族願在姓名中保留華人特性者亦為少數，多數僅因遵從老一代長輩取名傳統，針對中文姓名意義則較不重視且不瞭解其中內涵（沈玲，2015: 282-3）。新生代華人對自身華人血統似無特別情感，中文姓名僅為工具，而不直接影響華人身分認同。

此外，根據本文前所探究，泰國華人參政情形甚為踴躍，從基層政府官員至政府領導者，皆不乏具華人血統者。⁸⁴ 近年頻繁出現在國際新聞頭版，創造媒體話題之前總理塔信及胞妹盈拉，即為具華人政治人物代表。泰國政界華人比例之高，2006 年國會議員共三分之二具華人血統，泰國多位總理亦為華人後代。相較以往華人低調不顯現華人背景，現今泰國政治人物樂於公開宣傳自身華人身分，彰顯與中國聯繫並促進往來，藉以提升國內支持度（劉宏，2010: 88）。針對泰國政治人物與中國密切關係，泰國前參議員 Kraisak Choonhavan 曾表示：

「放眼國會，我所看見且認識的國會議員都預計訪問中國。若你身為泰國國會議員，訪問中國參加研討會或其他活動便是再簡單不過的事情。」
（Kurlantzick, 2007: 103）

由於泰國長期多以具華人血統之領導者及政治人物主導政府及政策，此則成為泰中關係友好且穩定發展之主因（莊國土，2014: 16）。透過華人作為雙方橋樑，泰國無論在政治互動或經濟往來皆與中國連結密切。至泰國華人參政踴躍情形是否與自身華人身分認同息息相關，據筆者過往接觸之議員表示，參政與否乃以個人興趣及志向為主，與華人血統並無直接關聯。議員對參政工作熱忱源自自身對國家政治及發展關心，近年中國崛起並未促使議員因考量華人血統，而積極推進泰中雙邊關係抑或起草保障華人權益法案。另根據對新生代華人抽樣訪談結果顯

⁸⁴ 泰國中華總商會主席劉錦庭曾表示，由於泰國華人積極參政，除歷任總理及內閣首長不乏為華人後代，華人更儼然成為泰國主流社會重要力量。劉主席另強調，華人參政為必要，以利為僑胞爭取權利及維護華人權益。此與筆者詢問之泰國華人官員所持理念不同，然少數華人參政或確實如劉主席所言，盼為華人出頭。詳細資料參考中國新聞網，『消除「過客」心態 海外華僑華人要勇敢走出唐人街』。<http://www.chinanews.com/hr/2012/05-07/3868193.shtml>。上網檢視日期 2018 年 4 月 29 日。



示，逾 9 成受訪者並無因欲為華人發聲及爭取權益而未來將參政之念頭。新生代華人更明確表示自身為泰國人，泰國不存在華人及泰國人身分差異。華人雖與泰國人血統不同，但權益權利相同（沈玲，2015: 281）。分析當代泰國社會融合程度，由於人人皆認同泰國且自認為泰國人，似無須再依血統區分華人或泰國人。泰國華人展現血統僅限於增進個人利益或做為社交工具，無涉身分、國家及文化認同。

貳、華語教學蓬勃

有關泰國華語教學發展，本文前曾探究泰國政府因國際情勢而實施限華政策，其中華語教學即為限制目標。當時推行之政策導致幾乎所有華校須面臨閉校困境，華語學習熱潮頓時沒落。然隨著國際情勢變遷，中國與泰國關係日趨緊密，中國崛起成為主要世界強權，泰國政府便視情彈性調整政策。1992 年，泰國政府推行有條件開放華語教學政策，包括允許增設華語幼稚園及華語中小學可將華語列為選修課。此外，泰國教育部亦制訂從 1999 年起在公立中學開設華語課程計畫，另主張且支持泰國大專院校同樣設立華語課（陳旋波，2011: 310-1）。當年泰國教育部長既曾表示，華語對泰國未來與英文同樣重要，因泰中交往日趨頻密（吳群、李有江，2004: 64）。由於泰國人民甚為尊敬及崇拜泰國皇室，詩琳通公主流利華語亦引起人民仿效，泰國便正式迎來華語熱（陳旋波，2011: 312）。二十一世紀初即中國外交人員數量突增，在泰國境內四處設立領事館及華語中心。泰國人逐漸想學習華語，語言補習班更在曼谷精華商業區開班招生（Kurlantzick, 2007: viii）。然觀察華語熱席卷泰國即可發現此非因其境內華人眾多，政府實乃受國際現勢影響。以國家利益為優先，泰國視華語為推進泰國對外關係工具，如英語及其他外語一般，華語地位及作用並無特殊之處。相較過往由華語學校自行推展華語教育，泰國政府透過訂定培養師資、安排課程內容及編撰華語教材，得以從宏觀角度掌握泰國華語教育發展方向（楊保筠，2016: 6）。從推廣華語教育開始便由政府做決策，此有助泰國政府免除過往擔憂華語教學釀禍煩惱。

泰國華語教育熱潮另一主要因素在於泰國觀光旅遊業蓬勃發展。自中國經濟起飛以來，部分中國人逐漸變得較過往富有，出國旅行便成為假日出遊選項。世界觀光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估計，2020 年將有 1 億中國人出國旅

遊，中國將成為全世界最大旅客來源國（Kurlantzick, 2007: 106）。根據泰國觀光暨體育部統計，2016 年中國赴泰旅客高達 882 萬人次，居全球之首。中國旅客在泰國平均停留 8.24 日居亞洲地區之冠，而每日人均消費則為 178.47 美元，些為之差僅次於香港及汶萊旅客均消 182.03 及 180.78 美元。⁸⁵ 數百萬中國旅客湧入為泰國帶來可觀經濟效益，光 2016 年即貢獻泰國高達近 130 億美元觀光營收，同樣在各國赴泰旅客中排名第一。自中國崛起以來，泰國政府視中國旅客訪泰為龐大商機，而華語勢必有助泰國趁勢再推展觀光業（陳傳宇，2017: 67）。華語教學近年來日趨盛行，目前泰國近 3 千所學校均設有華語課，學習華語人數更逾 80 萬。根據統計顯示，泰國教育部管轄之 700 所學校早在 2012 年即有約 30 萬名學生學習華語（沈玲，2015: 291）。隨著華語學習潮流迅速散播，華語儼然成為泰國第二大外語，僅次英語。針對學業進修選項，泰國學生有別於以往以歐美為留學優先，如今更為踴躍前往中國。⁸⁶

目前除泰國學校自行設立華語課，與泰國關係緊密之中國為推廣華語教學，亦在 2006 年至 2016 年共 10 年間在泰國設立 15 所華語教學中心「孔子學院」及 11 個孔子課堂。⁸⁷ 另因泰國華人族群與當地主流社會融合，無論華人後代或純泰國人皆認為華語為實用工具（陳旋波，2011: 320）。因此自 2005 年以來，「泰中文化經濟協會」與中國福建華僑大學合作，由協會每年派送泰國政府各部門人員，包括軍公警及獨立機構，前往華僑大學進修漢語一年並由大學提供全額獎學金。

⁸⁸ 由於華語教育符合泰國政府及人民利益，對中國來說亦為推廣軟實力（soft power）契機，於是形成推拉效應。⁸⁹ 中國藉由自身崛起改變國際局勢時，以柔

⁸⁵ 至 2018 年 4 月止，泰國觀光暨體育部尚未公布 2017 年度觀光統計資料，故以 2016 為例。詳細資料詳見該部官方網站，http://www.mots.go.th/mots_en57/ewt_dl_link.php?nid=3468。上網檢視日期 2018 年 4 月 30 日。

⁸⁶ 《志願·青春·泰國—赴泰漢語教師志願者必讀》曼谷：留中出版社。2012 年 8 月。https://issuu.com/qiangyuan/docs/teachers_handbook_5th_2013。

⁸⁷ 詳細資料詳見國家漢辦駐泰國代表處，「泰國：孔子學院十年成規模」。<http://www.hanbanthai.org/news/meitijujiao/2016-10-06/5943.html>。上網檢視日期為 2018 年 4 月 26 日。

⁸⁸ 1993 年，泰國前總理、國防部長及大企業家依照中國政府建議創立「泰中文化經濟協會」。協會除極力推進泰中教育合作外，另負責推動雙邊軍事、投資貿易、觀光旅遊及締結姐妹市等合作。詳細資料參考該協會簡介，<http://www.thaizhong.org/zh/about-us/historical/2011-10-04-06-39-47.html>。上網檢視日期 2018 年 4 月 29 日。

⁸⁹ 我國教育部為宣傳華語，同樣積極與泰國合作推廣華語繁體字教育。教育部亦委託泰國中華會館承辦華語文能力測驗，另以提供獎學金方式鼓勵泰國學生赴臺就學。此外由於我國教育品質優良且學費相較歐美及亞洲其他國家平價，眾多泰國學生特地因而來臺求學。詳細資訊請參考

性攻勢順帶推廣海外華語教育，宣揚中華文化，此可視為中國海外希望及留根工程。透過持續提升對海外僑胞及華語教育服務品質及能力，如培養華語教師人才、提供海外華人華語獎學金、資助海外華校發展、給予海外華校華語教材、遴選華語教師赴海外任教及每年安排教育專家赴海外對當地華語教師巡迴講習培訓，中國政府得以此類計畫及活動為推銷工具，除可透過教育合作維繫與泰國友好情誼並同時塑造崛起無害形象（張秀明，2015: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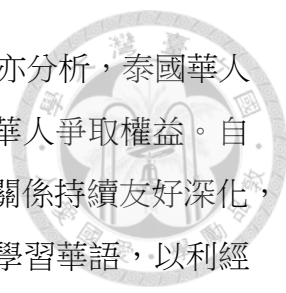
綜上所述，儘管華語熱在泰國持續燃燒，然泰國政府及人民皆視華語為多用途工具，與華人族群及認同無所關聯。泰國視華語為推進泰國對外關係工具，華人則將華語作為經商及求學等工具。

參、再華化可能性

回顧泰國華人積極學習華語情形，部分學術研究分析此現象背後動機。以東南亞整體為例，研究顯示東南亞學生文化認同與語言使用程度密切相關。若學生對中華文化強烈認同，則較重視學習華語，且刺激鼓勵自己不斷提升華語程度，有助克服學習困難（朱緹緹，2017: 404）。又另一調查結果顯示，不到1%泰國新生代華人受訪者表示因華人血統而主動學習華語，2.14%因有興趣而學習華語，而高達89%乃應家族長輩要求而學習華語。部分受訪者受到家族從事與中國相關工作影響，如商貿、餐飲及觀光業，因而認為學習華語有助未來工作面試或承接家庭企業（沈玲，2015: 291）。據筆者長年接觸泰國人經驗，無論學生時期同學或工作時期結識朋友，每當問起學習華語動機，答案多為家族長輩要求及未來經商或接手家業便利。由此可見，儘管中國崛起順勢帶來華語熱，然泰國華人紛紛學習華語以做為工具，此猶如華人擁有中文姓名卻不意即其身分認同有所改變。

根據統計，目前泰國華人約佔泰國總人口數10至11%，惟眾多華人因早已融入泰國社會且更名改姓，實際華人人數難以測量。雖非人口多數，泰國華人卻

我國駐泰國經濟文化辦事處「泰國中華會館舉辦華語文能力測驗圓滿成功」，<https://www.roc-taiwan.org/th/post/5121.html> 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中文熱發酵 來台泰生增10倍」，<http://pr.ntnu.edu.tw/newspaper/index.php?mode=data&id=16347>。上網檢視日期2018年4月25日。



佔有國會及省議會高達 7 成席次（楊保筠，2016: 2）。本文前亦分析，泰國華人參政踴躍，然原因鮮少為對自身華人血統感到驕傲且欲為廣大華人爭取權益。自中國開放以來，泰中從經濟合作逐漸擴展至全方位合作，雙邊關係持續友好深化，泰國華人逐漸關注中國。然例如華人因中國帶起華語熱而積極學習華語，以利經商或旅遊等，學習動機與身為華人後代無關。中國對新生代泰國華人來說，並非家鄉或祖國，僅為地圖上具某程度象徵性區塊（Hau, 2012: 14）。透過觀察及剖析泰國華人社會，不難發現泰國華人身分似不復存。泰國華人成為學術研究中歸類用詞，然此詞彙對泰國華人不具任何意義。身為泰國人且認同及心繫泰國，尊敬及效忠泰國國王，乃為泰國華人根本（許梅，2002b: 52）。所謂「華人身分」，早自泰國政府強勢推行同化政策後，即快速消逝。根據學者分析，泰國華人自 70 年代即面臨「四化」現象，包括人口老化、子孫泰化、語文危機嚴重化及落地生根概念普及化，在在顯示泰國華人身分逝去跡象（江白潮，1989: 102）。另承襲本文前幾章節評析，華人身分概念在泰國政治及外交政策中亦不具意涵。政府在舉辦選舉、籌組內閣、擬定政策及推動改革等，並無因國內華人族群存在而特別考量華人。泰國實施限華政策乃因保障國家利益，避免共產勢力侵入。人民在選舉投票時，亦並非因候選人具華人血統而給予支持，而著重於哪位候選人能夠為泰國國家社稷發展貢獻。

面對中國崛起，泰國華人與中國人事物往來日趨頻密，對於中國認識逐漸加深，泰國華人有無可能再華化（resinicization）？其華人性或華人特質（chineseness）會否顯現？Caroline Hau（2012: 1）認為，再華化意指原先貶值且遭封閉壓抑之華人性復甦復興，及東南亞華人能見度與接受度提升，且對自我肯定及更有自信之現象。華人性則為身為華人之特徵，如文化、語言及認同等。由於中國勢力蔓延全球，東南亞新生代華人藉由學習華語、跟隨家族長輩慶祝中華傳統節日及沈浸在中華文化中，華人可能重新檢視自身身分、文化及國家認同（劉宏，2012: 69）。然新生代華人因自幼在居住地成長，生活圈多元，因而對於參與此類僑團活動未必甚感興趣。一般多因長輩要求而必須參與，然新生代華人並不瞭解華人聚會聯繫情誼意義，致使華人族群以宗親會傳承文化習俗面臨困境（朱東芹，2011: 200）。資料顯示，泰國華人家族以祖父母輩具中國籍比例高，其次為父母輩。隨著泰國同化政策推行，第三、四代華人皆為泰國籍。新生代華



人自幼接受泰國教育，生活起居及生長環境與純泰國人無異，認同泰國且視其為歸屬（沈玲，2015: 280, 289）。新生代華人自認為泰國人，毫無懷疑。泰國華人在自我介紹時，均以泰國人自稱。雖部分或許表示身為華人或具華人血統，惟皆以泰國人為最先表明之身分認同。⁹⁰

近 20 年來中國影響在泰國急速成長，其所帶來商機乃泰國華人關注中國及學習華語主因。⁹¹ 泰國華人在與中國人洽談生意時，可藉由彰顯華人血統及以簡易華語自我介紹，拉近雙方距離，促進商貿往來。又或在泰國以泰英華三語廣告標語及提供華語菜單方式，引起中國旅客注意，對推銷生意甚有助益。對中國情感深淺，老一代華人對中華文化通常具深刻情感聯繫，第二代或新生代華人則不堅持與中國保有連結及傳承文化（沈玲，2015: 304）。泰國華人如今多抱以務實態度面對中國崛起，客觀分析中國影響，並以增加自身利益為優先。如同華人評估凸顯華人血統及學習華語甚為有利，因而選擇花費心力學習華語。此可謂華人對經濟認同，而非國家認同，前所提再華化推論似難以立足。部分學術研究另推測倘泰國龐大華人族群再華化，此或將促使泰國受華人族群及中國帶來之內外影響而「中國化」（楊保筠，2016: 4）。

有關華人再華化論述，由於泰國華人早已同化並與泰國社會融合，學者認為泰國華人族群難再華化，關鍵在於華人身分及國家認同在同化融合時已轉變，華人自認為泰國人。華人或因家族長輩重視而對中華文化些許認同，然由於中國並無「再華化」海外華人意圖，華人自然對中國無所牽掛。有關華人如何看待華語熱，新生代華人因不熟黯華語，隨著中國崛起，華語逐漸成為可用工具。華人因而視華語為另一外國語言，除英語外，另學習日、華語等。由於中國快速發展而在亞洲扮演搶眼角色，此雖不至於造成華人再華化，惟或可扭轉海外族群傳承中華文化衰落趨勢。本文前所分析，中華文化對第二代及新生代華人並無特殊意

⁹⁰ 據筆者過往經驗，所接觸之泰國華人同樣全部自稱泰國人，除遭詢問或主動視情方介紹華人身分。楊保筠在泰國教學時即作出相同觀察，在泰國華人學生比例高達 9 成 5 班級，所有同學首次自我介紹均表示為泰國人，7 成同學主動介紹華人身分，部分學生則在回答是否具華人血統時表明華人身分（楊保筠，2016: 5）。

⁹¹ 如本文前所敘述，由於華語為泰國當紅趨勢，眾多華人對學習華語甚感興趣。惟學習目的並非追尋根源，而在於商業目的且使用人數眾多，有用有利。此與筆者親身經驗相符，學習華語為華人工具，與血統無關。詳細資料參考維京人酒吧，「留學觀察筆記：為什麼泰國華人不會說華文？」。<http://vikingbar.org/2016/12/留學觀察筆記：為什麼泰國華人不會說華文？/>。上網檢視日期 2018 年 4 月 28 日。

義，甚可謂年代久遠歷史。透過中國軟實力宣揚中華文化，提供多元管道供新生代華人接觸中華文化，此或有助華人對原生民族更為認識瞭解。⁹² 儘管中國影響力擴及全球，華人逐漸接觸中國及其文化，此仍無法促成再華化現象。鑒於泰國中國化論述須建立在華人再華化之前提，而目前泰國華人並無此傾向，則再華化及中國化似為不存在之議題。實質上，泰國華人亦非華人，因其身分、文化及國家認同早已自華人轉化為泰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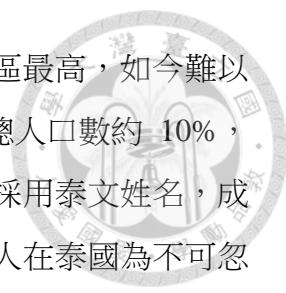
⁹² 詳細資料請參考本文附錄五「北京大學海外華僑華人概論印紅標教授訪談稿」。

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旨在嘗試探究分析，泰國華人性與身分認同演變及華人長年在泰國政治及外交所扮演角色。由於東南亞華人為居住國當地甚具影響力族群，其發展歷史與現況則漸成為學術熱烈探討議題。然即便學術不乏東南亞華人研究，或甚泰國華人，惟鮮少針對泰國華人性、身分、認同變遷情形及對泰國政治與外交影響。本文另藉由中國崛起為楔子，剖析泰國華人性在泰國國內政治及對中國關係所起作用，並分析華人－中國再聯繫現象與認同認知脫勾可能性。


自中國透過改革開放促使經濟轉型以來，即成功塑造國內經濟快速起飛，且連帶國家實力一同突飛猛進。中國一霎躍升為國際霸權，宰制亞洲並企圖將勢力延伸至全世界。作為中國鄰居，東南亞不僅地理位置鄰近中國，甚易受影響，其國內廣大華人族群亦為中國效應外溢媒介。中國崛起為二十一世紀重要發展，隨之而來為華人政治與大中國經濟圈關係變遷，相關學術研究更應運而生。在既有刻板印象下，華人經濟與華人身分政治似密不可分，意即其商貿發展影響著自身身分政治。惟本文前已分析，泰國華人經歷發展與其他東南亞華人有異，甚為特殊。相較印尼、馬來西亞等華人族群華人性顯而易見，泰國華人無論在何時代背景下，認同政治始終並不明顯。此現象主因在於泰國政府長年推動高度同化政策，泰國主流社會對華人性接受度高，政治控制敏感度低，致使華人同化進程無受阻礙。華人深受同化政策影響，因而漸對自身華人身分、特質、意識及認同一或統稱「華人性」，倍感困惑。為促使掌握泰國經濟動脈之華人迅速融入當地，增進華人對泰國忠誠度，泰國皇室及政府便積極推動同化政策，而非排華政策。當華人入籍泰國時，華人經濟便成為泰國人經濟，屬於國家經濟實力，而華人「掌握」經濟命脈困境則自解。為此，泰國採以開放包容及略為限制之恩威並重策略，有別於鄰近東南亞國家激進排華政策，反藉由寬容包納態度，推動華人融入社會。相關政策包括賦予官職、鼓勵取用泰國姓氏及限制華語教育等。另因泰國華人長期經歷泰國當地社會文化洗禮，在各種文化層面上便逐漸出現與當地文化融合情形，包括穿著飲食等生活行為入境隨俗。隨著華人融入當地，中華文化逐漸與泰國文化合而為一，成為嶄新泰國文化。



在此歷史基礎上，泰國華人後代同化程度成為東南亞地區最高，如今難以輕易分辨泰國人與華人差異。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華人佔泰國總人口數約 10%，惟實際人數應遠高於此。由於多數華人均已歸化泰國、家族皆採用泰文姓名，成為名副其實泰國公民，故人口普查難以確切顯示華人比例。華人在泰國為不可忽視族群，除因善於經商而成為各國主要企業家外，眾多華人亦投身政治。泰國政治歷史中不乏具華人血統領導者，而華人在泰國所扮演角色更與其他東南亞華人有所相異。早期華人剛遷移至泰國時，因身分認同尚未轉換，華人仍心繫中國。另因華人初來乍到，須以穩定生活為發展重心，故未有多餘心力關注政治。隨著華人經濟扎根且財富穩定，便有心思涉略商貿以外事務。早期泰國皇室即借用華人經商專長，賦予貿易機構職位以推展經濟，另重用華人以推行「以華治華」。華人雖以貿易商業職位為主，惟亦間接參與政治。至參政原因則起始於華人盼可鞏固財富，增進影響力。透過拉攏政治人物加入企業董事會，建立政商網絡，華人得以確保商業利益。部分華人認為直接參與政治，藉由加入政黨並參選，以成為影響政府決策者，便可更加維護既得利益。

然一悖反現象為，泰國政治中卻並無以華人為執政黨。泰國華人雖參政情形踴躍，早在 1940 年代政府即九成官員具華人血統，且迄今歷屆總理及內閣成員仍多為華人，惟無華人政黨。泰國華人散布於各政黨，參選人選舉政見亦鮮少以華人為對象，華人參政目的顯然並非為華人發聲。華人視自身為泰國人，爭取泰國人福利即為自身謀取福利。相較於其他東南亞華人，泰國華人身分及意識在泰國政治不具意義。泰國政治中，華人勝落選並非因其身分背景特殊，政府內具華人血統閣員遭推翻亦與出身無關。質言之，華人族群不復存在，泰國華人身分認同在長期同化影響下，已轉化為泰國人身分。「華人」成為學術對此族群稱謂，而非其自身身分認同。


泰國華人在國內政治雖扮演關鍵角色，此卻與華人身分血統毫無關聯。外交乃一國內政延伸，而泰國華人性不僅在國內政治未起顯著作用，亦未能影響泰國外交政策。彈性且務實，乃泰國外交政策特色。如竹子隨風擺盪，視國際情勢隨時應而調整對外政策，泰國精湛外交技巧因而獲稱「竹子外交」。由於泰國多以當下國際現勢作為外交政策調整依據，其國內華人族群並無法撼動政策方向。泰國雖從未如同其他東南亞國家實施激烈排華政策，惟曾因考量國家利益而執行



限華政策並改變對華政策。泰國歷史上著名總理 Phibun Songkhram 於 1930 年代末在任期間，曾倡導以泰國及其民族為優先之「大泰民族主義」並積極推動限華政策，力在全面同化華人。數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掀起序幕，泰國因考量國家利益而選擇與日本同一戰線。儘管與中國為敵，泰國並未針對境內華人族群採取激烈對待手段。當二戰落幕後，伴隨而來卻是冷戰，共產勢力更觸及全世界。泰國畏懼共產主義侵襲，擔憂國家利益受損，選擇站上反共陣線，與中共往來亦成為禁忌話題。在此期間，泰國華人並未遭受打壓抑或不公待遇。回顧泰國外交政策一貫作風為，視國際社會風向隨時更改政策以應變化，華人在此其中皆非政府考量因素。隨著國際情勢變化，泰國逐漸瞭解，若想增進國家利益，則勢必須與中國合作。總理 Phibun 在任期間雖曾執著於限華政策，卻曾應國內工商界要求且顧及國家經濟利益，而解除對中國禁運限制。由此可見，對於是否提升與中國關係，泰國華人未曾積極推動抑或反對，而政府領導人決策亦與國內華人無所關聯。

泰國與中國關係發展在情勢變遷下，出現轉機。新中國成立後，積極博取東南亞國家認同與信任，頻頻示好並伸出友善之手，盼與東南亞建立情誼。泰國原先築起反對與中國往來高牆，在中國鼓勵雙方經貿往來且多次協助泰國之善舉後，泰國政府逐漸改變對中國心態與政策。泰國考量國家利益及未來發展，在 1975 年與新中國建交，正式搭起友誼橋樑。然綜觀泰國外交及對華政策歷史，不難發現華人族群影響甚微，或可稱為毫無影響。相較鄰近東南亞國家對中國態度強勢，偶有排斥，泰國卻未因種族差異而引起對中國之強烈敏感度，二國間亦未出現抗衡或緊張感。此現象關鍵不僅在於泰國外交政策以國際情勢及國家利益為重，更因華人已非華人，而實為泰國人所致。對於中國，多數華人不具特殊情感，亦不認為政府必須與中國往來合作。對於國家外交，華人如同普遍泰國人皆跟隨皇室及領導人決策，提升與中國關係未必等同於增進華人在泰國地位與福利。華人視自身為泰國人，思想以泰國為優先，國家利益即為華人利益。在高度同化政策下，泰國華人與泰國人早已無所區分，二族群合而為一，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殊民族。

另據本文前所分析，在泰國華人身分、意識及對祖國認同消逝情形下，華人性在泰國政治及外交中甚不顯著。又二十一世紀中國崛起亦未能深切影響沈寂已久之泰國華人性，抑或重新燃起華人對中國認同。目前部分學術研究探討，東



南亞華人是否隨著中國實力及影響力增長，而出現再華化情形。根據本文前所分析，近年部分政治人物確實樂於公開自身華人血統背景，以彰顯與中國聯繫促進雙邊往來，進而或可提升國內支持度。華人展現其華人身分，充其量僅為搭上「中國熱」潮流。華人將華人意識及身分作為與中國接觸工具，透過中文姓名及家族背景，華人可更輕易與中國建立關係。在中國不斷崛起且勢力持續擴增情況下，泰國華人稍微強調與中國淵源，似益多於害。隨著中國一躍而為亞太霸權，華語便成為各國人民學習外語潮流。泰國自數世紀前即設有多所華校，華語學校在泰國規模甚為可觀。如今在泰國及中國政府共同推廣下，華校發展更為蓬勃。然華語熱之所以在泰國掀起熱潮，並非因其境內眾多華人所影響。總以國家利益為優先，泰國政府受國際現勢影響，視華語為推進泰國對外關係工具。華語對泰國政府及人民而言，有如英語及其他外語般，地位及作用皆並無特殊之處。另因中國經濟起飛帶動其人民所得，中國人逐漸熱衷於海外觀光。中國除為泰國對外貿易夥伴，亦為泰國觀光經濟主要貢獻者，華語便成為推廣觀光工具。

本文前嘗試分析，泰國華人在中國強勢影響下，有無再華化可能性？意即，華人對於身分認同是否有所改變？面對泰國與中國關係日趨緊密，華人是否重新檢視自身華人意識？然根據目前情勢，泰國華人似無再華化傾向，華人仍舊自認為百分之百泰國人，毫無疑問。在泰國華人早已高度同化基調上，華人對中國並無實質情感聯繫與牽掛。相較印尼、馬來西亞及越南及其他東南亞華人群族性明顯，泰國華人與本地人完全融合，

當前學術不乏探究再華化議題，然筆者認為，此在泰國華人族群似不適用，因「華人」為方便稱呼此族群之用語，華人族群實不復存。泰國華人不再是華人，因其身分、文化及國家認同早已自華人轉化為泰國人。本研究針對泰國華人性對泰國政治與外交影響及中國崛起與再華化關聯提出分析見解，探究泰國華人為何未體現對華人身分再反思或再認識，而政府對華認識及對華政策為何得以免於捲入認同政治。

儘管已詳盡分析及探究上述議題，本研究仍存在限制。由於中國崛起為近廿年始發生，研究範疇必有所限。倘時間軸持續延伸，中國對泰國華人影響蔓延

且深化，華人身分認同會否改變仍有待探究。本研究作為拋磚引玉報告，盼有助
拓展我國對泰國、華人政治經濟、華人認同及同化等研究領域。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 中國新聞網，「消除過客心態 海外華僑華人要勇敢走出唐人街」，
<http://www.chinanews.com/hr/2012/05-07/3868193.shtml>，2012/05/07。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0，「中國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wjs_674919/2159_674923/t8987.shtml，2000/11/07。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8，「2018年3月27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
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545795.shtml，2018/03/27。
-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11/content_5004393.htm。
-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泰國大使館官方網站，《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泰國關於二十一世紀合作計畫的聯合聲明》，2004，
<http://www.chinaembassy.or.th/chn/ztgx/zywj/t86117.htm>，2004/04/21。
-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泰國大使館官方網站，2004，《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泰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
<http://www.chinaembassy.or.th/chn/ztgx/zywj/t86118.htm>，2004/04/21。
-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泰國大使館官方網站，2017，「中泰關係簡介」，
<http://www.chinaembassy.or.th/chn/ztgx/gxgk/t86119.htm>，2017/05。
-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泰國大使館，2017，「泰國詩琳通公主對中國進行第41次訪問」，
<http://www.chinaembassy.or.th/chn/ztgx/t1453702.htm>，2017/04/14。
-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2011。「泰國2010年華人人口統計推估」：1-5。
- 天下雜誌，2018，「中國因素引爆！馬哈迪【國族牌】vs. 納吉【經濟牌】對決倒數」，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9773>，2018/05/08。
- 王偉民，1988。「一九三二年君主立憲制確立前泰國王室對華人政策淺析」。



- 《南洋問題研究》1988（2）：57-63。
- 王崑義，2007。「三和戰略：中國新外交與台灣的戰略選擇」。全球政治評論 17：19-46。
- 王望波，1996。「泰國華人政策及其影響」。《八桂僑史》1996（1）：37-41。
- 王賡武，1994。《中國與海外華人》臺北市：臺灣商務。
- 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東協加一」，<http://www.aseancenter.org.tw/ASEAN1.aspx>。
- 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2014，「東協發展簡介」，<http://www.aseancenter.org.tw/ASEANintro.aspx>，2014/03/31。
- 石之瑜、張登及，2009，「中國崛起的意義」，《文化研究》8：193-212。
- 任弘，2017，「一帶一路與僑務新思維」，《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7：246-267。
- 朱東芹，2011，「東南亞華僑華人社團的歷史與現狀」，《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174-202。
- 朱緹緹，2017，「東南亞裔學生的語言使用情況與文化認同調查」，《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7：380-405。
- 江白潮，1989，「泰國華僑華人現狀述略」，《汕頭大學學報》1989（1）：98-108。
- 自由時報，2012，「僑委會英文名 朝野決議拿掉 Chinese」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630205>，2012/11/13。
- 何展傑，2007，《泰國與中國關係發展之探討－泰國的觀點》，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余定邦、陳樹森，2009，《中泰關係史》，北京市：中華。
- 吳群、李有江，2004，「二戰後泰國華僑華人社會的變化」，《雲南師範大學學報》36（5）：62-68。
- 宋鎮照，2014，「越南排華反中暴動的政經分析－民族、帝國、和資本三主義發展的對抗與矛盾」，《海峽評論》282：34-39。
- 我國駐泰國經濟文化辦事處，2013，「泰國中華會館舉辦華語文能力測驗圓滿成功」，<https://www.roc-taiwan.org/th/post/5121.html>，2013/11/05。
- 李小軍，2007，「論戰後泰國對華政策的演變」，《東南亞研究》2007（4）：41-

46。

- 李文志、蕭文軒，2006，「泰國推展次區域經濟合作戰略之政經分析」，《逢甲人文社會學報》12: 225-265。
- 李巧寧，2007，《桃園縣大溪鎮中庄新村港澳移民的族群邊界與認同》，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政賢，2009，《馬來西亞〈光華日報〉的中國認識：在華僑與華人兩種身份之間》臺北市：臺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 李國卿，1988，《泰國華裔經濟的演變與前瞻》臺北市：三民總經銷。
- 李蓉，2005，「試論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兩個戰場」，《河北師範大學學報》28(4)：5-11。
- 沈玲，2015，「泰國新生代華裔的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研究」，《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5: 276-306。
- 初國華、張昌吉，2010，「中國崛起之意涵及其區域政治效應」，《全球政治評論》30: 127-56。
- 周方銀，2011，「韜光養晦與兩面下注——中國崛起過程中的中美戰略互動」，《當代亞太》2011(5)：6-26。
- 周祉元，2005，「蠡測 2005 年的中共外交取向」，《展望與探索》94(3)：99-106。
- 居維寧，1997，「海外華人的種族認同」，陳文壽編輯，《華僑華人新論》中國華僑出版社。
- 林家如，2006，《從博鰲亞洲論壇看中國與東協之政經發展：機會與挑戰》，臺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中華民國暹羅王國友好條約》，<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10054>。
- 者貴昌，2017，「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中國與泰國金融合作的機遇與挑戰」，《東南亞縱橫》2017(1)：36-42。
- 金勇，2006，「20 世紀泰國社會華人姓名的泰化嬗變」，《當代亞太》2006(5)：58-64。
- 金榮勇，1994，「泰國川立沛政府的經貿外交」，《問題與研究》33(2)：16-24。

封麗金，2011，《試論泰國華人族群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重慶：重慶大學碩士論文。

看見泰國，2016，「泰國姓名藏玄機」，<https://visionthai.net/article/secrets-in-thai-name/>，2016/06/13。

胡大龍，2015，「如何看待中國崛起對周邊國家的影響」，《開放報導》182: 97-100。

范錦榮，2011，《泰國華人政治參與研究》，廣州：暨南大學碩士論文。

孫學峰、徐勇，2012，「泰國溫和應對中國崛起的動因與啟示（1997～2012）」，《當代亞太》2012（5）：80-96。

孫學峰、黃宇興，2011，「中國崛起與東亞地區秩序演變」，《當代亞太》2011（1）：6-34。

泰王國駐華大使館官方網站，「中泰關係」，<http://www.thaiembbeij.org/thaiembbeij/cn/republic-of-china/thai-relations-china/>。

泰國內閣祕書處。「歷屆泰國總理」。 http://www.cabinet.thaigov.go.th/eng/bb_main21.htm。

泰國世界日報，2013，「泰美建交 180 週年，穎拉主持慶祝會」，http://www.udnbkk.com/article/2013/0530/article_107376.html，2013/05/30。

高長、吳瑟致，2009，「中國崛起對東亞區域主義的影響」，《遠景基金會季刊》10: 1-48。

高朗，2006，「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遠景基金會季刊》7（2）：53-94。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2013，「中文熱發酵 來台泰生增 10 倍」，<http://pr.ntnu.edu.tw/newspaper/index.php?mode=data&id=16347>，2013/09/08。

國家漢辦駐泰國代表處，2016，「泰國：孔子學院十年成規模」。 <http://www.hanbanthai.org/news/meitijujiao/2016-10-06/5943.html>，2016/10/06。

國際日報，2009，「泰國前國會主席披猜·拉達軍率代表團訪問汕頭」
<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9/09-08/1854535.shtml>，2009/09/08。

張小倩，2016，「二十一世紀以來印尼華人“再華化”現象研究」，《世界民族》2016（1）：82-91。

張文蔚，1972，《華人社會與東南亞諸國之政治發展》臺北市：臺灣商務。

張秀明，2015，「21 世紀以來華僑華人與中國關係的新變化」，《華僑華人研究



- 報告》2015: 1-34。
- 張錫鎮，1990，「中泰關係四十年」，《東南亞研究》1990（2）：1-12。
- 張靜尹，2008，《塔信政權與泰國政治變遷》，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曹雲華，2010，《變異與保持：東南亞華人的文化適應》臺北市：五南。
- 莊國土，2003，「東南亞華人參政的特點和前景」，《當代亞太》2003（9）：29-34。
- 莊國土，2013，「文化相似性和中泰關係：歷史的視角」，《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2): 5-14。
- 莊國土，2014，「東南亞華商華商軟實力及其對中國與東南亞友好關係的貢獻」，《華僑華人報告 2014》2014: 1-27。
- 許志嘉，2007，「中國新睦鄰政策：戰略意涵與作為」，《遠景基金會季刊》8: 43-90。
- 許國棟，1994，〈從華人宗教信仰剖析泰國的「同化」政策〉，《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4（2）：27-33。
- 許梅，2002，「泰國華人政治認同的轉變—動因分析」，《東南亞研究》2002（6）：47-55。
- 許梅，2002a，「泰國華人政治生活的變遷」，《東南亞研究》，2002（2）：16-20。
- 郭秋永，1993，《政治參與》，臺北：幼獅出版社。
- 陳佩修，1998，「從暹華到華裔泰人：政治情勢及泰裔華人認同轉變」（譯），陳鴻於審訂，《華裔東南亞人》南投縣：暨大東南亞中心。
- 陳尚懋，2008，「塔克辛執政前後的泰國政商關係」，《問題與研究》47: 151-79。
- 陳尚懋，2010，「泰國的國內政治與國家安全：從紅衫軍百萬人大遊行談起」，《戰略安全研析》59: 7-12。
- 陳林，2009，《從不穩定到穩定的泰中關係之研究》，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欣之、陳裕翰，2006，「抗衡、扈從、交往或卸責—東協國家應對中國崛起的研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1-10。



- 陳健民，1989，「泰國對華人的政策和戰後華人社會的變化」，《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89（4）：20-30。
- 陳旋波，2011，「華文教育的歷史、現狀及在世界漢語熱背景下的境遇」，《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304-325。
- 陳清照，2005，《中國與東協國家政經關係之研究》，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傳宇，2017，「泰國語言政策探析及其啟示」，《東南傳播》160：66-67。
- 陳鴻瑜，2015，《泰國史》新北市：布可屋文化。
- 喻常森，2013，「東盟國家對中國崛起的認知與政策反應」，《當代亞太》2013（3）：111-128。
- 黃俊傑，2006，《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黃瑞真，2008，「拉瑪六世的民族主義與排華思想及其影響」，《南洋問題研究》2008（2）：72-80。
- 黃鏞琨，1989，「海外華人參政略述」，《八桂僑刊》1989（1）：29-34。
- 新加坡國立大學海外華人研究網站：http://www.lib.nus.edu.sg/chz/chineseoverseas/oc_shequ_thailand.htm。
- 楊保筠，2016，「泰國華僑華認同新變化之觀察與思考」，「2016年臺灣首屆泰國研究」國際研討會論文：1-11。
- 楊麗，2008，「華人的政治認同及其影響因素分析：以泰國華人為例」，《蘭州學刊》2008（1）：82-84。
- 萬仁元、方慶秋，1993，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長編》第66冊，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
- 廖建裕，1998，「東南亞華人：華僑？海外華人？或東南亞人？」林蘋蘋譯，東南亞季刊3(1)：20-39。
- 維京人酒吧，2012，「留學觀察筆記：為什麼泰國華人不會說華文？」，<http://vikingbar.org/2016/12/留學觀察筆記：為什麼泰國華人不會說華文？/>，2016/12/10。
- 劉宏，2010，「海外華人與崛起的中國：歷史性、國家與國際關係」，《開放時代》8：79-93。
- 劉宏，2012，「中國崛起時代的東南亞華僑華人社會：變遷與挑戰」，《東南亞




- 研究》2012 (6) : 66-72。
- 鄭午樓，2003，《泰國華僑華人史第一輯》泰國：華僑崇聖大學泰中研究中心。
- 鄭安利，2007，《從賽局觀點分析東協與中國互動之政經策略選擇》。臺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文軒、顧長永，2014，「當代泰國華人政治認同與角色變遷之研究」，《逢甲人文社會學報》28: 115-156。
- 賴欣宏，2012，《新世紀之初中共與泰國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
- 戴萬平，2011，「泰國對中國外交政策的演變：建構主義的觀點分析」，《台灣東南亞學刊》8: 65-100。
- 謝劍，2006，「東南亞華人的認同問題：對 R.J. Coughling 雙重認同理論的再思考」，《台灣東南亞學刊》3: 3-18。
- 羅文春，2009，《中泰政治關係: 1949—1975》，廈門市：廈門大學碩士論文。
- 騰訊新聞網，2011，《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https://news.qq.com/a/20111116/000896.htm>，2011/11/17。

貳、西文部分

- Anderson, Linda E. 1994. "A New Look at an Old Construct: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8(3): 293-328.
- Ang, Ien. 1998. "Can One Say No to Chineseness? Pushing the Limits of the Diasporic Paradigm." *Boundary 2* 25(3): 223-242.
- Baker, Chris and Pasuk Phongpaichit. 2005. *A History of Thai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umeister, Roy F. 1986. *Identity: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Struggle for Sel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BC News. 2011. "Bangkok vulnerable to floods, Thai PM Yingluck warns."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pacific-15459227>. Latest update October 26, 2011.
- BBC News. 2014. "Thailand court ousts PM Yingluck Shinawatra."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27292633>. Latest update May 7, 2014.
- Berry, John W. 1997.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Applied*


-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46(1): 5-68.
- Berry, John W. 2005. "Acculturation: Living Successfully in Two Cult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9: 697-712.
- Breslin, Shaun. 2009. "Understanding China's Regional Rise: Interpretations, Identities and Im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85(4): 817-35.
- Broomfield, Emma V. 2003. "Perceptions of Danger: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2(35): 265-284.
- Buszynski, Leszek. 1982. "Thailand: The Erosion of a Balanced Foreign Policy." *Asian Survey* 22: 1037-55.
- Buszynski, Leszek. 1994. "Thailand's Foreign Policy: Management of a Regional Vision." *Asian Survey* 34(8): 721-37.
- Callahan, William A. 2003. "Beyond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ism: Diasporic Chinese and Neo-Nationalism in China and Thail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7(3): 481-517.
- Chachavalpongpun, Pavin. 2009. "Diplomacy under Siege: Thailand's Political Crisis and the Impact on Foreign Polic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31(3): 447-67.
- Chachavalpongpun, Pavin. 2010. *Reinventing Thailand: Thaksin and His Foreign Policy*.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 Chachavalpongpun, Pavin. 2011. "The Necessity of Enemies in Thailand's Troubled Politics." *Asian Survey* 51: 1019-41.
- Chachavalpongpun, Pavin. 2012. "Yingluck Shinawatra's Foreign Policy." *Asia Sentinel*, <http://www.asiasentinel.com/politics/yingluck-shinawatras-foreign-policy/>. Latest update January 20, 2012.
- Chan, Kwok Bun and Tong Chee Kiong. 1993. "Rethinking Assimilation and Ethnicity: The Chinese in Thail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7(1): 140-168.
- Chantasawat, Busakorn, K.C. Fung, Hitomi Iizaka, and Alan Siu. 2003.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Case of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Hitotsubashi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DI, December 12-14, 2003: 1-34.
- Chang, David W. 1973. "Current Status of Chinese Minorities in Southeast Asia." *Asian Survey* 13(6): 587-603.
- Chang, Sen-Dou. 1968. "The Distribution and Occup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Geographical Review* 58(1): 89-107.
- Chansiri, Disaphol. 2008. *The Chinese Émigrés of Thaila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 Youngstown, N.S.: Cambria Press.
- Chen, Ta. 1940.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 Chinvanno, Anuson. 1992. *Thailand's Policies towards China, 1949-54*. Basingstoke: Macmillan in association with St. Anthony's College, Oxford.
- Chow, Rey. 1998. "On Chineseness as a Theoretical Problem." *Boundary 2* 25(3): 1-24.
- Christensen, Thomas J. 2006.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1(1): 81-126.
- Chung, Stephanie Po-Yin. 2005.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Overseas Chinese Family: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Eu Tong Sen, 1822-1941." *Modern Asian Studies* 39(3): 599-630.
- Clough, Ralph N. 1975. *East Asia and U.S. Security*.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 Coughlin, R. J. 1952. "The Status of the Chinese Minority in Thailand." *Pacific Affairs* 25(4): 378-389.
- Coughlin, R. J. 1960. *Double Identity: The Chinese in Modern Thailan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CRI English. 2009. "Princess Sirindhorn: An Outstanding Envoy of Sino-Thai Relationship." <http://english.cri.cn/6909/2009/11/26/2301s531846.htm>. Latest update November 26, 2009.
- Cuber, John F. 1955. *Sociology: A Synopsis of Principles*.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Dalpino, Catharin. 2012. "Thailand in 2011: High Tides and Political Tensions." *Asian Survey* 52(1): 195-201.
- Darling, Frank C. 1965. *Thai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 Public Affairs Press.
- Doner, Richard F. and Ansil Ramsay. 1997. "Competitive Clientelism and Economic Governanc: The Case of Thailand." In Sylvia Maxfield, and Ben Schneider, eds., *Business and the St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Economist. 1997. "China's fitful sleep."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51617>. Latest update July 17, 1997.
- Farrelly, Nicholas. 2013. "Why Democracy struggles: Thailand's elite coup cultur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7(3): 281-296.
- Farver, Jo Ann M., Sonia K. Narang, and Bakhtawar R. Bhadha. 2002. "East Meets West: Ethnic Identity, Acculturation, and Conflict in Asian Indian Families." *Journal of*

- Family Psychology* 16(3): 338-350.
- Fineman, Daniel. 1997.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Military Government in Thailand, 1947-195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Fuller, Thomas. 2014. "Thai Military Detains Ousted Leaders as Coup Sets Off Small Acts of Protests."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14/05/24/world/asia/thailand.html?_r=0. Latest update May 23, 2014.
- Gans, Herbert J. 1997. "Toward a Reconciliation of 'Assimilation' and 'Pluralism': The Interplay of Acculturation and Ethnic Reten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1(4): 875-892.
- Gordon, Milton A.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sling, L. A. Peter and Linda Y. C. Lim. 1983.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Volume 1 Ethnicity and Economic Activity*. Singapore: Maruzen Asia.
- Graves, Theodore D. 1967. "Psychological Acculturation in a Tri-Ethnic Community."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23(4): 337-350.
- Guan, Ang Cheng. 2015. "Termination of War: The Cambodian Conflict (1978-1991)."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5 International Forum on War History: Termination of War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eptember 30, 2015: 101-109.
- Gurtov, Melvin. 1975.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A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a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all, Stuart.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Identity*, ed. J. Rutherford.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Hau, Caroline S. 2012. "Becoming 'Chinese'—But What 'Chinese'?—in Southeast Asia."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10(26), No. 2: 1-37.
- Herskovitz, Melville J. 1958. *Acculturation: The Study of Culture Contact*. New York: J. J. Augustin.
- Heidhues, Mary F. Somers. 1974. *Southeast Asia's Chinese Minorities*. Hong Kong: Longman.
- Hirschman, Charles. 1988.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In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eds. 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3-31.
- Jacobs, Jeffrey W. 1995. "Mekong Committee History and Lessons for River Basin Development."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61(2): 135-148.


- 
- Jiang, Joseph P. L. 1966. "The Chinese in Thailand: Past and Present."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7(1): 39-65.
- Kislenko, Arne. 2002. "Bending with the Wind: The Continuity and Flexibility of Thai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57: 537-61.
- Kohn, H. 1965. *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 New Jersey: Van Nostrand Company Inc.
- Ku, Samuel C. Y. 2009. "China'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A Political Analysis." In *Towards Pax Sinica? China's Rise and Transformation: Impacts and Implications* eds, Emile Kok-Kheng Yeoh. Kuala Lumpur: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sia.
- Kurlantzick, Joshua. 2007.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aothamatas, Anek. 1988. "Business and Politics in Thailand: New Patterns of Influence." *Asian Survey* 28(4): 451-470.
- Landon, Kenneth Perry. 1941. *The Chinese in Thailand*.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 LaRocco, Tim. 2011. "Yingluck and Foreign Policy."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1/09/yingluck-and-foreign-policy/>. Latest update September 24, 2011.
- Leong, Chan-Hoong and Colleen Ward. 2000. "Identity conflict in sojourn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4: 763-776.
- Lin, En-Yi. 2008. "Family and Social Influences on Identity Conflict in Overseas Chine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2: 130-141.
- Malvezin, Laurent. 2004. "The Problems with (Chinese) Diaspora: An interview with Wang Gungwu." *Diasporic Chinese Ventures, The life and work of Wang Gungwu*, Gregor Benton and Hong Liu eds, USA: Routledge Curzon: 49-57.
- Masviriyakul, Siriluk. 2004. "Sino-Thai Strategic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1992-2003)."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6(2): 302-19.
- McCargo, Duncan and Ukrist Pathmanand. 2005. *The Thaksinization of Thailand*. Copenhagen: NIAS Press.
- Neher, Clark D. 1992.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Thailand." *Asian Survey* 32(7): 585-605.
- Nicro, Somrudee. 1993. "Thailand's Nic Democracy: Studying from General Elections." *Pacific Affairs* 66: 167-82.
- Niyomyat, Aukkapon. 2012. "Thai 'yellow shirts' rally against Thaksin amnesty moves."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thailand-politics-yellowshirts/thai->

yellow-shirts-rally-against-thaksin-amnesty-moves-idUSBRE84T0MN20120530.
Latest update May 30, 2012.

- 
- Nonini, Donald M. and Aihwa Ong. 1997. *Undergroun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as an Alternative 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 Nuechterlein, Donald E. 1965. *Thailand and the Struggle for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Oberg, Kalervo. 1960. "Cultural Shock: Adjustment to New Cultural Environments." *Practical Anthropology* 7: 177-182.
- Ostheimer, Simon. 2017. "World's Best Chinatowns." CNN Travel. <http://travel.cnn.com/explorations/escape/worlds-best-chinatowns-324704>. Latest update June 29, 2017.
- Park, Robert E. and Ernest W. Burgess. 1924.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arsons, E. C. 1936. *Mitla: Town of the Sou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athmanand, Ukrist. 1998. "The Thaksin Shinawatra Group: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ailand." *Copenhag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3(98): 60-81.
- Peters, Cynthia. 2014. "Princess Maha Chakri Sirindhorn Of Thailand Receives Honorary Degree From Pomona College." Pomona College News. <http://archive.is/P8MPi>. Latest update February 4, 2014.
- Pinney, Jean S., Gabriel Horenczyk, Karmela Liebkind, and Paul Vedder. 2001. "Ethnic Identity, Immigration, and Well-Being: An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7(3): 493-510.
- Phongpaichit, Pasuk and Chris Baker. 2004. *Thaksin: The Business of Politics in Thailand*.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 Phuangkasem, Corrine. 1980. *Thailand in Southeast Asia: A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1964-1977)*.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 Phuangkasem, Corrine. 1984. *Thailand's Foreign Relations, 1964-80*.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Pongsudhirak, Thitinan. 2004. "Thai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Thaksin Government: Out of the Box for Whom." Article posted on Thai World Affairs Center's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thaiworld.org/enn/thailand_monitor/answer.php?question_id=70. Latest update October 15, 2004.

- 
- Poston, Jr., Dudley L., Michael Xinxiang Mao, and Mei-Yu Yu. 1994.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round 1990."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3): 631-645.
- Purcell, Victor. 1966.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avenhill, John. 2006. "Is China an Economic Threat to Southeast Asia?" *Asian Survey* 46(5): 653-74.
- Redfield, Robert, Ralph Linton, and Melville J. Herskovits. 1936. "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38: 149-152.
- Reynolds, Craig J. 2002. *National Identity and its Defenders: Thailand Today*. Thailand: Silkworm Books.
- Reynolds, E. Bruce. 2004. "Phibun Songkhram and Thai Nationalism in the Fascist Era."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3(1): 99-134.
- Rose, Arnold M. 1956. *Sociology: The Study of Human Relatio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Singh, L. P. 1963. "Thai Foreign Policy: The Current Phase." *Asian Survey* 3: 535-43.
- Skinner, G. William. 1957a. "Chinese Assimilation and Thai Politic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6: 237-50.
- Skinner, G. William. 1957b.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Itha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 Skinner, G. William. 1958.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 Itha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 Skinner, G. William. 1959.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21: 136-147.
- Snitwongse, Kusuma. 2001. "Thai Foreign Policy in the Global Age: Principle or Profit?"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3(2): 189-212.
- Soonthornrojana, Adulyasa. 1986. *The Rise of U.S.-Thai Relations, 1945-1975*.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kron.
-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Full text: Action plan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ttp://english.gov.cn/archive/publications/2015/03/30/content_281475080249035.htm. Latest update March 30, 2015
- Stuart-Fox, Martin. 2003. *A Short History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ribute, Trade and Influence*. Australia: Allen & Unwin.
- Stuart-Fox, Martin. 2009. "Communism and the Cold War."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Volume VI: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27. Edited by

- 
- Geoff Wade. Oxon: Routledge.
- Suehiro, Akira. 1985.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ailand*. Bangkok, Thailand: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
- Suehiro, Akira. 1994.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ailand, 1855-1985*. Chiang Mai, Thailand: Silkworm Books.
- Suhrki, Astri. 1971. "Smaller-Nation Diplomacy: Thailand's Current Dilemmas." *Asian Survey* 11(5): 429-44.
- Suryadinata, Leo. 1985. *China and the ASEAN States: The Ethnic Chinese Dimensio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Suryadinata, Leo. 2007. *Understanding the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 Suthiwart-Narueput, Smairrob. 1980. *A Strategy for Survival of Thailand: Reappraisal and Readjustment in Her Alliances (1969-1976)*.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 Tan, Eugene K. B. 2003. "Re-engaging Chinesenes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mperatives of Nation-building in Singapore." *The China Quarterly* 175: 751-774.
- Terwiel, B. J. 2005. *Thailand's Political History: From the Fall of Ayutthaya in 1767 to Recent Times*. Bangkok: River Books.
- Teske, Jr., Raymond H. C. and Bardin H. Nelson. 1974. "Acculturation and Assimilation: A Clarification." *American Ethnologist* 1(2): 351-367.
- Thananithichot, Stithorn. 2011. "Understanding Thai Nationalism and Ethnic Identity."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46(3): 250-263.
- Thompson, Virginia. 1941. *Thailand: The New Siam*. New York: Paragon.
- Thomson, Curtis N. 1993. "Political Identity among Chinese in Thailand." *Geographical Review* 83(4): 397-409.
- Thomson, Curtis N. 1996. "Electoral Geography of the Sino-Thai in Thailand's National Elections, 1979-1995."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8(4): 392-404.
- Tong, Chee Kiong, and Kwok B. Chan. 2001. *Alternate Identities: The Chinese of Contemporary Thailand*, Asian Social Science Series.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 Tuttle, Vanida Trongyoungoon. 1982. *Thai-American Relations, 1950-1954*. Dissertatio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 Unger, Danny. 1998. *Building Social Capital in Thailand: Fibers, Finance, and Infrastruc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Unger, Leonard. 1944.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Geographical Review* 34(2): 196-217.
- Vandenbosch, Amry. 1947.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9(1): 80-95.
- Voss, Barbara L. and Rebecca Allen. 2008. "Overseas Chinese Archaeology: Historical Foundations, Current Reflections, and New Directions." *Historical Archaeology* 42(3): 5-28.
- Ward, C. and A. Rana-Deuba. 2000. "Home and host culture influences on sojourner adjust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4: 291-306.
- Wang, Gungwu. 1988.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In *Changing Identities of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eds. 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Wang, Gungwu. 1993. "Greater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The China Quarterly* 136: 926-48.
- Wang, Gungwu. 2003.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 Wang, Ling-Chi and Wang Gungwu. 2003. *The Chinese Diaspora: Selected Essays Volume I*.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 Washington Post. 2003. "China's Improving Image Challenges U.S. in Asia."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2003/11/15/chinas-improving-image-challenges-us-in-asia/7e9b4f66-5291-4b86-ae09-e2386399ba70/?utm_term=.fc922d2be7b9. Latest update November 15, 2003.
- Wilson, David A. 1967. "China, Thailand and the Spirit of Bandung (Part I)." *The China Quarterly*: 149-69.
- Wingfield, Tom. 2003.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Crisis in Thailand." In *Political Business in East Asia*, ed. Edmund Gomez. : 250-29. Routledge.
- Woolston, Howard. 1945. "The Process of Assimilation." *Social Forces* 4: 416-424.
- World Bank, 2011. "The World Bank Supports Thailand's Post-Floods Recovery Effort."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feature/2011/12/13/world-bank-supports-thailands-post-floods-recovery-effort>. Latest update December 13, 2011.
- Wu, David Yen-ho. 1991.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nd Non-Chinese Identities." *Daedalus* 120(2): 159-179.
- Wu, Yuan-Li. 1983. "Chinese Entrepreneurs in Southeast Asi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2): 112-117.

Yeoh, Emile Kok-Kheng, eds. 2009. *Towards Pax Sinica?: China's Rise and Transformation: Impacts and Implications*. Kuala Lumpur: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sia.

Yeoh, Emile Kok-Kheng, Chan Sok Gee, Wendy Chen-Chen Yong, and Joanne Hoi-Lee Loh. 2009. "China-ASEAN Relations in the Regional Economy." In *China-ASEAN Relations: Economic Engagement and Policy Reform*, eds. Emile Kok-Kheng Yeoh, Chan Sok Gee, Wendy Chen-Chen Yong, and Joanne Hoi-Lee Loh. Kuala Lumpur: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sia.

Yen, Ching-Hwang. 2008.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Zawacki, Benjamin. 2017. *Thailand: Shifting Ground between the US and a Rising China*. London: Zed Books.

附錄



附錄一 中華民國暹羅王國友好條約⁹³

中華民國暹羅王國為建立兩國親睦邦交，增進兩國人民相互利益起見，決定以平等及互尊主權之原則為基礎，訂立友好條約，為此簡派全權代表如左：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特派：駐伊朗國特命全權大使李鐵錚；
暹羅王國國王特派：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部長蒙·納洽王·賽尼·卜拉摩；
兩全權代表將所奉全權證書互相校閱，均屬妥善，議定條款如左：

第一條 中華民國與暹羅王國及兩國人民間，應永敦和好，歷久不渝。

第二條 兩締約國有相互派遣正式外交代表之權，此項代表在所駐國應享受國際公法通常承認一切權利、優例及豁免。

第三條 此締約國於彼締約國領土內共同商定之地方，有派駐總領事、領事、副領事、代理領事之權，此項領事官員應行使國際通例通常承認之職務，並享受國際通例通常承認之待遇。兩締約國領事官員於就職之前，應向所駐國政府取得執行職務證書，但此項證書得由所駐國政府撤回。

兩締約國不得任命經營工商業人民為領事官員。

第四條 此締約國人民得在與任何第三國人民同樣條件下，依照彼締約國適用於一切外人之法律章程，自由出入彼締約國領土。

第五條 此締約國人民於彼締約國領土內，關於其身體財產，應享受最經常之保護與安全，並在遵守同樣法律章程之條件下，與彼締約國人民享有同樣之權利與優例。此締約國人民於彼締約國領土內，關於各項法律手續司法事件之處理及各種租稅之徵收與其有關事項，應享受不低於所給予彼締約國人民之待遇。

第六條 此締約國人民在彼締約國領土全境內，得在與任何第三國人民同樣條件之下，依照彼締約國之法律章程，享有旅行居住與從事各種職業及經營工商業之權利，並在互惠條件之下，享有取得、繼承、佔有、租用或轉讓任何種類之

⁹³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1005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10054>。上網檢視日期 2014 年 11 月 27 日。

動產與不動產之權利。此締約國人民得依照彼締約國之法律章程，享有設立學校，教育其子女自由，暨集會、結社、出版、祀典、信仰之自由。

第七條 兩締約國間之其他關係，應以國際公法原則為基礎。

第八條 兩締約國同意於最短期間內，另訂通商航海條約。

第九條 本條約分繕中文、暹文與英文各二份，遇有解釋不同，應以英文為準。

第一〇條 本條約應由兩締約國各依本國法定手續於最短時間內批准。自互換批准之日起，發生效力，並將繼續保持效力。但逾十年之後任何一方得以十二個月前之通知宣告廢止之。

批准文件應在重慶或南京互換。

為此，兩全權代表將本條約簽字蓋章，以昭信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佛曆二千四百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公曆一千九百四十六年一月二十三日訂於曼谷

李鐵錚（簽字）

蒙·納洽王·賽尼·卜拉摩（簽字）

附錄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泰王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⁹⁴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泰王國政府為了恢復和進一步加強兩國人民傳統的親密友好關係，並根據兩國人民的利益和共同願望，決定於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

二、兩國政府重申，只有一個國家的人民才有權選擇他們自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而不應受到外來干涉，兩國政府並深信，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泰王國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不同不應妨礙按照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的原則發展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

三、兩國政府同意依照上述原則通過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

四、兩國政府一致認為，一切外國侵略和顛覆以及任何國家控制別國或干涉別國內政的一切企圖都是不許可的，都應受到譴責。

五、兩國政府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在世界上任何地區建立霸權和勢力範圍的圖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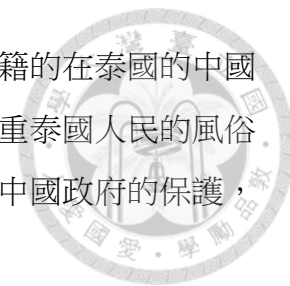
六、泰王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認中國政府關於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並決定在本公報簽字之日起一個月內從台灣撤走一切官方代表機構。

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泰王國政府並同意尊重泰國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

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注意到，幾個世紀以來僑居在泰國的中國人能遵循泰國的法律和泰國人民的風俗習慣，同泰國人民和諧友好相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他們不承認雙重國籍。雙方政府認為任何中國籍或中國血統的人在取

⁹⁴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泰王國大使館官方網站 <http://www.chinaembassy.or.th/chn/ztgx/zywj/t86118.htm>。上網檢視日期：2014年11月27日。

得泰國國籍後都自動失去了中國國籍。對自願選擇保留中國國籍的在泰國的中國僑民，中國政府按照其一貫政策要求他們遵守泰國法律，尊重泰國人民的風俗習慣，並與泰國人民友好相處。他們的正當權利和利益將得到中國政府的保護，並將受到泰國政府的尊重。



九、兩國政府同意奉行發展彼此間的貿易、經濟和文化關係的政策。

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泰國政府同意按實際可能盡快互相委派大使，並根據國際慣例在互惠的基礎上在各自首都為對方大使館的建立和履行職務提供一切必要的協助。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總 理

周 恩 來

(簽 字)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於北京

泰 王 國

總 理

蒙拉差翁·克立·巴莫

(簽 字)

附錄三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泰王國關於二十一世紀合作計畫的 聯合聲明⁹⁵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泰王國（以下簡稱“雙方”）自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以來，在友好、平等、互利、互惠基礎上，雙方在政治、經濟、貿易、軍事、教育、科技等各個領域的合作都獲得了順利的發展。兩國最高領導人、政府領導人和人民都對繼承和不斷發展這一關係發揮了重要作用。兩國關係已發展成為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睦相處的典範。雙方的良好合作不僅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也有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在二十一世紀即將來臨之際，雙方一致認為應在共同利益和過去二十多年友好關係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雙方之間睦鄰互信的全方位合作關係，從而使中泰關係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為此，作為雙方可以遵循和實施的框架和方針，特聲明如下：

一、雙方確認，《聯合國憲章》、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所確定的原則以及公認的國際法原則應成為處理兩國關係的基本準則。

二、雙方將繼續保持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密切接觸和交往，鼓勵雙方各級尤其是高層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門保持經常性的互訪交流，以促進雙邊關係全面、穩定、持續的發展。

三、雙方決定繼續保持兩國外交部之間年度高官磋商制度，就雙邊和多邊範圍的政治問題交換意見，磋商由雙方輪流主持，並負責對本計劃進行政策性追蹤。兩國外交機構將充分利用各種場合保持經常性的會晤。

四、雙方同意通過建立信任措施，加強安全合作。例如，促進戰略與安全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軍方和外交官員就安全事務加強磋商，兩軍在人道主義救援減災方面交流經驗，進行軍事科技交流以及交換各種信息等。

⁹⁵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泰王國大使館官方網站
<http://www.chinaembassy.or.th/chn/ztgx/zywj/t86117.htm>。上網檢視日期：2014年12月6日。

五、雙方將在平等互利的原則基礎上擴大貿易、投資、農業、工業、海運和科技領域的友好和互利合作。

(一) 雙方認為有必要通過密切磋商和技術合作在宏觀經濟政策領域特別是金融領域進行緊密配合。

(二) 雙方將密切合作，推動和擴大雙邊貿易，消除貿易壁壘，防止出現損害對方經濟的傾銷行為，改善生產流程和產品標準，盡可能對對方的出口產品予以優先考慮。

(三) 雙方將鼓勵和支持雙向投資的增長，並履行現有的有關投資協議所規定的義務。

(四) 雙方將推動和擴大工藝和技術交流，以提高農產品的質量、生產水平和附加值，並使檢驗條例和程序標準化，以促進雙向進口。

(五) 在工業領域，雙方將促進在專業技術知識、利用雙方原材料和技術進行共同生產、工業區開發、工業港口和人力資源開發等方面的密切合作，特別要將重點放在中小型企業。

(六) 雙方，特別是其有關企業，將通過技術合作和人力資源開發，支持在發展遠洋船隊和開展其他相關活動方面的合作。

(七) 在科技領域，雙方將促進學術和技術交流，特別是科研成果商品化方面的聯合研究和開發。

為此，雙方將繼續大力支持現有的經貿、科技兩個聯委會的機制，協調兩國經貿和科技合作關係，進一步拓展新的合作領域，妥善解決合作中出現的問題；支持和鼓勵兩國企業之間相互進行經貿往來，包括雙方在第三國進行的經貿合作，並為他們提供方便。

六、雙方將對四角經濟合作（中、泰、老、緬）及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中、泰、老、緬、越、柬）框架下的次區域合作給予更大的重視和支持，這符合兩國及本地區有關國家共同的長遠利益。雙方非常重視開辟連接中泰之間的水

路、陸路和空中航線，並將在使用方面提供便利，以促進雙方和有關國家間在貿易、投資、貨運、服務、能源、通訊和旅游等領域的合作。

七、雙方將加強在文化、教育、衛生、體育、環保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並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兒童基金以及亞太經合組織和其他國際和地區合作組織的框架下加強協調與配合。在衛生領域，雙方將進一步促進在醫學研究、醫藥生產、消費者保護和傳染病預防與控制方面的合作。

八、雙方將積極促進旅游業合作，消除旅游業產生的問題。雙方還將共同鼓勵第三國旅游者到兩國旅游。

九、雙方願共同努力，密切司法交流，相互交換信息資料，進一步加強在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販毒、走私、經濟犯罪、偷越國境及其它犯罪活動中的執法合作。

十、雙方相互尊重對方的法律制度，在遇有涉及對方公民的訴訟時，應確保其按照適當的司法程序得到公正解決。

十一、雙方將在東盟、東盟地區論壇、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亞歐會議及聯合國和世貿組織等多邊場合，就共同關心的地區和國際問題加強磋商與合作，促進地區和國際的和平與發展。

十二、中方表示將充分尊重泰國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泰方重申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認中國政府關於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

十三、雙方對中國與東盟組織及東盟各國友好關係的發展感到滿意，認為中泰合作是加強中國與東盟各方面關係的促進因素。中方贊賞泰方在密切中國同東盟關係中所作的貢獻。泰方重申將繼續為促進中國同東盟友好關係的不斷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十四、雙方認為，儘管存在著風險與挑戰，謀求和平、安全、穩定與合作仍是本地區形勢的主流。亞洲特別是東亞國家在實行必要的調整後，將會逐步克服金融風波帶來的暫時困難，繼續成為世界經濟最有活力、最有希望的地區之一。

十五、雙方認識到，世界多極化的趨勢正在加快發展，和平力量進一步增強，建立和平、穩定、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已成為時代的迫切要求和歷史發展的必然。雙方承諾共同為促進雙邊關係的不斷發展，為維護本地區和世界的持久穩定和繁榮做出積極的努力。



上述計劃將由兩國外交部長進行複審。

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

泰王國代表

唐家璇（簽名）

素林·披蘇旺（簽名）

一九九九年二月六日 於 曼谷

附錄四 泰國歷任總理（1932-2018）⁹⁶

姓名	執政時期
Phya Manopakorn	1932/06/28 - 1933/06/21
General Phya Phahon Phonpayuhasena	1933/06/21 - 1938/12/16
Field Marshal Plaek Pibulsongkram	1938/12/16 - 1944/08/01 1948/03/01 - 1957/09/16
Major Kuang Abhaiwongse	1944/08/01 - 1945/08/31 1946/01/31 - 1946/03/24 1947/11/10 - 1948/04/08
Mr. Tawee Punyaketu	1945/08/31 - 1945/09/17
The Honorable Seni Pramoj	1945/09/17 - 1946/01/30 1975/02/15 - 1975/03/14 1976/04/20 - 1976/10/06
Mr. Pridi Banomyong	1946/03/24 - 1946/08/23
Rear Admiral Thawal Thamrongnavaswadhi	1946/08/23 - 1947/11/08
Mr. Pote Sarasin	1957/09/21 - 1958/01/01
Field Marshal Thanom Kittikachorn	1958/01/01 - 1958/10/20 1963/12/09 - 1973/10/14
Field Marshal Sarit Dhanarajata	1959/02/09 - 1963/12/08
Mr. Sanya Dharmasakti	1973/10/14 - 1975/02/15
Major General The Honorable Kukrit Pramoj	1975/03/14 - 1976/04/20
Mr. Tanin Kraivixien	1976/10/08 - 1977/10/20
General Kriangsak Chomanan	1977/11/11 - 1980/03/03
General Prem Tinsulanonda	1980/03/03 - 1988/08/04
General Chatichai Choonhavan	1988/08/04 - 1991/02/23
Mr. Anand Panyarachun	1991/03/02 - 1992/04/07 1992/06/10 - 1992/9/23
General Suchinda Kraprayoon	1992/04/07 - 1992/06/10
Mr. Chuan Leekpai	1992/09/23 - 1995/07/13 1997/11/09 - 2001/02/17
Mr. Banharn Silap-Archa	1995/07/13 - 1996/11/25
General Chavalit Yongchaiyudh	1996/11/25 - 1997/11/09
Police Lieutenant Colonel Thaksin Shinawatra	2001/02/09 - 2006/09/19
General Surayud Chulanont	2006/10/01 - 2008/02/06
Mr. Samak Sundaravej	2008/01/29 - 2008/09/08
Mr. Somchai Wongsawat	2008/09/08 - 2008/12/02
Mr. Abhisit Vejjajiva	2008/12/17 - 2011/08/09
Miss Yingluck Shinawatra	2011/08/05 - 2014/05/07
General Prayuth Chan-O-cha	2014/08/24 -

⁹⁶ 泰國內閣秘書處官方網站 http://www.soc.go.th/eng/bb_main21.htm。上網檢視日期 2018 年 4 月 26 日。

附錄五：北京大學「海外華僑華人概論」印紅標教授訪談稿

Q：老師您好，由於我身邊有許多泰國華人朋友，得知許多華人都有在學習華語，我不禁想探討華人學習華語是否單單為了與中國貿易往來，又或者是否出因自身對於華人身分認同意識的復甦，您覺得泰國華人有沒有再華化的可能性呢？

A：我認為不會再華化。有個再華化的案例可以進行比較，就是印度尼西亞。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是否有新移民的大量流入。現在泰國華僑大概都是第三代、五代那樣的人，所以中國對他們來講是很遙遠的。你提出這個問題時，我就想到了，清朝末年以後到民國時期的印度尼西亞華人族群的再華化。其實馬來西亞也有很多華人於明朝或是更早期便與當地人結婚，已經當地化了。他們只知道祖先是怎麼過來的，帶來了一些習俗，但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新移民認為自己是中國華人，也就是第一代或是第二代的，可能會認為。關鍵在於，新移民不是一個大問題的話，如泰國的新移民相對少的來說，這樣再華化的可能性就相當小的。但是他們可能會對華人文化的認同，他們不會認同中國，對於文化認同的強度可能來得多。

我現在另一堂課上，有來自泰國法政大學的同學們來北京大學交換一學期。我就去給他們講關於海外華人的課，所以這是一個吧，對文化的些許認同。

影響再華化還有另一個原因是國籍問題，因為他們現在在泰國都入籍了，他們不再屬於新移民。泰國、東南亞當然有一些非法的移民，但是非法移民的數量比起當地華人社會比例來說還是很低的。因為非法移民嘛，無法得到合法的地位，所以他們活動各方面都比較低調，影響力也就較低。

再往下是辦華文學校、報刊的這方面，都會遇到一些問題。因為中國整體上並不努力把他們再變成中國人，因為基本上來說，我說就大陸方面，北京政府基本上沒有這樣的願望，泰國政府大概還有點擔心。主要是有少數新移民，新移民都會希望孩子讀華語學校，閱讀華語報紙，然後他關心中國的事、兄弟姊妹、家裡老人都在中國。對於老移民就沒有這種顧慮了。

但是我覺得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呢，就是再華化有一個心理暗示問題，覺得我中國的文化、國家會比你所在國的歷史悠久，現在又是個大國，這樣一個



民族自豪感，這是很重要的。但是經過差不多七十年的這個變化呢，這個新一代的華人對於這個感覺比較淡。但是我為什麼說到這個呢，就是新移民主要是到北美、加拿大。

所以你提到這個問題呢，我首先想到東南亞不太可能，如果有這樣的苗頭的話，東南亞國家會有所反對，而中國也不願意為了這個而得罪東南亞。

台灣方面呢，他倒是有可能有這樣的積極性，但是他東南亞華僑從台灣出去的就很少。所以多數都是廣東人、福建人，他的家在大陸呢。我覺得再華化在東南亞確實不容易，但是會造成就是說，會扭轉華族文化衰落的趨勢，逐漸地可能會再升起來。不是完全地再華化，成為中國人，而是說作為當地的一個少數民族，對自己本民族的東西、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和傳承。

現在泰國的好多年輕人他根本不會中文了，他就當做外國語如其他人一樣，學英語之外也學中文或者日本語，都是這樣的，所以我覺得像泰國的確不太容易。

倒是馬來西亞，他有足夠的經濟力量，人口比例又相當的多，他有可能會有一點。但是中國已經不再支持他們再華化了，還是馬來西亞他們自己的認同，就如西藏他們自己文化的強化、認同，但華人在那些國家並不想搞獨立，他也許只是更多維護自己的文化。

在美國如北美，有很多新移民，有點類似二戰之前東南亞華僑的情況，他倒是有一個再華化的可能，老廣東的移民可能都第四代、五代，中文說得坑坑巴巴，已經適應美國文化了，但是新的移民可能帶來影響。但這有個問題呢，儘管新移民足夠，中國人的文化、觀念在美國面前是弱勢的。美國是不存在再華化所需要的那種中國文化的自豪感，對吧？以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儘管中國已經很弱了，華僑華人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他覺得不管怎麼說我是個大國，你一個小國歷史文化比我們弱，他有種文化優越感，甚至是種族優越感，你不如我們勤快，掙的錢不如我們多。那我奮鬥那麼多年，我來了那麼久，現在我自己有間店了，你還是那個樣子。這種優越感在歐美就不太明顯，你現在看到的情況是，新移民的第一個任務是儘速地融入當地社會，接著加入當地國籍，有一個穩定的、富裕的生活，第二代的開始。他比較擔心人家不要接受，而不是我自己不願意融入，這與東南亞的華僑不太一樣。再來比例又不多，內部又有分歧，



親台北的或親北京的，所以我覺得儘管新移民在美國、加拿大有足夠的多數，但再華化的可能性不高，且有香港去的、大陸去的以及台灣去的，比較能成為一個團體，有共同的目標。

Q: 老師那請問一下，您對於現在泰國當地許多的宗親會，是否只保留了以前傳承下來的傳統，當地華人與宗親會的聯繫是否越來越淡呢？

A: 好像是有這樣的趨勢。

Q: 因為我在泰國有看到許多的宗親會，但卻未有見他們成立一個政黨，為華人發聲？宗親會對於華人來說似乎只是代表著以往曾是某一姓氏。

A: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華人已經相當程度地融入當地了。泰國主要是因為他非常地寬容，寬容也是融入的一個便利條件。你知道猶太人在中國，中國歷史上從來就沒有排猶，也因此以色列猶太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都比較友好，全世界許多國家都排猶。沒有排猶就是 1949 年以前，河南還有猶太人，但是後來就沒有了，就沒有成為中國的少數民族。倒是現在的話，土生澳門人到現在還是不願成為中國人民，所以他們還拿著葡國護照。所以我覺得東南亞和美國都不存在再華化的可能性，不再像早期大批的東南亞華僑還集結成團要為自己發聲，如辛亥革命時，當地的人可能還覺得自己有些比不上華僑、新的移民，那麼同心地往一邊兒靠。

但是現在中國的強大肯定會對東南亞華人這種文化上的影響，作為一個當地多民族，或者說多種族，多元文化的一支強化自己的文化。這文化可能會更多地由中國大陸或台灣引進一些中華民族的文化，但身分認同不太會改變。所以你提到這問題的時候，我就覺得再華化這種可能性不會太大。

Q: 我自己的看法與老師您的相似，但我在想會不會有部分華人，如前總理塔信、盈拉以及相當多歷屆華人背景總理，在不同的場合，如華人族群裡政治場合才會表明具有華人血統呢？可說是具目的性且選擇性的表明。

A: 其實這些總理多少都有華人支持，不同的華人商業集團或者是華人選民的，他在政治與民族不是單純聯繫的。這一派華人可能支持某政黨，另一派則可能支

持他黨。如美國共和黨有部分少數民族支持，而民主黨同樣有這樣的支持者。所以利用華人身分來炒作、拉票的可能性不太大，大概我的看法是這樣。

